

毛澤東自傳



現代出版公司印行

導言

中共黨主席毛澤東，究竟是「神」、是「鬼」、還是一個「凡人」？已成爲舉世所矚目與爭辯的問題。

自從大陸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飈之後，毛澤東已被形容爲一個萬能的「神」，一個高高在上的「紅色皇帝」，「毛語錄」且成爲全國七萬萬人民所恭讀拜誦的「聖經」。甚至成爲可以使聾子復聽、啞子講話、瞎子開眼的「寶典」，所謂「個人崇拜」的藩籬盡撤，而達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境界。

但在另一方面，反共的人士（包括毛澤東往日的同志，所謂「蘇修」在內），則又將毛澤東形容做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一個殘暴酷毒的「大獨裁者」，一個鼓舞着、跳躍着企圖吞滅整個世界的「鬪武戰神」。

然而，讓我們冷靜下來！毛澤東究竟是「神」、是「鬼」、還是一個「凡人」？本書中容納了三個短篇：

- (一)「毛澤東自傳」；
- (二)「毛澤東會見記」；
- (三)「毛澤東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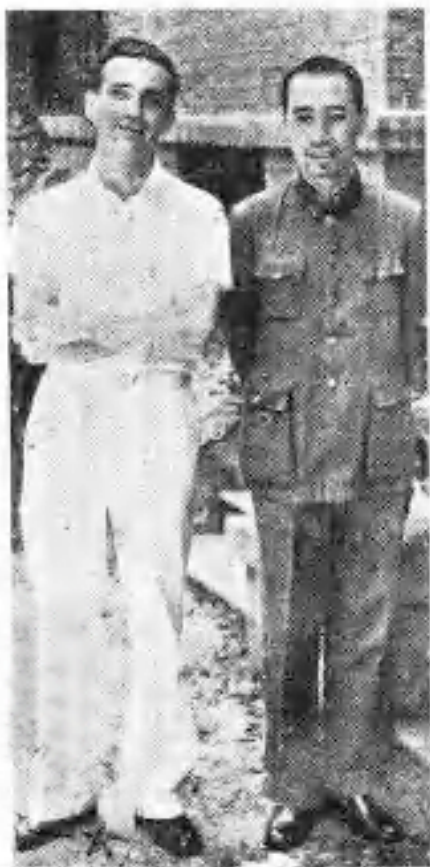
由以上的三個短篇，可以幫助我們來認識與了解毛澤東的生平、爲人與政見；從而解答了前述的問題。

「毛澤東自傳」，是美國名記者——亦爲世界聞名的紅色記者史諾于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之初訪問延安；由毛澤東口述，而由史諾筆記而寫成的一篇最可靠的自傳。在該文中，毛澤東主要敘述了他的家庭背景，少年時代與以後成爲共產黨人的經歷，他並曾談到他早年的好友蕭瑜。

「毛澤東會見記」，則爲史諾于一九六五年訪問北京的一篇訪問記。該時，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已有十五個年頭。在該文中，毛澤東談到了越南問題、核彈問題、聯合國問題、中蘇關係問題，甚至談到他個人的生死問題。這是毛澤東近年以來最爲露骨表示他的政見，世界觀以及個人生死觀念的第一手資料。

「毛澤東與我」，是毛澤東早年好友蕭瑜在外國出版的一本專書的縮譯本，主要是憶述毛澤東與蕭瑜早年結伴行乞、經驗人生的一段經歷。這本書在國外頗受歡迎，曾被認爲是研究毛澤東早期歷史的一篇相當可靠的資料。至少，我們可以認定：它曾光赤赤地剝開了毛澤東的神祕的形貌。

前述的三個短篇，雖各自獨立，各有背景，但仍不失其連環性。由這三個短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與認識毛澤東，從而解答了毛澤東究竟是「神」、是「鬼」、還是一個「凡人」的問題。



本書所輯「毛澤東會見記」，「毛澤東自傳」作者史諾於1937年前往陝北訪問，與周恩來合攝於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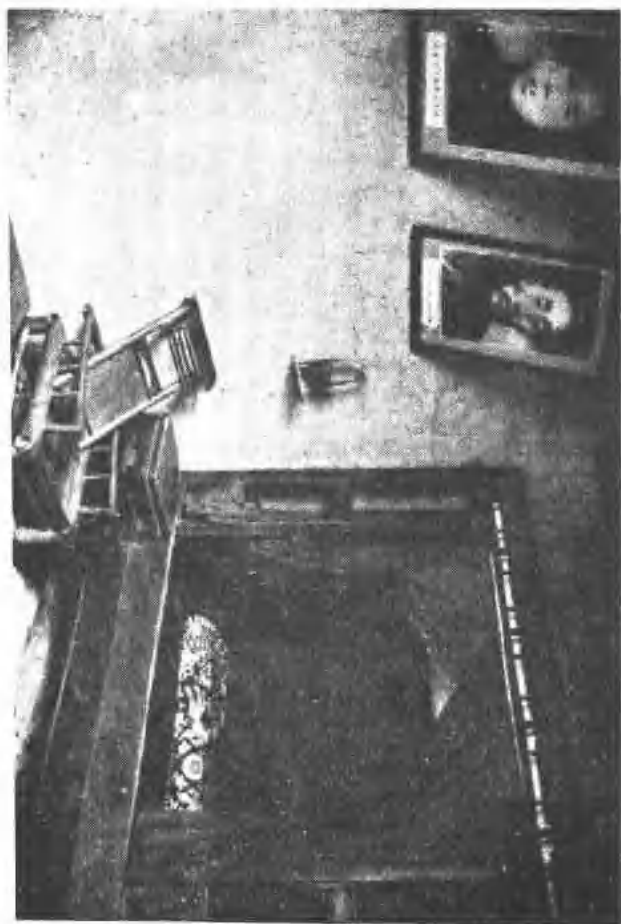


上圖：本書所輯「毛澤東與我」（此書全名「我與毛澤東行乞記」）作者蕭瑜博士伉儷。蕭與毛少年時為老友，同食其賤，午夜枕畔暢論天下事，樂也融融，其後因意見不合而分手。



下圖：乃蕭氏為該書所繪插圖之一，描寫往昔少年時與毛氏在湖南喬裝乞丐，深入體驗社會情況。

毛氏在故鄉湘潭的居室，牆上所懸掛者為其雙親像。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毛氏在長沙所辦的刊物「湘江評論」，時年約二十歲。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廿五日 (星期一)

湘江評論

The Spinal Column Weekly Review

第二卷

本報地址：長沙...
電話：...
零售每份...
訂閱...
廣告...
印刷...
發行...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民衆的大舉行動

近日，長沙各界民衆，對於政府之政策，表示極大之不滿。民衆紛紛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改組，並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此種大舉行動，顯示民衆之覺醒，亦為國家前途之希望。政府應正視民衆之要求，採取果斷措施，以挽回頹勢。

民衆的大舉行動

近日，長沙各界民衆，對於政府之政策，表示極大之不滿。民衆紛紛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改組，並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此種大舉行動，顯示民衆之覺醒，亦為國家前途之希望。政府應正視民衆之要求，採取果斷措施，以挽回頹勢。

民衆的大舉行動

近日，長沙各界民衆，對於政府之政策，表示極大之不滿。民衆紛紛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改組，並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此種大舉行動，顯示民衆之覺醒，亦為國家前途之希望。政府應正視民衆之要求，採取果斷措施，以挽回頹勢。

民衆的大舉行動

近日，長沙各界民衆，對於政府之政策，表示極大之不滿。民衆紛紛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改組，並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此種大舉行動，顯示民衆之覺醒，亦為國家前途之希望。政府應正視民衆之要求，採取果斷措施，以挽回頹勢。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本報申明

本報自創辦以來，宗旨在於報導事實，維護公理。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報名義，在外招搖，希圖破壞本報聲譽，並藉此進行非法活動。本報聲明，凡有上述行為者，本報定當依法追究，絕不寬貸。特此聲明。



左、當選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時的毛澤東。
右、十九歲時的毛澤東。





北伐前夕，毛氏加入國民黨，任農民部長，在廣州開辦講習所，圖為其演講時情形。



此幅圖片約攝於「富田事變」前後，毛氏當時在黨內備受歧視，鬱鬱不得志，展望前途，正是茫茫一片，惶恐之情，不免形之於色。



上圖：在延安時的毛澤東與影星藍蘋（即當今皇后娘娘江青），時其夫人賀子珍亦在身邊，後以治病為名，送賀往莫斯科，旋與藍蘋同居。下圖：在延安時的朱德及其夫人康克清女士。



在延安窑洞中，鷄衣百結，今日大陸廣大人民皆穿「百寶裝」，相信乃毛氏要其子民分享他當年的殊榮。



攝於延安辦公室門外。



在延安路上散步。



中國傳統相書上有云：「男人生女相，乃富貴之相」，吾觀之毛主席，信然！



抗戰初期，毛氏為求生存而倡議國共合作抗日，政府允之，至是雙方化敵為友，共軍得以喘息，並實行「游而不擊」的策略，按機會議大自己，毛氏面色此時亦告稍為紅潤飽滿。



戰前夕毛氏的神態。此役爲雙
所謂「盡地一戩」，緊張之情
，心思之苦，可以概見。



此幅油畫乃描繪國共徐蚌大會
方生死關頭，彼此皆如廣東話
自不待言，毛氏腳下煙蒂遍地



1949年天安門上宣讀「換朝文告」時攝。



解放初期，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大同盟」後笑呵呵的神態。





領導全國大躍進時期。一畝田產二十萬斤穀。



下放時期。被劉少奇擠下台，無可奈何，只好下田持鋤，立此存照，笑一笑，聊以解嘲。（——「他媽的，你奶奶的熊，老子有朝一日，定把你劉某人一腳踢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文化大革命時期，（——「不準十八年後，老子而今又是一條好漢。」）







和他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周恩來。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今又重陽。
戰地黃花份外香。

毛氏的書法和詞句：「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份外香。」





毛氏寫字時的神態。





毛氏讀報時的神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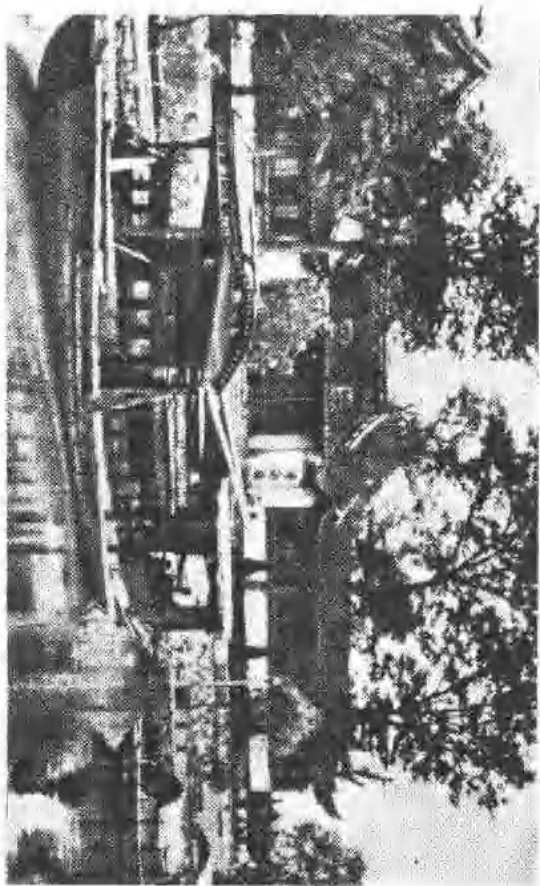
毛氏與人談話時的神態。

四周都是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眼觀美色，耳聽恭維話，真是樂得心也開了花。革了一輩子命，辛苦了大半世，賞心樂事，莫過於此。





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地點——上海法租界漁陽里六號。



1921年7月1日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原擬在上海舉行，後以風聲吃緊，乃改在浙江嘉興南湖一艘船上，詳情見內文「毛澤東與我」部分。



中共所定「八一」建軍節，原日南昌暴動舊址。



舉事前場面，站立講話者為周德，賀龍，坐者乃劉伯誠。



此幅油畫所繪乃當日南昌暴動
恩來，其左為葉挺，其右為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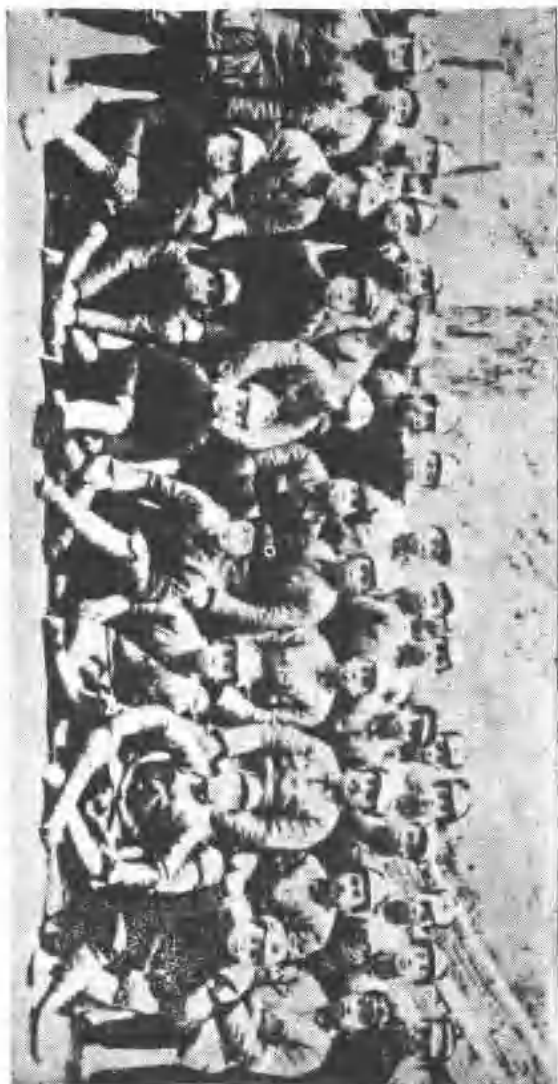
上圖：參加南昌暴動負責財政工作的林祖涵。
下圖：南昌暴動的開路先鋒賀龍。



南昌暴動人物：前排左起第二人郭沫若，第四人李富春，後排左起第二人一碗，第三人林伯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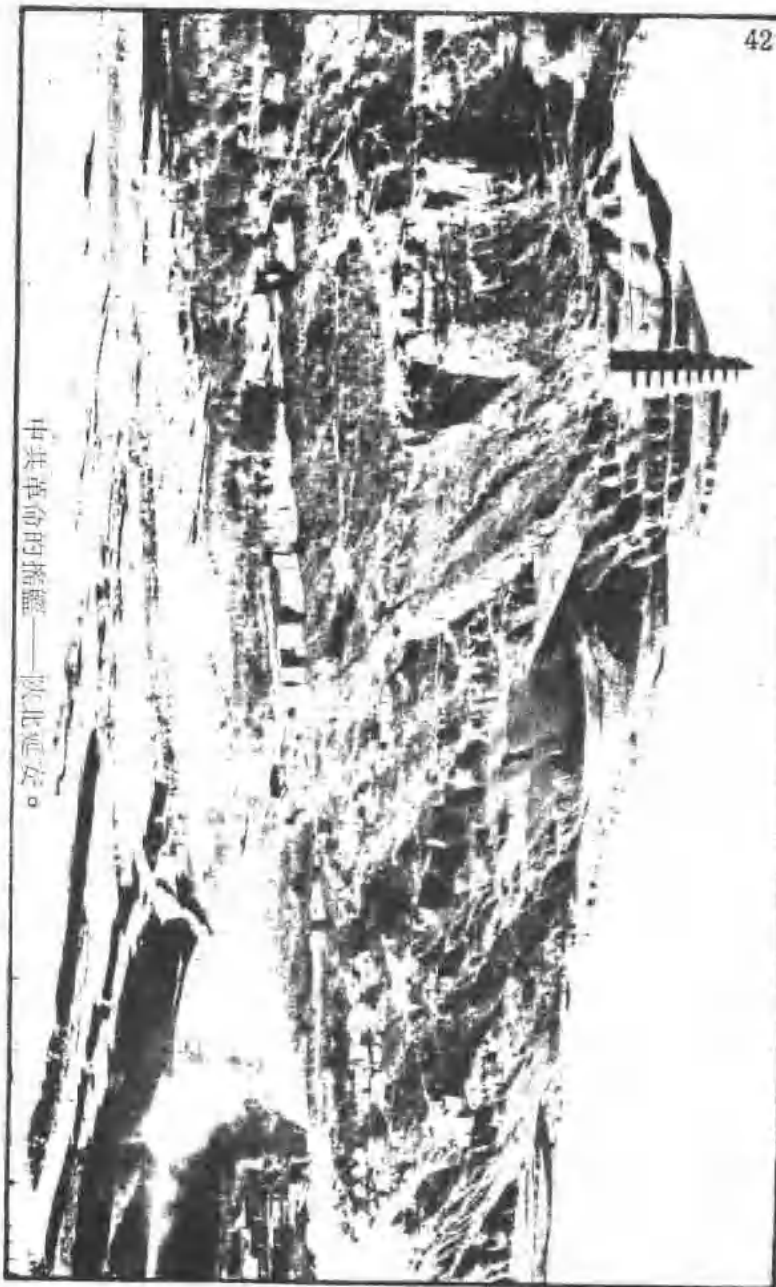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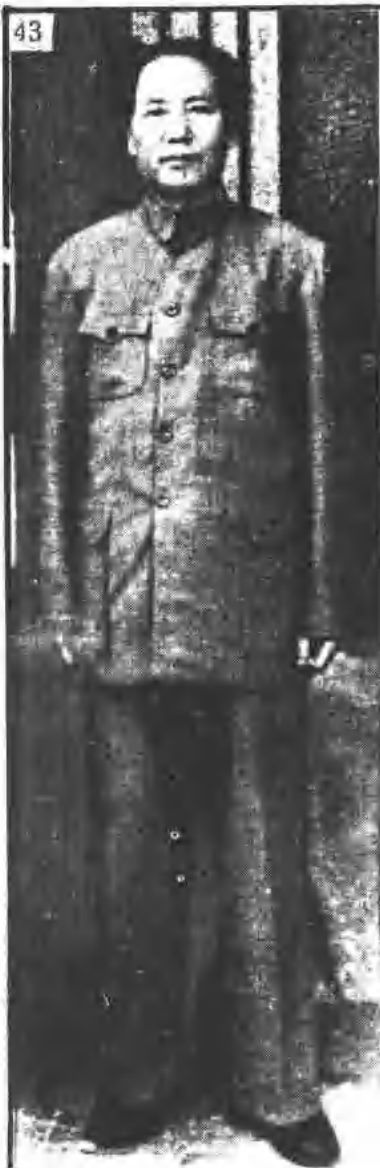
1929年紅軍在江西瑞金成立革命根據地，圖中站立講話者為朱德。



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的部分紅軍，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任弼時，第三人賀龍。

中共革命的搖籃——陝北延安。





延安時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



王明（陳紹禹，右）、博古（秦邦憲）攝於抗戰時，兩人皆為中國國際派人馬。

抗日軍政大學



今日紅朝新貴林彪，當年以廿八歲而出長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可謂意氣風發。



左圖：蔡楊，毛氏少年時代好友蔡和森的妹妹，後嫁與李富春為妻，右為項英，皆攝於延安。



抗戰時爲政府收編的紅軍將領羣像，軍帽上國民黨黨徽隱約可見，圖中人物左起，上排：呂正操、劉伯誠、聶榮臻；中排徐向前、賀龍、林彪；下排：葉劍英、彭德懷、葉挺。



「人生易老天難老」——此句當不適用於毛主席。君不見主席安坐於新華宮內，耳聽天安門外全國七億人民「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的呼聲；敢於鬪爭、敢於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敢於向歷史和人性挑戰，樂也無窮，不知老之將至。

毛澤東自傳目錄

導言

編者

圖片

延安時代的毛澤東與江青

毛澤東與林彪

抗日勝利後的毛澤東

延安時代的毛澤東

革命時代的毛澤東

執掌政權後的毛澤東

毛澤東參加勞働之影

兩萬五千里長征期中的毛澤東

毛澤東于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寫作之影

毛澤東的詞及書法

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的毛澤東

毛澤東的第二任太太賀子珍攝於延安

延安時代的毛澤東與朱德

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時的毛澤東

天安門上的毛澤東與林彪周恩來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之影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大會作政治報告

毛澤東自傳

毛澤東口述
史諾筆錄

一、童年時代

二、長沙時代

三、革命的前奏

四、國民革命時代

五、蘇維埃運動

六、紅軍的生長

毛澤東自傳

毛澤東口述
史諾筆錄

本文作者史諾，是美國名記者，他與中共黨主席毛澤東及其他黨要，具有三十年以上的友誼。當一九四七年間國軍胡宗南部隊攻破延安時，史諾與當時在延安保衛戰中策劃軍事的周恩來，是最後脫離延安的，故說史諾與中共是會有一段共過患難的宿緣。他是中共統治大陸後，第一個獲得美國政府批准訪問紅色中國的美國記者，也同時是中共接受外國記者訪問大陸的第一人。毛澤東的這篇自傳，乃由毛氏于一九三七年間口述，由史諾筆記，是研究與認識毛澤東生平的第一手資料。

—編者—

一、童年時代

我在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我的父親的名字是毛仁生，我的母親未出嫁時的名字是文其美。

我父親是一個貧農，在年輕的時候，爲了負債過多而被迫當兵，他當了很多年的兵。後來回到了就是

我生下來的鄉村裏，做小買賣和一些別的事業，克勤克儉，稍稍積集了一筆小小的款子，他便買回了他自己的土地。

那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從這幾畝田上我們每年可以收六十担穀。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以每人七担計，這樣一年有二十五担的積餘。用這一點剩餘，我父親又積蓄一筆小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田，這樣一來我家就成了「富農」了。那時我家每年可以有八十四担穀的收入。

當我只有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田地時候，家中的五個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一個弟弟和我。我們增加了七畝田地的時候，祖父去世了。却添了一個小弟弟。可是我們依舊每年有四十九担穀的積餘，這樣我的父親慢慢地發起來了。

當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他開始做販運穀米的買賣。用這種方法他又賺了一些錢。當他成了富農之後，他繼續這樣買賣，而且作為主要事業，用了大部份的時間。至於田地的管理則僱了一個長工，此外再叫孩子和妻子都到田地上勞動。當我六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做田地上的工作。我父親並不開商店。他只是從貧農們那裏把穀米收買下來，轉售給城裏的商人，如此他賺到了錢。在冬天做米正忙的時候，他便僱一個短工，所以在這個時候，喫飯的人便增加到七個。我們喫得很省，但總是喫得很飽。

當我八歲的時候，我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校裏讀書。在那裏我一直讀到十三歲，早上和晚間我在田間工作，白天我讀孔子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頑固派，粗暴而嚴厲，常常痛打學生。為了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我不敢回家，因為怕挨打。我莫明其妙地走向縣城去，以為縣裏是在某處的一個山谷裏。精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裏找到了。我這纔知道我這次旅行，只是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這許多路，還沒有離開我家八里之外。

可是，在我回家以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形有點改善了。我父親的暴厲態度比從前稍微好一點，

而教師也溫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動得到如此的結果，使我深受了影響，這是一個勝利的「罷工」啊！

等我學會了幾個字之後，我父親開始叫我記家裏的帳。並且叫我學習打算盤。因為我父親面執着要我學這些事，所以在晚上我就開始學習這些東西了。他是一個很嚴厲的教師，對於我的懶惰，常常表示厭恨。假如沒有帳記的時候，他仍叫我到田間去工作。他爲了性情暴戾，所以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們。關於錢這樣的東西，他不給我們，而且給我們吃最不好的東西。每月十五日，他對於他的工人們，特別開恩而給他們雞蛋和吃飯，可是永遠沒有肉；而對於我則既無肉又無蛋。

我母親是個和善的女人，寬厚而富於情感，永遠願意把所有分給別人。在飢荒的時候，她可憐那些窮人們，常常送米給他們。但當我父親在面前的時候，她却不能這樣做，因爲他不贊成慈善的。關於這一件事，在我家裏常常有口角發生。

我們家裏分爲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在朝的執政黨。我，和我的母親，我的兄弟，有時候甚至二人們所組成的，是在野的反對黨。可是在反對派的「聯合戰線」上，意見不能一致。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她極端反對任何明顯的情感的表现，也不贊成對統治力量的公開反叛。她說這不是中國人的辦法。

但當我十三歲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方法，便是引用經書或是用父親自己的話，作爲我自己有力的辯護。我父親慣用不孝和懶惰這兩種罪名來責備我。我却引用經書上的話來說服他，說父慈則子孝。說我懶惰，我則用長者應該比後輩多做些事的話來反駁。我說你年紀比我大三倍以上，所以應該多做工作。而且我宣言：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的力氣要比他大得多。

這個老年人——我的父親——繼續「積聚財產」，後來大家竟稱他爲這個小鄉村裏的大財主。他不再用購買的方式來增多土地，却接受了許多別人田地的抵押，他的資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對他的不滿繼續增加。在我們家庭裏，辯證法的鬥爭是始終不斷地發展着（註一）。我特別記起一件事，當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我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來。正當他們還在的時候，我們兩人發生了爭論。我父親當着大家的面，責備我，說我貪喫懶做。這件事觸怒我了。我責罵他，而且要脫離家庭。我母親跑着追，竭力勸我回去。我父親也勸我，可是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了一個池子旁邊，用自殺來要挾，說若是他再走進一步，我就要投水。在這種僵局之下，爲了停止內戰起見，雙方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我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賠罪，作爲求饒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允許不對我，則我可以跪一隻腳磕頭。於是戰爭便在這樣的條件下停止了。從此我知道了，當我用公開反叛的方法來保護我的權力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寬和了些；反之，當我保持馴善服從的時候，他只是罵我打我更甚。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爲我父親用嚴厲態度作爲教子的政策失敗了。我學會了去仇恨他，我們反對派真正建立了一個聯合陣線去對付他。因爲這樣總是對我有利。如此之後，我的工作也勤快些；我很仔細地記帳，他也沒有批評責備我的口實了。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字，記帳一事是足以勝任的。我母親是目不識丁的。他們兩人都是從農家出身，所以我成了家庭裏的「學者」。我讀會了經書，可是不喜歡經書。我最喜歡讀那些中國的傳奇小說，而對於那些關於叛變的故事尤其喜歡。我讀過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志和西遊記。那時候我還年幼，是在我的老師謹慎提防之下偷讀的。我的老師恨這些非法的書籍，認爲都是壞書。我常常再把這些書帶到學校裏去讀，當老師走過的時候，就用一本書經把牠們掩住，我的許多同學也都這樣做。有許多這樣的故事，我們幾乎都能背誦了，而且常常再三地討論。像這種故事，我們所知道的比鄉村裏的老人還要多。他們也愛聽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們互相交換講述。我相信這些書對於我後來影響很大，因爲這些都是在記憶力強盛的年紀裏讀的。

最後我離開了小學，其時我是十三歲。我開始整天在田間幫助傭工工作，白天做一個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間就替我父親記帳。可是我還能够繼續讀書，除了經書之外，我一有機會就吞嚥一切我所能夠找到的東西。這事使我父親很懊惱，他希望我能熟讀經史，特別是在他有一件訴訟失敗了之後，事實是如此，他的對造在法庭上引用一句很適合的經典，結果他敗訴。我常常在半夜裏，把我房子裏的窗戶遮沒，使我父親看不見燈光。就用這樣的方法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這書的作者們，是一些老的改良主義者，他們以為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是因為缺乏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汽船等等。他們想介紹這些東西到中國來。而我父親却以為看這些書籍，是徒然費時失事。他相信我學一些經書一樣的實用東西，可以使他在訴訟中得到勝利。

我繼續閱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到一件事，就是不知爲甚麼，在這些小說裏面，沒有關於耕種土地的農民的事蹟。所敘述到的人物，不外是些戰士，官吏，或者文人；永遠看不見一個農民人物。對於這一件事，整整有兩年，我得不到解答，後來我把小說的內容加以分析。我發現了小說裏面的人物們都是有武力的名人，人民的統治者，他們都不必從事操作，因為他們是土地的所有人，很明顯地是有着農民們在代他們工作的。

我的父親毛仁生，早年中，都不是一個信神的人。可是我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把佛教的教訓給予她的孩子，而我們也會對於父親的不信神表示焦慮。當我還只是九歲的時候，我會經和母親鄭重其事地把父親不相信神的問題加以討論。那時和那時以後，我們用了許多方法想勸醒他，可是結果失敗。他只罵我們，我們受了他攻擊的威脅，只好讓步，另想別法。但是他總是不願意和神們有所往來。

可是，我所閱讀的書籍，開始慢慢地在我的思想上發生影響，我自己也慢慢地對神的信仰開始懷疑了。於是我母親爲我憂慮，責備我對於信仰儀式的不虔誠。可是我父親毫無表示。後來，有一天，他出門去

收賬，在路上，他遇見了一隻老虎。這隻老虎看見他，忽然慌張地逃跑了。可是我的父親更覺得驚恐了，事後他對於這次神秘的脫險，總是不能忘懷。從此以後，他開始虔信佛教了，並且常常燃香點燭。但是對於我的與日俱增的無神論，老頭兒仍然置之不問。只是當他遇見困難的時候，自己向神祈禱。

「盛世危言」使我發生了恢復學業的願望。對於在田地上的工作漸漸感覺利厭倦。我父親當然反對我。我們常常爲了這件事而爭論，最後我說離了家庭。我走到一個失了業的學法律的學生的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此後，又從一位中國老學者讀了些經史古籍，也讀了許多時務文章和一些新書。

在這個時候，湖南發生了一件事，那事情影響了我的整個生活。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校外面，我們學生看見許多豆商從長沙回來。我們問他們爲甚麼都離開了長沙。他們則告訴我們城裏面的一件大事變的始末。

那年有一次嚴重的飢荒，長沙有成千成萬的人流爲餓殍。災民們派了一個代表到撫臺衙門裏請求救濟。但撫臺粗暴地回答他們說：「爲甚麼你們沒有飯喫？城裏多得很呢。我常常喫得很飽的。」當人民聽到了撫臺這樣的答覆，他們怒吼了。他們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並且發動了一個遊行示威。他們攻打滿洲衙門，斬斷了作爲官廳的標誌的旗杆，逐走了撫臺。事後，戶部派了一位姓張的大員，騎馬出來，曉諭人民，說政府正在想法幫助他們。很明顯的，這個姓張的約言，的確是很誠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歡他，責備他和「亂黨」勾結。受到撤職的處罰，接着來了一個新撫臺，立即下令逮捕事變領袖，許多人被梟了首，掛在旗桿上示衆，作爲對將來「謀反者」的一種警告。

對於這件事變，我們在學校裏有好幾天的討論，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大多數學生們對「謀反者」表示同情，但他們都只是一個旁觀者的觀點來看，他們不明白這是對於他們切身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他們之感覺興趣的原因，只是因爲這是一件驚人的事變。我却覺得「謀反者」們都是些像我自已一樣的普

通人民，所以我對於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非常痛恨。

不久之後，在韶山的哥老會（註二）和一個地主之間發生了一種衝突。這個地主到法院裏去控告他們。因為他很窮，所以很容易地得到了一個對他有利的判決。哥老會敗訴了，可是他們不但不屈服，反而反叛了地主和政府，逃到本地一個叫剝山的山裏，建築了一個強固的根據地。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並且散佈謠言，說當哥老會舉起造反之旗的時候，曾經殺死一個小孩子去祭旗。反叛者的領袖，是一個叫做龐鐵匠的。最後他們被壓制下來了，龐鐵匠被逼逃跑。後來他終於被逮捕了，殺了頭；可是在我們學生看來，他確是一個英雄，因為他們都同情這一次的叛變。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在我們鄉裏糧食異常缺乏。窮人們向富農要求幫助，他們開始了一種叫做「喫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雖然糧食缺乏，可是他仍然從我們鄉裏把大批穀運到城裏去。他運出的一批米被窮苦的鄉人扣留了，於是他忿不可當。我對他不表同情，可是同時我對於鄉人們的方法也不滿意。

在這個時候，在我們本地的小學堂裏出現了一個「維新派」教員，他在我思想上產生了另一種影響，他是「維新派」，因為他反對佛教，想要驅除神和上帝。他勸人民把廟產興學，他是一個遭受指摘的人物。我稱讚他，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接連發生的事情，在我年青的心靈上，留着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我的心靈早已是反叛的了。在這個時期中，我也開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特別是在我讀過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這本小冊子開頭就是那麼一句：「嗚呼，中國覆亡有日矣！」它敘述日本如何佔領高麗、臺灣、和中國在安南、緬甸等地方主權的喪失。在我讀到了這些話的時候，我對於祖國前途，覺得非常可憂。我開始認為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人民的天職。

我父親已經決定把我送到湘潭一家米店裏去當學徒，這家米店他很熟識。在起初我也不反對，覺得這或者是很興味的事。可是後來我聽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新學校，我便不管我父親的反對，注意到那裏去。這學校是在湘鄉縣我外婆家地方。我的一個表弟是那裏的學生，他告訴我這個新學校和「新教育」的改革情形。那裏不注重經書，而注重西方的「新學」。教的方法，也是很「維新」的。

我和我的表弟到那裏去報了名。我說我是一個湘鄉人，因為我誤以為這個學校是專為湘鄉人開的，到後來當我發現了這學校不限籍貫的，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貫。在這個學校裏，我繳了一千四百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及書籍用品費。最後我父親對於我進這個學校的事同意了，因為許多朋友，竭力主張這個學校可以增加我的賺錢能力。這是第一次我走到離開家裏五十里路遠的地方，那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學校裏我讀到了自然科學和一些西方學間的新科目。另一個可注目的事情是其中有一位教員是日本留學生。他戴着假辮子。可是很容易看出來辮子是假的。人們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有這許多兒童們在一塊。他們大多是地主們的弟子，穿着很值錢的衣服；農民們能夠供給子弟們到這樣的一個學校來是很少的；我穿戴比別人寒酸，我只有身較為體面的衣服。學生們不穿大褂，只有教員們縫穿，而洋服則只有「洋鬼子」縫穿。許多湘學生都看不起，因為我平常穿的衣服總是破爛不堪。可是我也有湘學生做朋友，有兩個同伴特別知己。這兩個中有一個是現在的作家，住在蘇聯。

我不被人喜歡的另一原因是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校裏，湘鄉人是很關重要的。而屬於湘鄉的某鄉則更重要。湘鄉有上、中、下三鄉，而上下兩鄉，為了地域關係，總是不斷地鬥爭。這一鄉的人不肯和另一鄉的人並存。我在這一個鬥爭的局面裏嚴守中立，因為我並不是湘鄉人。結果三方面的人都瞧我不起。我覺得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這個學校裏我進步很快。教員們都喜歡我，特別是那些教古書的教員們，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我卻無心於經書，我正在讀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報，敘述着康有為的維新運動。一本叫做新民意報是梁啟超主編的。我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了。我崇拜着康有為和梁啟超，對我的表兄非常感激。那時候我以為他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一個反革命者，土豪劣紳階級的一份子，在一九二五到二十七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營壘。

許多學生不喜歡那個「假洋鬼子」，爲了他的那個假辮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講述關於日本的事情。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還記得幾句美麗的句子：

小雀唱歌，

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最可愛的，

石榴花紅，

楊柳葉綠，

彷彿是一張新的圖畫。(註三)

在那時候我只感覺到日本的美，在這個歌裏感覺到她戰勝帝俄的一些驕傲和威力。我沒有想到也會有一個野蠻的日本——像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一樣。

這便是我在「假洋鬼子」那裏所學到的一切。

到這個時候我纔知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兩人都死了——雖然新皇帝宣統（現在的溥儀）已經統治了兩年。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君主制度的人；實在，我還認爲皇帝以及官吏們都是很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中國只要康有為維新的幫助。我那時埋頭讀古史，對於堯、舜、秦皇、漢武等的政績大爲嚮往。那時候

我也讀了一些外國史地。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論文裏，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一名詞，裏面有這樣的句子：「在八年的艱苦戰爭之後，華盛頓獲得了勝利，建立了他的國家。」在一本叫做「世界英雄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侖、喀德爾女皇、彼得大帝、惠靈吞、格蘭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

(註一)毛氏追述到這些事，老愛引用這些幽默的政治名字，來當作說明，而一邊大鑿笑着。

(註二)就是賀龍曾加入過的秘密團體。

(註三)這首詩歌，顯然是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春天的慶祝勝利宴會中所唱的。

二、長沙時代

我開始想要到長沙去。這是一個大城，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二十里之遙。聽說這個城是很大的，裏面有許多許多的人，許多的學校，以及舞台衙門。總之她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那時候我很想到那裏去進一個專為湘鄉人設立的中學。在那年冬天，我請求我的一個高等小學裏的教員介紹我到那裏去，他允許了。我步行到長沙，非常地興奮，又恐怕也許會不准我進城，根本不敢希望我真會變成這個大的學校裏的一個學生。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居然毫無困難地進去了。但政治急變，我在那裏只住了半年。

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這是一種民族革命的日報，登載着廣州反對滿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難。這件事情是由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的領導發動的，我被這故事深深地感動了，覺得民立報充滿了富於刺激性的材料。這報是由于右任主編的，他後來變成一個著名的國民黨領袖。在這個時候我也知道了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的綱領，國家這時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興奮得如此，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裏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我的政治意見，思想是很混雜的我還沒有放棄我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的崇拜，並且也不十分明瞭他們中間的不同。所以我的論文裏，我主張應該把孫中山先生從日本召

回來就任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做國務總理，梁啟超做外交部長。

反對外國投資運動因了川漢路的建築而開始發動了，同時人民對於立憲的要求普遍地傳播着。皇帝對於這個回答，只是下旨設立一個咨政院。在我的學堂裏的學生愈來愈趨激烈了。他們用反對豬尾巴（辮髮）的手段來表示他們排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把我們的豬尾巴先行剪去，但別的一些起先答應也要剪去的人，到後來都遲疑地反悔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而且後來用強迫手段把他們的辮子剪去，做我們的辮子的犧牲者有十餘人之多。這樣子，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一躍而為主張取消一切辮子的人。政治思想之改變人的觀點的力量真大啊！

我和一個在法學堂的朋友發動了對於豬尾巴故事的大辯論，雙方都提出相反而對立的論據。這個法律學生以經書為辯論的根據，堅持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我自己和其他反對者，站在排滿的政治立場，提出了一種反對的理論，駁得他們體無完膚。

在黎元洪領導下的武昌起義發生之後，湖南宣佈了戒嚴令，政治局面變換得很劇烈。有一天，一個革命黨得到了校長的允許，到中學堂裏來作了一次驚人的演講。在大會上七八個學生站了起來，對滿清加以猛烈的攻擊，辯護他的主張，並且號召建立民主國家，人們都全神灌注地諦聽着。當那個革命的演說家——黎元洪的一個官吏——在被激動起來的學生前演說的時候，會場裏面差不多連呼吸的聲音都停止了。

聽了這一次演說之後四五天，我決定要加入蘆覓洪的革命軍。我和幾個朋友從同學那裏集了一些錢，決定到漢口去。聽說漢口的街道是很潮濕的，非穿雨鞋不能行走，我就到一個在軍隊裏的朋友那裏去借皮鞋，這軍隊駐紮在城外。我被駐防的軍隊攔住了，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很緊張。兵士們已經發給了子彈，他們正向這邊衝過來。

叛軍已經沿着粵漢鐵道線前進，戰爭爆發了，在長沙城外發生了一次大戰。同時城裏面起了一個叛變

，城門被中國工人攻佔。我得了其中一個工人的援助，得以進了城。接着我便爬到一個高地上去觀戰，直等到我看見了「漢旗」在衙門上飄揚——所謂漢旗也者，是一塊白布中間有一個「漢」字——我才回到校裏，其時牠已經在軍隊守衛之下了。

第二天一個都督府組織了起來，哥老會裏兩個有名的會員被舉爲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是設在以前省諮議局的房屋裏，議長是譚延闓。原來的省諮議局被取消了。在革命者所搜查出來的滿清文件裏，有幾份請求召開國會的呈文，原稿是徐特立用血寫成的。徐氏現在已經六十歲了，現在是蘇維埃政府的教育委員。那時候他把他的手指斬斷，以表示他的誠懇的決心。他的呈文的開頭是下列兩句話：「請求召開國會，予向諸君（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斷指告別。」

新都督和副都督都存在的時期很短。他們倆並非壞人，的確頗有些革命意志的。但他們很窮，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於是地主和商人對他倆表示不滿。沒有幾天之後，當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兩個人的屍身躺在街上。譚延闓對他們發動了一個有組織的叛變，原來譚氏是湖南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啊。

這時候有許多學生投軍。一隊學生軍已經組織成功。在這些學生軍裏有唐生智。我不喜歡學生軍，牠的基礎太混雜了。我決定改變方針參加正式軍隊，真實地幫助革命。那時候清帝還沒有退位，所以這個戰鬥時期經過相當長久。

我在軍隊裏的餉銀是每月七元——可是這已經超過我現在在紅軍裏所得的餉銀了。這七元錢我按月用去二元伙食。我還要買水，因爲兵士必須要到城外去挑水進來，但是我是學生出身，不願意去挑，只好向挑水夫買水用。我每把餘下來的錢，都花在報紙上，我對於讀報一件事簡直有些兒瘋狂。鼓吹革命的報紙有湘江日報。裏面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就在這欄中，第一次學習了這一名詞。我也和別的學生們和兵

士們討論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只是「社會改良主義」而已。我讀了一些江亢虎的關於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理的小冊子，我很熱心地寫信給好幾個同級的同學，討論這一問題，可是他們中間只有一個寫回信給我，並且表示同意。

在我那一隊裏，我最喜歡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其餘的都是鄙俗不堪，甚至於有一個是流氓。我曾經勸說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我和營長以及士兵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關係。我館寫，讀過不少書，他們對於我的「大學問」都表示尊敬。我可以幫助他們寫信，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革命到這時還未定局，清朝還未完全放棄政權。而在國民黨中，却發生了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人們都說湖南免不了要爆發第二次的戰爭。有許多的軍隊組織起來，反對滿清，反對袁世凱成立了和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被解散了。我覺得革命已經過去了，就決定退出軍隊，回到書本上去，我只當了半年兵。

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那時候正有許多學校在開辦起來，而以報紙為媒介，吸引新的學生。我對於學校的好壞沒有一定標準來評判，對於進什麼學校也毫無主見。可是當我投考以前，我看見了一個「肥皂製造學校」的廣告。不需要什麼學費，供給膳宿，並且還稍有津貼，這是很引人注意而且足以鼓舞人的廣告。它說了許多關於製造肥皂如何與社會有利的話，說它會如何能富國利民。於是我便改了我的投考警察學校的方針，而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那裏也交了一塊錢的報名費。

在這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成了一個法政學生，他催促我進他的學校。這個法政學校，我也讀到了它的一則誘人的廣告。這廣告預約着許多美妙的事情，牠允許在三年中教完一切關於法律知識的學程，並保證三年畢業之後，學生會立即變成京官。我的朋友不斷地在我面前讚美這個學校，直到最後我寫信給家裏，把廣告上所預約的一切複述一遍，請求他們寄學費給我。我把將來做法官和京官的前途，對家裏描畫成一

幅光明的圖畫。我就在法政學校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一方面等待着父親的回信。

命運又由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形式來攔阻我了。另一位朋友向我建議，說國家現在正是在經濟戰爭之中，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立國家經濟專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也在這個商業中學裏付了一元的報名費。結果我投考而且被錄取了。可是同時我還繼續看廣告，有一天我讀了一則廣告，述說一個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好處。這是由政府主辦的。課程很豐富，聽說教員們也都很能幹。我決定了最好是能在那裏學成一個商業專家，就又付了一元錢的報名費，以後寫信給我父親，告訴了我的決定。他很高興，我父親是素來讚美經商的。我進入了這個學校，只住了一個月。

我發現了我和這個新學校之間有困難存在，因為那裏有許多功課的講授是用英文的。我和許多別的學生不同，英文程度甚低；簡直只知道字母。覺得這種局面是很討厭，便在一個月的末尾退了學，我又繼續着翻閱廣告。

我第二次的學業冒險，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用一塊錢報名，經過了入學考試，發榜時以第一名錄取。這個學校很大，學生很多，畢業生也是很多的，那裏有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我愛好文學，所以很喜歡和這位教員接近。這一位教員借一部「御批通鑑」給我，書裏面有乾隆皇帝的聖旨和御批。正在這個時候，長沙的官辦火藥廠爆炸，起了很大的火，可是我們學生都覺得這件事新鮮有趣。好幾噸的子彈和炸彈都爆發了，火藥燃燒起來變成一片很強烈的火焰，比起爆竹來要好看得多了。一月以後，譚延闓被袁世凱所驅逐。袁氏那時正操縱着民國的政治機構。湯薊銘代替了譚延闓，而他開始替袁氏籌備登基。

我對於第一中學不大喜歡。牠的課程限制得很嚴，規則也是一無足取。在讀了御批通鑑以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如果我自己讀書自己研究，也許對我更為有益。六個月以後我便離開了學校，自己排了一個

自我教育課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裏去讀書。我對於這件事很規矩很認真。在這樣的方法之下所耗去的半年，我認為對我是極有價值的。每天早晨當圖書館開門的時候我就進去，在正午的時候，我僅僅休息片刻，去買兩個糕餅吃，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圖書館裏，直到牠關門才出來。

在這個自我教育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讀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在這裏我第一次看見了世界地圖，並且很有興趣地加以研究。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莎的「羣學論旨」和一本孟德斯鳩寫的「法意」。詩、小說、古希臘的故事，和關於俄、美、英、法以及別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的研究，我把他們胡亂混在一起了。

這時我冒充了湘鄉縣人住在同鄉會館裏。有許多兵也住在那裏，都是些從縣裏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們無所事事，而且都是很窮。在會館裏學生和兵士常常吵架，有一天晚上，這種仇怨爆發，繼之用法。兵士攻擊並且想打殺學生們。我躲到廁所裏，頂等「戰爭」結束以後纔出來。

那時候我沒有錢，我的家裏不肯供給我，除非我進學校。因為我不能夠再在會館裏住下去了，便開始找尋新的住所。同時我正在認真地思索我的前程，認為我最適宜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一則很動人的佈告，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興趣勃勃地研究牠的好處：不需要學費，膳宿費也很低廉等等。我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去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試驗的論文。我把我的計劃，寫信告訴我的家庭，並且得到了他們的允許。我替我兩位朋友寫了論文，自己也寫了一篇。結果三個人都錄取了——所以實際上我錄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以為我為朋友捉刀的行爲，並不是不道德的，只是一件友誼事情而已。

我在師範學校做了五年的學生，對於後來一切的廣告的引誘，不再注意，最後我確實得到了畢業文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生活中遭遇了不少的重要事情，而在這個時期中，我的政治觀念

也開始形成了，在這裏我把在社會行動中的最後的經驗學會了。

在這個新學校裏有許多規矩，而我對於這些規矩贊成很少。我反對自然科學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我特別不感興趣，我不願意讀。所以在這些課程裏，我得到的分數都很低。我所最恨的是靜物寫生的必修課程，以為這是極端愚蠢的事。我往往只想些能够畫的最簡便的東西，很快地畫完了就出教室。我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面加上一個半圓，說是代表李白詩「半壁見海日」一句。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中我畫了一個橢圓形，說這就是蛋，自己認為滿足了。圖畫這門課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會科學課程都很好，所以一平均，我的別種低級分數都給扯過了。

這裏的一個中文教員，學生們替他起個綽號叫袁大鬍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說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瞧不起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經是我崇拜的人，我被迫只好改變我的文章作風。我就閱讀韓愈的文章，學習了舊的古文辭藻。所以敬謝袁大鬍子，假使是需要的話，我今天還能够寫出一篇可觀的古文。

對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是英國留學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他教的是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堅決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把一種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於社會的人的志願，灌輸給他的學生們。受了他的影響，我讀了一本關於倫理的書，是蔡元培翻譯的。我讀完了這本書之後寫了一篇論文，題名叫做「心智的能力」。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我的論文很受楊昌濟老師的稱讚。他給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從他的唯心觀點來批評的。

一個姓唐的教員常常給我一些舊的民報看，我讀他的時候興趣極為濃厚。在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的綱領。有一天我看見民報上登載着兩個中國學生徒步旅行中國，一直到了西藏邊境的打劍爐的事。這件事非常地鼓勵着我，我想要摹倣他們，但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應當先辦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於是第二年夏天我步行蒞歷湖南省，走遍了五縣，和我一起的是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我們走遍了這五縣，不費一文錢。農民們供給我們喫食，供給我們睡覺地方；我們足跡所至都受很好的招待與歡迎。這一個和我一同旅行的蕭瑜，後來成爲在易培基手下的一位國民黨官吏。易氏那時就是湖南師範的校長。

爲了感覺到要向外發展非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伴侶不可，有一天我就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對有志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絡。我特別提出能耐艱苦有決心而能爲祖國犧牲的條件。後來我收到了三封半響應的信。一封是羅章龍的回信，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叛變了。兩封是從兩個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寄來的。那所謂半封回信是一個沒是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所說的一番話之後，他自己並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我們的友誼永遠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圍攏集了一羣學生，這羣學生後來就是新民學會的核心，這個學會對於中國的國事和命運，有着廣大的勢力。她是一小羣態度極爲認真的人，絕對不討論身邊瑣事的。他們所說所做，必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來談情說愛，而且認爲時局是太危急了，學問的需要是太逼切了，要討論女人或私人事情根本沒有時間。我對於女人不感覺興趣。在我十四歲時，我父母替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同居過——後來也一直沒有。我不承認她是我的妻子，而在這個時候，我一點兒也不想念她。關於女人的「媚人」的討論，在那時候的青年生活中，通常是佔有重要的一頁，可是我的同伴們不僅不討論這個，即使是日常生活普通事情，也拒絕討論。我回憶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裏，這位青年對我談起要買些肉，他在我的面前把他的僕人喚來，向僕人討論了半天買肉的事，纔叫他去買一小片肉。我心裏非常不安，以後就不再和這位青年見面了。我和我的朋友們，只高興談論大事情——中國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

我們也成了熱烈的體育鍛鍊者。在冬季假期裏，我們在田野裏走着，上山下山，繞行城牆。澧河過江

。假如遇見下雨，我們就把衣服脫下，說這就叫「淋浴」。當太陽很熱的時候，我們也把衣服脫下，說這就是「日光浴」。在春天裏我們大聲叫着，說這是一種叫「風浴」的新遊戲。已經下霜了的日子，我們還要露宿，甚至於在十一月裏，我們還在冷水裏游泳。這些一切都是在「鍛鍊身體」這一個名詞之下進行的。也許這件事對於我的體格，的確有不少幫助，因為後來我在華南許多次的進退行軍裏，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裏，得益匪淺的。

那時候我和許多在別的鄉鎮城市裏的學生和朋友們，組織了一種很廣大的通信關係。慢慢地我開始覺得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幾個別的朋友，發起組織新民學會。這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這七八十人中有許多人後來都變成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曾經加入過新民學會的較爲著名的共產黨員有：羅邁——現在黨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第二方面軍裏面；何叔衡——中央蘇區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槍殺；郭亮——有名的工人運動的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槍殺；蕭子璋——作家，現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槍殺；葉立雲（譯音）中央委員，後來叛變投降國民黨，變成資本家工會組織者；蕭鈺（譯音）黨的著名領袖，黨成立時最初綱領的六個簽名者中之一，不久以前病故。新民學會會員的大多數，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槍殺了。

大約在同時候另一團體組織成功了，這是湖北的「社會福利社」（譯名），是類似新民學會的一種組織。牠的許多會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其中有：溫得應（譯音）——該社社長，在反革命中被蔣介石槍殺。林彪——該社社員，現任紅軍大學校長。同樣，張彥（譯音）——現任白軍工作負責人員。在北平也有一個會社，叫做「互社」（譯音），有些會員後來也加入共產黨。在中國別的地方，主要是在上海、杭州、漢口、天津，一些青年戰士，組織了好幾個急進的團體，開始在中國政治上確立了一種勢力。（註）

這些會社的大多數，多少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響才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還在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喜歡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等等思想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關於「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等，我都有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確定地反對軍閥與反帝國主義的。

我於一九一二年考入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註）這樣的團體在天津的是「覺悟學會」，吸引一些急進的青年到組織裏來，周恩來是創立人之一。此外還有：鄧穎超女士——現在的周恩來夫人；馬鈞，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槍殺；孫肇俊——現任國民黨官吏。

三、革命的前奏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當中，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許多次數的報名費也包括在內！在這個數目中，我要把三分之一耗費在報紙上，因為通常定一份報紙，總是按月一元。我還常常在書攤子上買些書和雜誌，我父親責罵我這種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面。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我沒有走上井崗山以前，我對於北平、上海和湖南的各種日報的閱讀從未中斷過。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裏，母親死了。這樣我回家的興趣更加淡薄了。我決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時候是北京——去。湖南有許多學生都計劃着要到法國去，用「工讀」的方法去讀書。法國在歐戰中用這種

方法招募中國的青年去爲它做工。在離開中國以前，這些學生預備在北平學習法文，我幫助把這種運動組織起來。在這一羣出洋的學生中間，有許多是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後來都變成著名的急進分子。徐特立也受了這一個運動的影響，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員位置，跑到法國去，當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纔加入了共產黨。

我陪了一些湖南學生來到北京。可是，雖然我幫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還有補助，我卻不願意到歐洲去。我覺得關於國家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假使我把時間化在中國，對於祖國是更爲有利。那些決意要到法國去的學生，從李石曾學習法文，可是我沒有，我個人另有計劃。

我在北平覺費用太大，我是從朋友那裏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非馬上找尋職業不可。楊昌濟——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找尋一個職業，他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殺了。李大釗爲我找到了工作，是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八塊錢——數目不算少。

我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人們都不願和我接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記到圖書館來看報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們，都瞧我不起。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像傅斯年、羅家倫之類，我對於他們特別感覺興趣。我想去和他們交換一些關於政治和文化問題的意見，可是他們都是忙人，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南方土話。

但是我並不失望。爲了要旁聽大學裏的功課，我參加了哲學會，新聞學會。在新聞學會我遇見了好幾個同伴，像陳公博，他現在是南京一個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又一躍而成了所謂「第三黨」的一份子；還有邵蘊萍。特別是邵氏，給我很多的幫助。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充滿了熱情理想，是性格良好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槍決了。

當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的時候，我也遇見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加入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三黨（「——史諾」）；還有段錫朋——現在是南京政府教育次長。在這裏我遇見了而愛上了楊開慧女士。她是我從前的倫理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氏對我最有影響，並且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摯的朋友。

我對政治興趣繼續增高，我的思想也越加急進。可是在這時候，我還是很混沌，用一句時髦的話，就是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到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小冊，很受了一些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北大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牠在中國的可能性。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在另一方面，這座古城的美給了我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一間小屋子裏共有七個人居住着。晚上我們七個人挨得緊緊地睡在一個炕上，挨得透不過氣來。當誰要翻身的時候，必須預先警告睡在兩邊的人。但是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廣場上，我對於北方的早春，生了嚮往之情。當北海上面正結着堅冰的時候，寒色的寒梅盛開着。楊柳枝頭懸掛着水晶似的冰柱子倒垂在北海上，使我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天珠玉樹的名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的無數的樹木，喚起了我的好奇和讚美。

一九一九年之初，我和要到法國去的學生一同到上海。我的錢只够買到天津去的車票，到了天津以後，我就沒有辦法向前進了。可是，正像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的，有一位同學從北平孔德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塊錢給我，使我能够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仰孔子的墳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曾經洗過脚的那條小溪邊，也到了聖人渡他的幼年生活的小鎮。曲阜大成殿旁邊有一顆古樹，相傳是孔子植的，靠近後代爲他所立的歷史上有名的廟旁邊，我居然看見了這顆樹。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個弟子——顏淵所曾經住過的河邊停留過，並且也去探訪了孟

子的生長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東的聖山，馮玉祥會在這裏隱居而且寫過些愛國的對聯。可是當我到了浦口，我又分文不名了，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如何能離開浦口。可是禍不單行，車上一個賊又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了。噫呀！怎麼辦呢？但是，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遇着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位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的菩薩。」他借給我買鞋子以及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的錢。這樣我安全的到達了我的旅途——同時對於我的新鞋特別當心了。上海我知道已經有一筆款子募集好了送學生到法國去，同時爲我還預備了一筆錢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們上了輪船之後，我就向長沙進發。

我所記得的，我第一次到北方去所值得紀念的旅行是這些：我在北海溜過冰。曾經繞洞庭湖走過，又在保定的城牆上繞着走了一圈。在三國志裏有名的徐州的城牆，以及歷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繞過一個圈子。最後我登過濟山，謁孔墓。這些事情，那時候我覺得步行遊湖南以外的有價值的成績。

當我回到長沙的時候，我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爲積極。五四運動之後，我把大部分時間，化在學生政治活動上面。我主編「湘江評論」，一種湖南學生辦的報紙，對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影響。我在長沙還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而且特別是新民學會，都猛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一個壞透了的人。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他去職，並且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那時孫中山在那邊已經很活動——鼓動反對他。於是張敬堯禁止了「湘江評論」的出版，作爲學生反對他的一種報復行動。

此後我又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裏發動了一種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又把反張勳爭，擴大而爲普遍的反軍閥的運動，我擔任一個通訊社的社長，來策進這個工作。在湖南這個運動是得到相當成功的。張敬堯被譚延闓所推倒，在長沙建立了一種新的統治局面起來。正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分裂而成了兩派。

——左派和右派——左派堅持一種更遠見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裏我又遇見了陳獨秀，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之影響也許比任何人還大。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曾經去拜訪他，請他能贊助湖南的學生運動。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關於組織「湖南改造聯盟」的計劃，然後我回到湖南開始着手組織。在那裏我竟得了一個教員位置，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裏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綱領——意思是真正的自治。對於北方政府非常不滿，相信假使能够和北京脫離關係，那末湖南的現代化當更為迅速，所以我們的團體竭力鼓吹和北京政府「分離」。我那時是美國的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主義的堅決的擁護者。

譚延闓又被一個名叫趙恆惕的軍閥逐出湖南了。趙恆惕以「湖南自治」為號召達到攫取他私人利益的目的，他假意擁護自治提出中國「聯省自治」的一種主張，可是當他一攫取了政權之後，却用着大力壓制民主運動。我們的團體要求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贊成一種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政綱。我們在自己辦的新湖南報上，公開鼓吹這種改革。有一次我們領導了一次搗毀湖南省議會的活劇，省議會的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一次暴動的結果是把省議會裏所張掛的充滿着胡說霸道和吹牛的詞句的對聯匾額，都扯了下來。

搗毀省議會這件事被認為是湖南的一件大事變，把那些統治者們都嚇慌了。可是，當趙恆惕握得了政權，他背叛了他以前所倡議的一切主張，反而特別猛烈地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們的學會把攻擊的目標轉向了他。我記得在一九二〇年有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學會發起了一個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三週年紀念的示威運動，這示威被軍警鎮壓下來了。有些示威者曾經幻想在會場升起紅旗來，可是被軍警所禁止。示威者指出依照當時的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但是軍警們置諸不理。他們說他們不管什麼憲法不憲法，只知道執行趙省長的命令。從這次以後，我漸漸相信只有由羣衆行動得來的羣衆政治力

量，纔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我第一次以政治爲目的把工人組織起來，並且開始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在我第二次北遊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近況的書，並且熱烈地搜尋一切那時候能够找得到的中文共產主義的著作。有三本在我的思想上影響特別大，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次接受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最正確解釋之後，便從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翻譯的，是用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斯基的階級鬥爭，和刻兒枯模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地也在實踐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以後，我便自認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同年我和楊開輝女士結了婚。（註）

（註）毛氏以後再沒有提到他和楊開輝女士的生活。從種種方面看來，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人。她是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後來成了大革命中的一個青年領袖，最活動的女共產黨員之一。他們是彼當時滬南新青年所慶賀着，認爲是「最理想的浪漫史」。這好像是由一種「試婚制」開始的；而很明顯地他們彼此是很專愛而忠實的。後來，楊開輝女士，大約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槍殺了。

四、國民革命時代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在這個組織中間主要的領袖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兩個人都是中國最有名的知識界的領袖。當我在北大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領導之下，我就很快地發展，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我對於這方面的興趣的發展，陳獨秀的助力也不小。在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我會經和陳獨秀討論過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而陳的堅決的信仰在我生活中，這一個轉變的時期，對於我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

在上海這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那一年的十月，共產黨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而我是委員之一。接着在別的分省和城市中也組織起來。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會裏有陳獨秀、張國燾（現在是在紅軍第四方面軍裏）、楊民哉（譯音）、譚平山、陳公博（現任國民黨官吏）、劉燕青（譯音）、殷秀松、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殺）、李達、李森（譯音）等。在湖北的黨員有項英、譚代英、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學校主席）、許白昊、施洋。在山西的黨員有高宗裕（譯音）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的是李大劍、鄧中夏、羅卓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別的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彭湃（一九二七年被殺）。王盡美和鄧恩鋒是山東支部的發起人。同時在法國，許多工讀學生們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牠的成立差不多是和在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開始的。那裏的黨的發起人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是發起人中唯一的中國女子）。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發起人。在德國也有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不過時間稍遲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莫斯科支部的發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別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時是書記——已經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工會，包含礦工、鐵路工人、僱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等。那年冬天一個猛烈的勞工運動開始了。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而在農民中做的工作很少。大的礦廠的大部分工人，而學生則幾乎是全部被組織起來了。在學生與工人兩方面都有好幾次鬥爭。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恆惕下令槍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譯音）和龐人龍，結果是引起了對於趙恆惕的普遍的公憤。被槍殺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派勞工運動領袖，這一派的基本人員是工業學校學生，是和我們反對的。可是在這一件事件中

，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是援助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俾組織湖南省總工會。可是我們對無政府主義者妥協，經過磋商之後，阻止了他個所幹的許多躁急而無謂的行動。我被派遣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趙恆惕運動。第二次黨大會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在上海開會，我本想是要去參加的。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碰不到同志，所以錯過了機會。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動工會的工作。下一年春天，湖南發生了幾次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與承認工會的罷工。大部分都勝利了。五一勞動節湖南全省舉行一次總罷工，而這次罷工，表明了中國的工人運動，已經到達了空前成功的地步。

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在廣州舉行的。通過了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建立了反抗北洋軍閥的聯合陣線。這時我到了上海，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我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的第一次全代大會。三月裏回上海，一面擔任共產黨黨部的工作，一面又擔任國民黨黨部的工作。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執行委員，除我之外，還有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同工作，調整國共兩黨的行動。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加倫將軍來任顧問，別的蘇維埃顧問也從蘇聯來了。國共的聯盟開始領導普遍全國的革命運動。那年冬天我在上海抱病，回湖南休養。可是回到湖南以後，我把本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組織了起來。

在從前我還沒有充分了解在農民中階級鬥爭的程度，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及接續的政治運動的大波浪當中，湖南農民的鬥爭性纔十分明顯。我離開我在養病的家，開始農村組織工作。在幾月之中我們組織了二十多個的農民協會，惹起了地主們的仇恨。他們請求當局逮捕我。趙恆惕曾派軍隊追尋我，我便逃往廣州去。我到那裏，正是黃埔學生戰敗雲南軍閥楊希閔，廣西軍閥劉震寰的時候，廣州城市和國民黨內部洋溢樂觀空氣。正當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為國民政府

主席。

我擔任了政治週報編輯，這是國民黨政治部的喉舌。牠後來在攻擊和批評戴季陶所領導的國民黨右派，有很活動的勢力。我又負責擔任了訓練農民運動組織者的工作，並且爲這種目的開設了一班訓練班，由二十一個不同的省分的代表來參加聽講，其中有從內蒙來的學生。來廣州不久，我擔任了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其餘林伯渠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的很多。在共產黨內，擔任農民工作的特別任務，根據着我的研究和我在湖南組織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做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另一本叫做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裏所發表的意見。那本書主張一種急進的土地政策和在共產黨內加緊農民組織。陳獨秀拒絕由共產黨中央機關發行這一本小冊子。這本冊子後來在廣州農民月刊和中國青年上發表的。第二篇論文是在湖南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行的。大約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不滿意。我們慢慢地分離了，雖然我們中間的鬥爭，要到一九二七年纔達到最高潮。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工作，直至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企圖實行他的第一次政變。在國民黨左右兩派協調，國共聯合陣線重行確立之後，我又到上海，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這年五月日蔣介石領導召開的。我在上海負責主持共產黨的農民部，從這裏又被派到湖南去視察那邊的農民運動。同時，在國共兩黨的聯合陣線之下，在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歷史上有名的北伐。

我在湖南視察了五縣——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做報告給中央委員會，催促在農民運動裏採行新路線。次年早春，當我到了武漢的時候，舉行了一個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我出席提出建議，主張普遍地把土地重行分配。在這一次會議上，有彭湃、方志敏和兩個俄國共產黨員——約克(York)及高隆(Volun)，決議接受了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五次大會討論。可是中央委員會加以否決

了。

當共產黨中央第五次全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還是在陳獨秀操縱之下。雖然那時候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行動，在上海、南京開始向共產黨進攻，可是陳獨秀還是抱溫和態度與武漢的國民黨相妥協。而且抑制了各方面的反對，採行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那時候我對於黨的政策，非常不滿意，特別是關於農民運動一方面。我現在想起來，假使那時的農民運動，能更澈底地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對地主鬥爭，那勝蘇維埃也許能早一步而還有力的在全國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竭力反對。他不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並且把農民革命在這時候的可能性估計得太低。結果在大革命危機的前夜舉行的第五次全會，不能通過一種完美的土地政綱。我的農民運動應該加速深入的主張，甚至沒有提出討論，因為那時的中央委員會為陳獨秀所操縱，拒絕提出來考慮。全會議決以「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這樣就把土地問題拋開了。用這一個地主的定義，要想發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完備而沒有事實根據的，而且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土地經濟的特殊性。可是，會議之後，一個全國農民協會組織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不管共產黨對牠的態度如何萎縮，和國民黨對牠如何岐視，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高級長官和軍隊司令們開始要求鎮壓這種農民運動，他們稱農民協會為「流氓協會」，認為牠的行動和要求都太過火。陳獨秀把我從湖南調開，認為我應對湖南所發生的那些事情負責任，並且猛烈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領導之下，舉行了對於有組織的工人們的大屠殺，廣州也實行了同樣的舉動。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事變，好幾千個農民和工人被反革命份子所槍殺。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和共產黨的合作，把共產份子從國民黨裏以及武漢政府裏驅逐

出去，可是這武漢政府不久也消聲匿跡了。

這時候許多的共產黨領袖們接受黨的命令離開中國，到俄國、上海或別的安全地方去。我被命令到四川去。我請陳獨秀派我到湖南去做湖南黨省委書記。可是十天之後，他又急急地下令我回來，責備我組織反抗唐生智的暴動。唐那時是武漢的統治者。黨務在這時候混亂不堪。差不多每一個人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最後武漢國共合作的崩潰，促成了陳獨秀領袖的沒落。

五、蘇維埃運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賀龍、葉挺領導之下的第二十軍，和朱德合作，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南昌暴動，這就是紅軍組織的開始。一星期後，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開除了陳獨秀的書記職務。我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會議以來，一直是黨政治局的一員。對於這個決議，我是主動的。在這次到會的其他十個人之中，有：蔡和森、彭孔塔（譚普）和瞿秋白。黨採取了新路線。一切和國民黨的合作的希望，是暫時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十足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再自起民主革命的責任來了。長期的政治權力的公開鬥爭，就此開始了。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暴動」的這個運動。我在那裏的計劃是要實現下列五點：（一）省黨部完全脫離國民黨，（二）組織工農革命武裝隊伍，（三）沒收中、小、大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共產黨的勢力，和國民黨脫離關係，（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在那時候為共產國際所反對，直到後來，牠纔把這一點提出來作為口號。

當九月間，以湖南的農民協會為出發點在發動普遍的暴動上，我們已經成功了。工農軍隊的基本單位也已成立。入伍者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漢陽礦工，和國民黨軍隊中的譚斐部隊。這早期的革命武裝隊

伍，被稱爲「工農第一軍第一師」，其中第一旅是由漢陽礦工組成的。第二旅是由平江、瀏陽、醴陵以及湖南另外兩個縣分裏的農民保衛隊組成的，第三旅是由叛棄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隊的一部分組成的。這一支部隊組成是得到湖南省委的准許的，但湖南省委員會及我們的軍隊的一般綱領，却爲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那時時的中央委員會，只是一種觀望政策，並不積極反對。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在漢陽礦工和農民保衛隊之間奔走的時候，我被與國民黨通聲氣的一些民團捕獲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手段正達到牠的最高點，整百的有嫌疑的紅黨被槍決了，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槍決的。我從一個同志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想賄賂押送人員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唯利是圖的，我的遭受槍決，對於他們沒有特別利益，他們已經答允釋放我了，可是負責的隊長不肯。所以我決定打算脫逃，不過直到離民團總部不過二百碼的地方，我纔得到了脫逃的機會。在這個地點，我把繩子扭斷，逃到田野裏去躲着。

我走到一個高地地方，在一個池子的上面，四周有長得很高的草，在那裏我躲着直到日落。兵士們搜尋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我。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碰得到他們了。可是我始終沒有被發覺，雖然有五六次，我認爲已經無望，覺得我是一定要再被捕獲了。到後來，黃昏到了，他們不再搜尋我了。我馬上出發，爬山越嶺，整夜地跑着。我沒有鞋，腳上起了泡，在路上我碰到了一個農民，他待我很好，允許我借宿，後來又領導我到了鄰縣。我身邊還有七塊錢，用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保衛隊那裏的時候，袋裏只剩兩個銅板了。

新軍成立以後，我擔任了黨前敵委員會的主席，武漢衛戍司令俞舍都（譯音）擔任第一軍總司令。俞氏多少是受他的部下逼迫而勉強出來擔任的；不久以後他背叛了紅軍，參加了國民黨，他現在在南京爲蔣介石工作。

這支小小的軍隊，一面領導農民暴動，一面向南移動穿過湖南省。他必須擊破千萬的國民黨軍隊的防線，打了許多次的仗，敗退了幾次。紀律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在士兵和長官之中，有許多動搖分子。有許多逃兵。俞氏逃走之後，軍隊到達寧國，便又改編了一次。鄭豪（譯音）被任命為殘留軍隊的——約有一旅之衆——指揮；可是後來他也叛變了。不過在第一隊裏有許多人，自始至終忠實不渝，直到今天他們還在紅軍裏——如羅榮桓，第一軍團政治委員，楊錄生（譯音）現為紅軍司令。當這一小隊，最後爬上井崗山的時候，人數只剩一千名左右。

因為秋收暴動的綱領沒有得到黨中央委員會的批准，又因為第一軍遭受了一些嚴重的損失，又從城市的角度來看，這種運動無疑是要失敗的，所以中央委員會這時候決定排斥我。我的政治局與前敵委員會的職位均被免職。湖南省委會也攻擊我們，稱我們是「槍桿子運動」。可是我們還是把軍隊在井崗山圍結着，十分相信自己所定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後來的事實也充分為我們證明了。新兵參加了。這一師人又補充了，我擔任了總指揮。

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師在井崗山打定了基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湖南邊境茶陵地方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第一個蘇維埃政府也選舉完成；牠的主席是杜仲實（譯音）。在這個蘇維埃中我們實行了一種民主政綱，採取一種遲緩而能正當發展的溫和政策。這樣井崗山得到了黨內冒險份子的實難，他們要求一種恐怖政策，焚掠殺戮地主來毀他們的膽。第一軍前敵委員會拒絕採用這種戰略，所以頭腦熱烈的人就稱我們為「改良主義者」。他們對我攻擊最烈，因為我不採行一種較為「急進的」政策。

兩個以前在井崗山附近的土匪領袖，名叫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加入了紅軍。使紅軍實力增加到將近三旅之衆。王、袁都被任為旅長，而我是軍長。這兩個人雖然是土匪出身，可是曾經投降過國民革命軍，現在他們準備對反動勢力作戰。當我在井崗山的時候，他們倆可算是忠實的共產黨徒，執行

着黨的命令。可是後來，當他們單獨被留在井崗山的時候，他們回復了土匪脾氣，結果是被那時已經組織化蘇維埃化的有自衛能力的農民們所殺。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到達了井崗山，我們的隊伍會合了。我們共同起草了一個計劃，組織一個六縣的蘇維埃區。慢慢地把共產勢力在湖南、江西、廣東邊境各縣中，穩定團結起來，以此為根據地，再向更廣大的區域發展。不過這個策略是與黨的建議相衝突的，因為黨有着急速發展的偉大理想。在軍隊裏面，我和朱德要向兩種傾向鬥爭：第一種是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認為是「冒險主義」的；第二種向南撤退到廣東邊境，這我們認為是「敗退主義」。那時候我們所看到的主要工作有二：（一）分配土地，（二）建立蘇維埃；我們想把羣衆武裝起來加速這些步驟。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寬和地對待被俘虜的敵人部隊。一般地說來，是民主的溫和主義。

一九二八年秋，井崗山上召集了一個代表會議，到會的是井崗山以北的蘇維埃代表。關於上面所說各點，蘇區裏的黨代表中，意見還是很紛歧，在這次會議中，各種不同的意見是充分地發揮出來。少數人說：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前途很狹窄。大多數人，則相信我們的政策會成功。當議決案提出來，並且說明蘇維埃運動將來如何會得到勝利的，議案是很容易地通過了。可是黨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批准這一個運動。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次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開會報告書到達了井崗山的時候，這批准才算接到了。

在這次會議裏所採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此以後，黨的領袖中，和在農業區域裏的蘇維埃運動的領袖中的意見的不協調，權消除了，黨的一致重又建立了起來。

第六次會議的議決案，綜合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和秋收暴動的種種經驗，下了贊成對於土地運動應該重視的結論。大約在這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別的地方發現。一九二

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暴動，這些暴動奠下了新蘇區的基礎。在西方的賀龍，和在東方的徐海東，開始組織他們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區域，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和張國燾也加入了。一九二七年冬，方志敏和邵式平在江西的東北部沿福建邊界，也開始了一種運動。這後來就發展成爲一個有力的蘇維埃根據地。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彭湃率領了一部分忠實的部隊，到海陸豐組織了一個蘇維埃，可是因爲接受了盲動主義的政策，不久就被消滅了。不過它的軍隊的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揮之下，離開那區域，與朱德和我取得了聯絡，後來成了紅軍第十一軍的基本隊伍。

一九二八年春天，游擊隊在李文龍、李紹祖（均譚晉）領導之下，開始在江西的興國、東固一帶活動。這一個運動，以吉安周圍爲根據，這些游擊隊，以後成了第三軍的中心幹部，而吉安本縣，則成了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在福建西部，由張鼎丞、鄧子恢（後被槍殺）、傅柏翠（後變成社會民主黨）等人主持組織了蘇維埃。

在井岡山「反對冒險主義之鬥爭」時期中，第一軍擊退了白軍兩次奪山寨的企圖。井崗山的確是我們所要創造的這種活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牠有很好的天然屏障，而且所產的穀物，足夠維持小小的軍隊。它周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里。本地名稱是叫大小五井。（真真的井崗山是附近的一個小山，已經早已放棄了。）這是從周圍五個大井得名的——大、小、上、下、中五個大井，在山上的五個村子，就跟着這五口井而命名的。

我們的軍隊在井岡山會合之後，再行改編了一次。有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任總司令，我是政治委員。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何健的部隊舉動譁變以後，井岡山又增加了許多軍隊。紅軍第五軍就從這些部隊中產生出來，總司令是彭德懷。除了彭以外，還有鄧萃（在長征貴州遵義遇害），黃公略（一九三一年在廣西被殺），和滕代遠。

來了這些軍隊以後，山上的情形，變得很壞了。軍隊沒有冬天的服裝，糧食也非常稀少。有好幾個月我們差不多靠吃紅薯過活，士兵們呼喊着他們自己作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紅薯！」——在他們看來，所謂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紅薯。把彭德懷留在井廣山上，朱德衝破了白軍的封鎖陣線。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第一次在山上的逗留，就此告終了。

這時第四軍，開始打通江西南部的鬥爭，發展得很快很成功。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本地的紅軍會合了聯合起來。我們把軍力分開繼續向永定、上杭和龍岩進發，在這幾縣裏，都成立了蘇維埃。在紅軍未到以前，在這些區域裏舊有的武裝民衆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幫助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很快地建立在一種穩定的基礎上。靠了農村羣衆運動和游擊戰，紅軍的勢力伸張到幾個別的縣分，但是共產黨則到後來纔完全握到這權力。

●紅軍的情形在物質與政治方面都開始進步了，但還有不少壞的傾向。譬如說：「游擊主義」是一種弱點，反映着缺乏紀律，誇張民主觀念和組織的渙散等等。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土匪性質」——不肯安靜下來，認真去做政府指派的工作，好動、好變、好新、好事。此外還有軍閥主義的遺留，有些司令官虐待甚至鞭打士兵，憑個人的好惡，對部下妄加軒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西部紅軍第四軍舉行了第九次黨會議之後，許多弱點都被克服了。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改善的方法，釋除了許多誤會，採用新的方法，這在後來奠定了紅軍高級意識形態的領導的基礎。在這以前，上面所說的那些傾向，是很嚴重的，而且被黨和軍事領導中的托洛茨基派分子，利用了來破壞這一種運動的力量。對於這種壞的傾向的一種猛烈的鬥爭開始了，有幾個人因此被取消了黨裏的地位和軍事指導權，其中以劉恩宬（譯音）——一個司令，為最好的例子。一度發覺他們企圖把紅軍領導到抵抗敵人更爲困難的地位上去的一種方法，破壞紅軍，幾次失敗之後，他們的陰謀明顯地暴露了出來。

他們竭力攻擊我們的綱領以及其他我們所贊成的一切。經驗證明了他們的錯誤，他們被免除了職位，編建會議之後，他們的勢力完全消滅了。

這次會議，準備了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道路。下一年就有一些光明的勝利。江西南部，差不多全部為紅軍所佔領。中央蘇維埃區域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集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蘇維埃的將來的綱領。出席的分子是本地的黨、軍、政府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土地政策經過一次長時期的討論，對於「機會主義」——由那些反對重行分配土地的人們所領導着的——的鬥爭戰勝了。會議又決定實行重行分配，加速組織蘇維埃。到那時為止，紅軍只是組織了地方，和縣區的蘇維埃。在這會議上，決定了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這一個新政策，農民報之以熱烈興奮的擁護，這擁護在幾個月之後，幫助紅軍擊敗了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六、紅軍的生長

慢慢地紅軍的對於羣眾的工作改進了，紀律嚴謹了，在組織方面的新技術也發展了。各地方的農民階級開始自動來幫助革命了。在井岡山時代，紅軍已經叫士兵們堅守三條簡單的維持紀律的規則，那是：（1）迅速服從命令；（2）不許沒收窮苦農民的任何物品；（3）一切從地主階級沒收而來的物品立即直接交給政府處置。一九二八年會議以後，爲了要獲得農民階級的擁護起見，曾作重大的努力，在上面所舉的三條以外，又加上八條規則，這八條是：

（1）離開一家人家時，把門板（睡覺用）放在原處。

（2）把們睡覺時所用的草席捲好交還。

(3) 對老百姓要溫和客氣，隨時幫助他們。

(4) 一切借用的物件都要歸還。

(5) 一切損壞了的東西都要賠償。

(6) 和農民交易要規矩。

(7) 買東西要付錢。

(8) 要講衛生，廁所要設在離人家很遠的地方。

最末兩項是林彪所添上的。這八項實行的成績日見進步，到今天還是紅軍士兵的軍紀，牢牢記着，常常能背誦出來。另外還教三項別的責任，作為紅軍的基本目的：第一、對敵人要抵抗到死；第二、把羣衆武裝起來；第三、要募集款項幫助鬥爭。

一九二九年初，有幾隊在李文龍、李韶九領導下的游擊隊，被改編加入了紅軍第三軍，由黃公略任指揮，朱瑞任政治委員。同時朱培德的一部分民團轉變加入了紅軍。他們是由一個國民黨司令羅炳輝領導着前來投入共產軍的。這位羅司令對國民黨感到幻滅而願意加入紅軍，現在他是紅軍第二方面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從編建的游擊隊和正式的紅軍幹部，組織成了紅軍第十二軍，由伍仲豪任指揮，譚震林任政治委員。後來伍仲豪在戰爭中陣亡，而由羅炳輝接任的。

就在這個時候，紅軍第一軍團組織成功了，朱德任總司令，我任政治委員。牠包含了由林彪指揮的第二軍，第四軍，和羅炳輝指揮的第十二軍。黨的領導權交付給前敵委員會負責，而我是該委員會的主席。那時候第一軍團已經有了一萬人以上，編成了十師。除了這支主力軍以外，還有許多的地方的獨立旅，赤衛隊和游擊隊。

對於軍事之勝利的發展，除了這一個運動的政治基礎之外，紅色戰略也很有關係。我們在井崗山上採

取了四個口號，這四個口號，供給了紅軍藉以生長的游擊戰術所採的總線索方法的。這些口號是：

(1) 敵進我退！

(2) 敵止我擾！

(3) 敵避我擊！

(4) 敵退我進！

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所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後來許多經驗，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大致說來，紅軍一放棄了這種戰術，就不能勝利。我們的軍隊是小的，敵人的力量要強過我們十倍至二十倍；我們的財源和軍火也是受限制的。只有巧妙地混合運動戰術和游擊戰術，纔有希望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獲得勝利，他們是有廣大的資源和優越的基礎來作戰的。

紅軍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戰術，不論如此或將來，是在攻擊中力能集中牠的主要力量，而以後又很快地散開。這意思是要避免陣地戰，而用一切方法去迎擊在行動中的敵人隊伍而殲滅之。在這種戰術的基礎之上，紅軍的驚人活動力和敏捷有力的「突擊」力發展出來了。

在塘大蘇維埃區域這一點上，紅軍的綱領，是主張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而不主張採用不平衡的跳躍式推進方式，以至在佔領區域裏沒有深強的穩固力。這種政策很合實用，正如上面所說過的戰術一樣，牠是從多年的集體的軍事與政治經驗中得來的。這些戰略，李立三激烈地反對着。他主張集中一切武器於紅軍的手裏，並吸取一切的游擊部隊。他喜歡攻擊而不喜歡穩健；喜歡前進而不喜歡保守後方；喜歡對大城市加以聲勢盛大的攻擊，輔之以暴動與極端的行動。那時候李立三路線操縱了黨與蘇區以外的地方，勢力很強大，在某種程度上，足以迫使紅軍，違反臨陣經驗而去接受牠。這路線底一個結果，是對長沙的攻擊，另一結果，是向南昌的進軍。但是這兩次冒險中，紅軍不願停止游擊隊的活動，而把後方暴露給敵

人們。

一九二九年秋天，紅軍移到江西北部，攻擊並且佔領了許多城市，給予國民黨軍隊許多打擊。到離南昌很近的時候，第一軍團突然轉向西方，向長沙前進，在這一天的進軍中，第一軍團匯合了彭德懷的部隊，彭底部隊曾經一度佔領過長沙，但爲避免爲擴大優越的敵人軍隊所包圍，是被強迫撤退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德懷不得不離開井崗山，在江西南部活動，結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部隊。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聯合了朱德和紅軍的主要部隊。經過了一度會議之後，決定彭德懷的第三軍應在江西、湖南邊境活動，而朱德和我則向福建推動。一九三〇年六月，第三軍和第一軍團重行建立了聯繫，開始第二次進攻長沙。第一和第三軍團合併了成爲第一方面軍，以朱德爲總司令，我爲政治委員。在這種領導之下，我們到達了長沙城外。

大約在這時候，中國工業革命委員會組織成功了，我被推爲主席。紅軍在湖南的勢力是很普通的，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我的名字在湖南農民中很有名，國民黨政府爲要捕獲我，不論殺死或活捉，會懸了很大的賞格，朱德和別的紅黨領袖也是如此。我在湘潭的田地（註一），被國民黨沒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姊妹，我兩個兄弟——毛澤民、毛澤潭——的妻子，以及我的兒子，都被何健逮捕了。我的妻子和姊妹被槍決了，其餘後來得到了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伸張到我自己的鄉村裏，因爲我會聽見人家講，說當地的農民，深信我不久就要回到我自己的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天空飛過，他們一定說裏面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正耕種着我的田地的人，說我要回來視察我的田莊，來看土上的樹木有沒有被伐。假如伐去了，我一定向蔣介石要求賠償的。

但第二次攻擊長沙失敗了。大批的援軍開到城裏，防衛得甚爲堅固；九月間，又有新軍隊開到湖南來攻打紅軍。在這一天的圍攻中，只有一次重要的戰爭，這一役紅軍消滅了兩旅敵軍。可是紅軍不能爭得長

沙，幾星期後，便向江西撤退。

這次的失敗，促成了李立三路線的傾覆。阻止了紅軍去打武漢而免遭損失——這是李立三要求的。那時候紅軍主要的任務是招募新兵，新的農村區域的蘇維埃化，而最主要的是在佔領區域裏，徹底鞏固蘇維埃的政權。在這一種綱領之下，攻擊長沙顯見是不需要了，而且這種攻擊的本身是含有冒險的成分的。如果把第一次的佔領作爲一種暫時行動，並不企圖守住城市，建立國家政權，那麼這種努力，也許可以認爲有益的，因這在國民革命運動上所產生的反動是很大的。當蘇維埃政權在後面還沒有穩定的時候，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這是一種軍事和戰術上的錯誤。

但是李立三那時候把紅軍的軍事力量，和在本國政治背景中的革命因素估計得太高了。他相信革命將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掌握全國的政權了。他這個信念，是被那時候正在進行的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的長期而喪元氣的內戰所鼓勵，表面上看來，彷彿是對李立三十分有利的。

但是依照紅軍的看法，敵人們是正在準備對蘇維埃大舉進攻，只要內戰一停止，敵人就會發動。所以紅軍應該加緊戒備，決無餘暇來從事那可以待到慘敗的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這一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在湖南方面失敗了，紅軍退回江西，特別在吉安佔領以後，紅軍裏的「李立三主義」被克服了。李立三自己，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立即在黨裏失去了勢力。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軍隊發生了一個危機。第三軍團的一部分，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和其他軍隊脫離。可是彭德懷竭力和這種傾向鬥爭，在他指揮之下的軍隊保持了團結，服從最高當局的意志。但是由劉地藻（譯音）領導的第二十軍，公開起來反叛，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軍官和政府官吏，根據李立三路線，對我們作政治的攻擊。這事發生在富田地方，稱爲「富田事變」。富田是靠近那時的蘇維埃區域的中心吉安

縣的，所以這件事變產生了很大的震動。許多人看起來覺得革命的命運，就靠這一個鬥爭的結果如何而定。幸而這叛變，不久就被壓平了，這全仗第三軍的忠誠，黨和軍隊的團結，以及農民階級的擁護。劉地藻被逮捕了，別的反叛者也被繳械肅清了。我們的路線重又建立了起來，「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鎮壓下去了，結果是蘇維埃運動以後得到了偉大的勝利。

但是這時南京方面已徹底明瞭了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勢力，在一九三〇年之末，開始了向紅軍舉行第一次圍剿（註二）。敵人的軍隊的總數超過十萬，開始包圍了紅色區域。在魯滌平的總指揮之下，分五路進攻。紅軍那時能動員的軍隊，總數約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略，迎擊並克服了這第一次的圍剿，得到了很大的勝利，沿用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略，以主要軍力，向每一個單位分別攻擊。我們讓敵人的軍隊深入蘇區，然後用超越的人數突然對這些孤立的國民黨軍隊，集中兵力攻擊，我們獲得了便利游擊的地位，包圍他們，這樣把數目超過我們的敵人所享受的軍事優勢，扭轉過來。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擊敗了。我相信假使紅軍在這次圍剿開始以前不能成就三個條件，這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三個條件是：（1）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之下，團結起來；（2）李立三路線的清算；（3）黨對A B團（反布爾什維克集團劉地藻等）以及其他在紅軍中和蘇區裏的積極的反革命份子們的勝利。

僅僅休息了四個月以後，南京又在何應欽——現任軍政部長——的最高指揮之下，開始第二次圍剿。兵力超過了二十萬，分七路向蘇區推進。那時一般認為紅軍的情形是很不利的。蘇維埃政權所管轄的區域很窄狹，財源有限，設備簡陋，而敵人的物質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地超過紅軍。可是，迎擊這次的進攻，紅軍仍舊握住牠以前賴以取勝的戰略。讓敵人的軍隊深入蘇區，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攻擊敵人的第二路，擊敗了他們好幾族人，消滅了他們的進攻能力。接着我們很快地接連攻擊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

，依次擊退了他們。第四路沒有作戰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被殲滅。在十四天之內，紅軍作了六次戰爭，進軍八天，以決定的勝利結束之。其他六路被擊潰和敗退之後，由蔣光鼐、蔡廷楷指揮的第一路軍，沒有經過重大的戰爭就撤退了。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自己指揮三十萬大軍，來作肅清「赤匪」的最後努力。他有最有能力的指揮官幫助他，像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等，每人都負責一主要路線前進。蔣介石希望用一鼓佔領蘇區急速地把「赤匪」蕩平。開始以一天八十里的行軍，深入到蘇區的中心。這供給了紅軍最有利的作戰條件，不久就證明蔣介石戰略的嚴重錯誤。主力只有三萬人，輔以一陣幾次的機警的游擊戰，在五天之內攻擊了五股不同的敵人。在第一次戰爭中，紅軍俘獲了許多的敵人軍隊，大批的軍火，槍械和其他設備。到九月裏，蔣氏第三次的圍剿證明失敗了，在十月裏便把軍隊撤退了。

清時候紅軍進入了一個比較和平發達的時期，勢力擴張得很快。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開了，中央蘇維埃政府也組織了起來，我被選為主席。朱德被選為紅軍總司令。在同月裏，發生了寧都大舉動，國民黨的第二十八路軍有二萬人以上叛變了來加入紅軍。這些軍隊是由董振堂、趙博生率領的。趙氏後來在江西陣亡，董氏則今天仍是紅軍的第五軍團司令。紅軍第五軍是從寧都舉動的軍隊產生出來的。

紅軍現在開始她自己的進攻了。一九三二年在福建漳州打了一次大仗，佔領了這個城池。南方則在南昌擊敗了陳濟棠，在蔣介石的陣線上，則大舉攻佔樂安、黎川、建寧、泰寧等縣。一度攻打贛州，但沒有佔領。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後，直到西北長征開始，我自己把我的時間，差不多全部用在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上，而把軍事的指揮交給了朱德和其他的人們。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開始了第四次，——也許是最慘敗的一次——圍剿（註三）。在這一期間的第

一次作戰中，紅軍繳了兩師人的械，俘獲了兩個師長。第五十九師的一部分被消滅，而第五十二師，則完全消滅。這次作戰在僅僅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灘一戰中，紅軍就俘虜了一萬三千名的敵人軍隊。國民黨的第十一師，——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幾乎等於全部消滅，差不多全部繳械，牠的師長又受了重傷。這一次作戰，有決定全局的力量，第四次圍剿隨即告終。蔣介石當時寫信給他底前敵總指揮陳誠，——認這一次的失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贊成這樣急速地推進軍隊的，他那時候對人說，從他的意見看來，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的任務」，而且是一種「無期的徒刑」。這話傳到蔣介石那裏，就把他革去了最高指揮的職位。

爲了他的第五次即最後一次的圍剿，蔣介石動員了將近一百萬人，採取最新的戰術和戰略。在第四次的圍剿中，經他的德國顧問們的建議，蔣介石已經開始採用封鎖和碉堡制度。在第五次圍剿中，他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這上面。他用他的軍隊，實行嚴厲的封鎖，整個包圍了蘇區，他很小心地前進。建築汽車路，碉堡和戰壕。他避免把他的主力軍隊接近紅軍，他們謹慎地在防禦工事後面作戰，他們只作短距離的前進，並用飛機，大砲和機關槍掩護着。

在這一時期中，我們犯了兩個重要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叛變中，沒有能和蔡廷楷聯合。第二個錯誤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採用了錯誤的單純防衛戰略。在陣地戰上，迎擊廣大優越的南京軍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這種戰爭上，紅軍的技巧和精神都是落後的。

這些錯誤的結果，加上蔣介石圍剿的新的戰略和新戰術，以及國民黨軍隊的驚人的數目，和優越的技術，到了一九三四年，紅軍乃不得不改變牠在江西的情形了。其次，民族的政治情形，影響了整個局面，迫使我們決定將主要活動遷移到西北去。隨着日本的進攻滿州和上海，蘇維埃政府，已於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式對日宣戰。這宣言爲了國民黨軍隊封鎖包圍着蘇維埃中國而不能實行。接着牠又發表宣言，號召中

國所有的武裝軍隊結成聯合陣線，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三年初，蘇維埃政府宣布，在下列三個條件之下，願意和任何的白軍合作：（1）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與紅軍的攻擊；（2）保障民衆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權利；（3）武裝民衆舉行抗日戰爭。

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圍剿開始。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中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會於蘇維埃都城瑞金舉行了革命成績的檢閱，在會議上我提供了一個長的報告，就在這會議上，選舉了現在這一批中央蘇維埃政府人員。不久以後，我們開始準備長征。這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正是蔣介石發動他最後一次圍剿的一年以後。在這一年中，差不多毫不休止地作戰和爭鬥，雙方都遭到很重大的損失。

一九三五年正月，紅軍主要部隊，到達了貴州邊境。接着的四個月中間，紅軍不斷地向前行進，並進行了最猛力的搏鬥和戰爭。經過了許多的困難，渡過了中國最長最深而最危險的河流，爬過了一些最高而最崎嶇的山道。經過了兇狂的土人區域，穿過了曠無人烟的大草原。受盡風暴雨雪，被全中國白軍軍隊的半數所追逐，經過了一切自然障礙物，和當地的軍隊作戰。衝過了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四川、甘肅、陝西。最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西北部，在中國的大西北，擴大了現在的根據地。

紅軍勝利的長征，到達了甘肅、陝西，而沒有損傷主要軍力，是有兩種原因的：第一是由於共產黨的正確的領導，第二是由於蘇維埃人民的基本構成份子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和超人的忍耐力與革命的熱情。中國的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永遠是忠實於馬克斯列寧主義，繼續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鬥爭。在這種決心之中，牠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最後的決定的勝利獲得了解釋。

牠的不可征服的另一種原因，是由於革命幹部的異乎尋常的幹練英勇與忠實。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羅邁、鄧發、項英、徐海東、青雲（譚音）、林彪、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蕭克等許許多多優秀同志們，還有許多已把生命獻給革命的人們，——他們都爲同一目的而工

作，創造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以及今後新起來的別的許多人，定會把這一個運動領導着，達到最後的勝利。

現在我們正企圖在中國造成一個統一戰線，請求各黨各派，各種職業的人們，以及有誠意抗日的各軍隊，和我們聯合起來，担当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務。爲了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爲了救國，造成這一種戰線，和建立徹底的中國民主政治，都是必要的。我的工作 and 目的，也正和黨和紅軍的工作、目的的一樣，此後要盡全力以求達到這一個鵠的。

(註一)從這些土地所得來的租金，在大革命時期中毛氏用來進行湖南的農民運動的。

(註二)這一次的圍剿在楊前(譯音)所著的「中國的共黨現狀」一書(一九三一年南京出版)裏寫得很詳盡。

(註三)關於對蘇維埃區域征討的次數，在反共戰爭的許多記載上，說得非常紛歧。有些作者，總計「圍剿」的次數有八次之多，可是這幾次南京的大動員中間，有若干次，純粹是自衛性質。紅軍指揮官們，只說有五次主要的反共「圍剿」。這五次中南京軍隊直接參加作戰的大概人數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人數十萬；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人數二十萬；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人數三十萬；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人數二十五萬；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人數四十萬。(「動員了」九十萬人以上，進攻三個主要的蘇區。)在一九三二年中，南京沒有發動大規模的征剿，但是，那年蔣介石在紅色區域的四周，動用了約五十萬人防禦。這反是紅軍大舉進攻的一年。顯然，一九三二年的南京軍的防禦戰，因爲被當作反共「圍剿」來宣傳，就被許多作者，誤解爲大「圍剿」了。但紅黨們並不這樣地加以討論。

毛澤東會見記

史諾

本文作者史諾爲美國著名記者。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前，即曾居留延安，建立政權之後，又曾造訪中共，與毛澤東等中共黨要有三十年以上的友誼。在延安時代，史諾曾經筆錄了毛澤東的自傳。一九六五年間，史諾又寫了這篇訪問記，報導毛澤東對於越戰、核彈、聯合國及對蘇聯諸問題的見解，是研究中共，認識毛澤東的一篇重要的資料。

談到面對死亡

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會見訪者是很難得的。可是在與我會見的四小時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天南海北」親切地做了廣泛的談話。一九六四年農業豐收，倉庫裝得滿滿的。任何處的商店都擺着廉宜的食物和消費品，科學技術進步的結果，以核爆表示了歡祝赫魯曉夫的下台。現在就毛氏來說，可以誇耀上述成果；可是反過來他却談到如何面對死亡，表示了其政治遺產留做後人來評價的態度。

今年已經七十餘歲的鬥士，他在隔著廣場對着天安門的人民大會堂內，點綴着北京式裝飾的一間大房中迎見了我。在他談話中間反覆的提到：要感謝外國的侵略者，他們促進了中國的革命，還有對今天的東

南亞正給予同樣的恩惠。

他並且說，不向中國領土之外派遣軍隊，除非本國受到攻擊，跟任何國家也沒有戰爭的打算。美國將武器軍隊送往西貢運送，南越的解放軍可愉快的獲得取勝的裝備和教育。他似乎認為，中共軍隊並無馳援的必要。

談話開始前，毛氏現出暢快的姿態，已知道被拍入紀錄電影。他被攝入外國的紀錄片，這可能是第一次。最近傳說他的健康狀態很壞，政治的醫牛們（按：指傳說和推論毛氏健康狀態的人），可以根據這一紀錄片下其診斷。

一月九日舉行的會見，是在每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地方指導者聚集北京與他們連日連夜晤談，是在極度繁忙的數週過去不久；如果是病人，早該趕快停止談話了。會見在晚上六時開始，一邊談一邊吃晚飯，連續了兩小時，我以為他自始至終是暢快的。

據一位毛氏的醫生告訴我，他的身體沒有任何不妥之處，只是因為年齡關係容易疲乏。他與我一齊吃辣的湖南菜，吃的方法，是很守舊的，喝的方式依然像從前那樣機械，把一二杯葡萄酒傾飲而盡。可是有如底下說到的，因他現在抱有「面對鬼神」的心情準備，難免引起人們的臆測。

我這次的訪晤，外國報紙報導說，有其他政府官員出席，這些官員是在革命成功之前的兩個朋友，外交部長的助理謝澎女士及她的丈夫外交部次長喬冠華。我沒有提出書面詢問，談話時也沒有作紀錄。幸虧出席者一人作了部份的紀錄，事後重溫一遍，得以重新記憶。為敘述的方便，沒有引用着毛氏原來的語句，如以下的表達方式，我將他的見解作了詳細的說明。

我首先談到，自從上次與他會見以來，中共遭逢了困難時期，到六五年現在達成了水準。他在六〇年對我說，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支持社會主義，僅有百分之十反對，現在是甚麼情況呢？

毛氏答稱，蔣介石派的份子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數目非常少。多數人已改變了思想，這些人仍在增加中。並且這些人的子女可以改造。總而言之，今天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或者更多，一致支持社會主義。

（在這裏，班禪喇嘛之類的事浮下心頭是自然的；班禪喇嘛最近被罷免了西藏自治區的委員會代主委。——史諾原註）

我問：「班禪喇嘛的問題，是否與從前支配農民的喇嘛地主勢力有關呢？還是宗教領袖的任務與政教分離的新政治權力發生衝突呢？」

毛氏答道：這根本不是宗教自由的問題，衝突發生於土地問題。封建的支配者失了土地，農奴被解放，變作了主人。班禪喇嘛不但阻礙這一變化，並且糾結特權階級，繼續與那些「廢物們」來往。他們會持有若干武器，同黨中一人暴露其計劃。班禪喇嘛周圍的人們當中，若干舊思想並非不能改變的老人，他們仍有了期待。班禪喇嘛自身說不定也會改變。他仍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現在仍在北京，如果要回去可隨時回拉薩去這可由他來決定。

作為宗教的喇嘛教，對於真正的信仰者誰也不會加以壓迫，所有的寺院都開放，也做禮拜。唯一問題，只是活佛的教訓不再必須實行，不能對於宗教以外的問題漠不關心。達賴喇嘛曾對毛氏說過，自己不相信是活佛，但是如果公開說出來，他一定要否認這話的，許多基督教的牧師祭司們，對他們的說教雖也不完全相信，可是他們的信徒多是真正的信仰。同時以為毛氏從沒有信過任何迷信，這乃是誤解。他的母親是熱心的佛教徒，對於佛事從來不怠慢。在童年時代他曾和母親連在一起，對抗不信佛教的父親。可是有一天，父親到森林中去散步，一隻老虎——並非紙老虎而是真老虎——跳了出來。

毛澤東的父親見到真老虎，他嚇得飛跑回家，立刻給神祇焚香上供。多數人之信仰宗教，大概都是如此這般。遭遇困難就祈禱神靈，沒有事的時候就忘了。

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當第一次國共內戰中止前後，在中國西北初次與毛氏會面時，他告訴我的這些話。

當時的情況非常惡劣，中共的紅軍人數雖少，但是團結堅固，戰鬥力強，我看過他們僅持有輕武器……

「除了那沉重的札槍。」我插咀說：「貧民的軍隊會抗着它。」對的，札槍還有帶把柄。從這來看，如何決定鬥爭最後勝敗之問題，並非單獨武器的問題。

「當時的人們主要所想的是如何從日本人手中解放。」我接口說道：「中國世界地位之向上，有如此重大的意義，是我最初料想不到的。」

毛氏在這裏想起了一九三七年與蔣介石成立之共同抗日協定之後，他的軍隊主力避與敵軍正面作戰，重點放在於鄉村建立游擊根據地。日本軍實在幫了不少忙，由於他們在佔領區內的村莊燒殺，教育了人民，迅速提高了他們的政治意識，給共產主義者所領導的游擊隊，造成容易增加隊員、擴大地區的條件。與毛氏會面的日本人，每就過去的事謝罪，他反過來感謝他們的賜助。

在其後的內戰期間，輪到美國和蔣介石，他們也幫了不少忙。蔣介石每每是他的教師。如果不受蔣的教育，毛氏自身就不能清除右翼的機會主義者，也不能取得武器和蔣作戰。說句老實話，直接教給他戰鬥的必要性是蔣介石，美國是間接的教師，日本的將軍們也是直接的教師。

越共自力可勝

「在西貢的美國軍方某發言人，曾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力量，與一九四七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國民政府軍開始大規模殲滅作戰相比，比較這兩者的條件是否很相似呢？」

毛氏想法是如此的。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軍已擁有百萬以上之兵力，與蔣介石方面數百萬軍隊相對抗。當時的人民解放軍，出動師級單位或數營兵力作戰，現在南越解放軍的行動，最大只能做到營級兵力，最大限度只到團級兵力。駐南越的美軍比較來說還很少。如美軍增強的話，無疑的會使與他們對抗的人民更快的得到武裝。雖然如此，可是將這些告訴美國的領導人，他們是不會聽的。他們是否聽過吳廷琰的話呢？無論是北越胡志明主席或是毛氏都認為吳廷琰並不很差，以為美國人仍可支持他幾年。可是暴燥的美國將軍們，怒形於色，把他踢出去了。可是把他暗殺之後，比以前更平靜了嗎？

「現在越共的軍隊，單憑他們的努力能够獲勝嗎？」

他答道：「我想是能够的。」

今天越共的處境，比第一次國共內戰（一九二七——一九三九年）共方更好。當時中國沒有外國的直接干涉，越共既經受美軍干涉，一般士兵和將校都蒙受武器和教育的好處。現在反對美國的人，已不限於解放軍（越共）。吳廷琰也曾不願服從命令；現在這種獨立精神，在南越政府的將軍間正在擴大。美國教師正在繼續收獲效果。

我問及在南越將軍當中，是否不久會有投奔越共的人？毛氏答道：「從國民黨的將軍投共的例子看來，可能會有。」

「美國對於越南、剛果及其他舊殖民地，現在已成戰場。各國，若從馬克斯主義來看，在理論上可提出頗饒興味的問題。法國人愛說的一句話——第三世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所謂低開發國，舊殖民地諸國，現在仍是殖民地之各國等——在那些地方新殖民地主義與革命勢力之間的矛盾，乃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矛盾。對這個問題，你是否仍認為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呢？」

毛氏對這一問題，並未發表有系統的意見，只說想起了美總統肯尼迪氏所說的話。

肯尼迪總統不是說過，美國與加拿大及西歐之間，沒有根本的實際的對立嗎？肯尼迪還說，問題在於南半球；爲了準備「局部戰爭」（防止破壞活動之戰爭），倡議訓練「特別作戰部隊」之際，肯尼迪或許會考慮該項問題。

可是過去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是帝國主義間的相互矛盾，縱然被殖民地的革命折斷了骨頭，它們的性格仍未改變。以法國爲例言之，戴高樂總統的政策有兩個來由。第一是脫離美國。支配主張獨立；第二、爲了對付亞非拉丁美洲所起的變化。這麼一來，結果增大了資本主義諸國間的矛盾。但是法國是不是所謂「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呢？

最近曾問來訪的法國人，他們的答覆是否定的，因法國是工業發達的國家，不該歸入「第三世界」之一員。問題並非那麼簡單。或許可以說，「法國雖然在「第三世界」之內，但是不屬於「第三世界」是不？」也許是這樣。肯尼迪氏終於對此問題有興趣，曾研讀毛著有關軍事作戰的論文。並且當阿爾及利亞的朋友們與法國作戰的當兒，聽說他曾說，法軍也應該讀一讀這些論文，這些知識對他們是有用的。

可是當時的阿爾及利亞總理阿巴斯曾說，這些書是根據中國經驗寫成的，被反對，利用是沒有效果的。只有實行人民解放戰爭的情勢可以應用它，實行反人民的戰爭是無能爲力的。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終不免敗北的結局，蔣介石也研究過中共的資料，也無助於事。

（在其他談話的中途，毛氏謂，以反革命戰爭使用人民解放戰爭的戰術，像把小雞重裝進雞籠一樣的困難。）

曾讀泰勒著作

毛氏說，中國人也研究美國的書籍；以中國人來說，進行反人民戰爭是困難的。

例如讀過現在美國駐南越大使泰勒上將所撰「情況不明的號聲」一書，在這本書中泰勒表示，大概不能使用核子武器，考慮如何掌握非核武器作戰的決定權；雖然贊成發展核武器，但希望給予陸軍優先權。現在泰勒上將的游擊戰理論正有試驗的機會。他在越南積有了貴重的經驗。

他也曾讀過美國政府針對游擊戰頒行戰術指導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列舉了游擊隊的缺點，軍事上的弱點，確言美國的勝利。可是他們無視誰來領導作戰這一明確事實。吳廷琰固然不行，一切與民衆脫離的政府是打不敗解放戰爭的。美國人無論如何不會聽中共黨主席的意見，這樣的忠告對誰來說都是無害的。

「現在東南亞、印度、遠拉丁美洲也存在是造成中共革命同樣的「社會條件」，問題是國情各異，解決方法亦不大同。你以為多借重中共經驗能否發生社會革命呢？」毛氏答稱，由反對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而結合的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感情，乃過去壓迫和錯誤所產生的東西。後一因素的存在無論何處都要起革命。可是以上舉列各國的人民，並非全都希望社會主義，單是要求國家的獨立。這完全是另一區問題了。歐洲各國也發生過反封建制度的革命。在美國未經過封建時代，而脫離英殖民地主義，發生了進步的獨立戰爭，其後為確定自由的勞動市場而發生了南北戰爭。華盛頓與林肯，是那時代的兩個偉人。

「佔地球五分之三地區，屬於所謂「第三世界」，我們知道有種種實際的問題。人口增長率與生產上昇率之間的距離加大之惡劣影響，生活水準低下國家與生活水準富裕國家之間的差別，正在急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之下，蘇聯要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時間會等待它嗎？在這期間低開發地區要發展議會政治，和平的完成社會主義則需等待一個世紀，但能等待這麼久嗎？」

毛氏認為時間不會等待那麼久。

我更進一步問及，這個問題是不是關連着中蘇共的理論紛爭，他的答覆如我所想的一樣。「『第三世界』新興諸國之民族解放及實行近代化，是否不必經過世界大戰而能完成呢？」

毛氏經過考慮之後答道：「可以完成。」

大半這些國家，現在的階段距離社會革命還有很遠的路程。在這些國家中，有些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也有些國家只有修正主義者。拉丁美洲雖有二十個共產黨，可是有十八個黨曾作決策攻擊中共。但是有一件事乃確定不移者；如果存在着嚴酷的壓迫，那裏一定發生革命。

核彈是紙老虎

「又談到老虎的話上來，你現在仍相信核彈是紙老虎嗎？」

毛氏答道：「那只是說這麼一種看法，結果成了修航的問題。不用說核彈是有殺人威力的，可是人終究可以毀壞它。就這一點說，核彈就是紙老虎了。」

我問：「你以前曾經說過，因為中國有過大的人口，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恐懼核彈。其他國家的人民即使全部滅絕，中國仍有數億人生存，可以重新開始建設國家。這些報導是有事實根據嗎？」

毛氏答稱，不記得會說過這樣的話，也許曾經說過。

他說：尼赫魯（故印度總理）訪問中共之際（一九五四年），我和他談話的時候，確實的說過，中共不要戰爭。中共雖沒有核彈，如果其他國家要戰爭，世界可能會毀滅。換言之，多數的人大概都得死亡。究竟死多少人，那是無法知道的。並非單獨談中國的事情。

他說：我認為不至於到那個地步，一枚原子彈可使全人類滅絕，連談和的對方政府都沒有了。和尼赫魯談話中會說過這個。對於這個問題，尼赫魯說，因他是印度原子委員會主席，所以清楚原子有多大破壞力，他相信一個人也不會生存。因此我說，大概不會到那個程度。現在的各國政府也許全被消滅，代替它們的政府會繼續出現。

他表示：赫魯曉夫曾聲言持有殺滅所有生物的恐怖武器，可是不久就取消了自己的說法。這並非一次，他取消了很多次。但是，一經說出口的話就絕對不該收回，關於這個傳說（即使發生核子戰爭，中國仍可有很多人生存）不想加以辯護。對原子彈的破壞性，美國人已說了很多，赫魯曉夫也說得够多。對於這件事他們佔了上風。

但是一九五三年在比基尼島實施的核子試驗，曾讀過六年後美國人的調查報告，那是五九年調查員赴比基尼島作的。當他們在比基尼島初登陸時，因為草叢茂密不得不割開一條路。老鼠來回飛跑，溪水寧靜的有魚游動。井水仍適於飲用，農園的葉子茂盛，林子間的鳥兒不絕的唱。試驗後兩年的情況，雖然似乎常酷烈，可是大自然仍繼續蕃生。對大自然，鳥、老鼠、樹木等物，原子彈依然現出紙老虎的本來面目。人類的生存機會，難道會比牠們更少嗎？

「儘管如此，你也不以為核子戰爭是好事吧？」

他答道：這當然不用說。在無論如何非打不可的情形下，也唯有用一般武器來打。

我就印尼退出聯合國，中共表示歡迎提出問題：「試以印尼退出作前例，你是否以為更有其他國家繼續退出呢？」

毛氏答稱，作成前例的是把中國排除於聯合國之外的美國。

聯合國的問題

他認為：儘管美國的反對中共參加聯合國，現在大多數國家仍贊成中國加入；可是這一次不是簡單的多數問題了，搞出必需三分之二多數的新陰謀。雖然在聯合國之外十五年，這件事對中共是得呢，是失呢？這是問題之關鍵所在。

印尼所以退出聯合國，因為考慮到留在聯合國裏面已沒有多大利益。就中國說，蓋中國自身也是一種聯合國。中國有很多少數民族自治區，拿任何一個自治區來加入聯合國，比那些使用投票權剝奪中國議席的任何一國，在人口和面積上都大。中國是大國，不參加聯合國，也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是否考慮，把美國除外，另行組織一個國家聯合機構呢？」毛氏答可以，已經有現成的了。例如亞非會議。另一個是因把中共排除奧林匹克而組織的新興國家運動大會（GANERO）。

三月預定在阿爾及利亞召開的亞非會議，被好多問題所困擾。這些問題當中，包括印尼與馬來西亞之糾紛，包括遵守「萬隆會議之精神」的親中共各國，認為蘇聯完全屬於歐洲，主張將之排除。

中共指望這個亞非機構，不要依靠新殖民地主義及西歐資本主義，能以「第三世界」的計劃來發展建設。中共對內建設主張「自力更生」，亞非諸國間如果能依從中共的互相援助的原則，這些國家的近代化過程，比使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緩慢而辛苦的積蓄資本，說不定可能更快。

在這種理論的建議之下，苦於資本不足的亞非國家，當然必須更急迫的推行急進的政治改革，以早日達成建立社會主義的條件。

「主席，參加在「中國聯合國」裏面有多少人民呢？」我這樣問。「新的人口調查館不能告訴人口數字呢？」

毛氏答覆說，對人口數字實在不知道。

有人說，從六億八千萬到九千萬人，這都不可信。有那麼多人的可能嗎？

我說，從配給票（糧票米票）數字的調查，很容易會算出來。他說，農民們常常搞亂這個問題。「解放」以前的農民怕拉兵，生了兒子就隱瞞，普通也不報戶口。所以「解放」後，據報告人數增加了，土地少了；同時發生誇大災害，少數收穫量的現象。現在生了孩子立刻就報戶口，同時死了人多半數月之也

不呈報（意指農民打算多領口糧）。

雖然出生率是相當低的，但是農民們對於家庭計劃，節制生產不感興趣。大概死亡率的下降比出生率的下降大得多。平均壽命已從三十歲昇到五十歲。

我說道：「這個答覆可能使外國的大學教授們遭遇相當的困難。」

毛氏問道：所說的教授，是那一種教授？

「因為掀起了中國革命，外國人對中共的研究也起了革命。因此現在學者當中有毛澤東主義者、親北京派等很多派別。」

隨後我提到曾出席一次會議，會上諸學者們討論毛澤東對馬克斯主義是否有獨創貢獻之問題，毛氏表示出非常關心的樣子。我又說到，在該會議完了之後，我曾質問一個教授。

當時我說，如果能夠舉出事實，證明你並未主張毛澤東有創造性的貢獻，那麼或許對於這種討論有所幫助。（譯者按：史諾意思在指責那些教授，你們既已主張過毛氏對馬列主義有獨創貢獻，現在又來討論有無獨創貢獻，似乎多此一舉。）那個教授若被刺痛的樣子答道：「不，不是這樣的說法，這與所討論的問題無關。」

聽了這些話，毛氏面露愉快之色，說了一段話。那是二千年以前的事情了，莊子對於老子問題曾寫過一篇有名的論文。可是後來為探討莊子這篇論文的意義，出現了近百的學派。

兩篇哲學論文

在一九六〇年與毛氏會面時，我曾問他寫過自傳沒有，以及今後是否有寫自傳的計劃。他答以「沒有」。可是滯博的學者們，發現了好多本毛氏的傳記。這些東西雖然都不真實，可是却影響了這些學者們的

意見。

現在這些學者們大胆推想的一個問題，是關於毛氏所著「矛盾論」及「實踐論」那兩篇有名的哲學論文；原本毛氏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寫成的，而他們推測是否在那以後數年內寫成的問題。

我自己記得是在一九三八年夏讀到這些論文的翻譯原稿。那些學者們是只重視自己見解的，我的記憶與他們的說法不同。爲了覆查自己的記憶。就請教毛氏這兩篇論文在甚麼時候寫的。

他表示，那兩篇論文確是在一九三七年寫的。

毛氏稱：蘆溝橋事變前後，他在延安的生活有數周的空暇。因爲軍隊已經出發到前綫去了，有時間爲抗日大學蒐集基礎哲學的教材，青年學生們在僅僅三個月的期間內，訓練成政治指導人員，需要簡單而基本的教材。

由於黨的迫切要求，打算歸納一下中國革命的經驗，把馬克斯主義的要點與中國的具體事例連繫起來，寫成了「矛盾論」與「實踐論」。澈夜的寫，白天睡覺。繼續了數星期，做爲講義兩小時就講完了。我自己認爲「實踐論」比「矛盾論」是更重要的論文。

「在一九三七年聽你講義的青年，以後在實際革命中得到鍛鍊，可是現在的中國青年，用甚麼來接替呢？」

他答道：現在二十歲以上的中國人民，不用說沒經過戰爭，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支配也沒有體驗。他們直接對舊社會一無所知。也許聽父母講過，可是聽人講歷史、看些有關的書，與在那個時代生存的經驗完全不同。

我接着問道：現在中國對學生們正着重鼓吹革命思想，造成他們體力勞動的習慣；中共採取此一方針，是爲了在國內保衛社會主義的將來呢，或者爲了永遠保衛國家的安全而這樣教導青年們呢？還是包括這

兩個目的呢？這似乎是很難區別……

毛氏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直接解答。反問道：真有永遠安全的國家嗎？

談到所有國家的安全問題，同時也談到全面裁軍的問題。他說：中共早就提了很多的裁軍方案，蘇聯也提過，美國也在口頭上繼續在談。可是在我們眼前擺着的問題，則是全面徹底的大整軍備——。

「把亞洲問題逐項解決，對詹森總統來說，也許太困難了。如果他希望將這些複雜的問題向全世界澄清，何不接觸問題的核心，接受中共的提案，召開世界禁核高峯會議呢？」

毛氏雖然同意了我的看法，但表示，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他認為，例如，即使詹森氏希望舉行這一會議，但他是獨佔資本家的僕役，資本家們沒有答應的理由。中共現在雖只爆了一次核彈，但是從此要一個接着一個的爆下去，非給他們看看不可。

雖然中共不希望有很多的核彈。大概任何國家都絕不會使用核彈，因此那些東西實際上是完全無用的。要說科學的試驗，兩三個就足够了。中共手裏有一個他們就大不開心，批評壞極了，被帝國主義者所討厭，把一切責任推到中共身上，掀起反中共運動，這事情有趣嗎？

是中共殺了吳廷琰嗎？可是他終於被殺了。當肯尼迪總統暗殺事件發生時，中國人民曾感到震驚；那也不是中國人民幹出來的。赫魯曉夫在蘇聯的下台，也使人受到震驚，這個也不是中共所策劃的事情。

老赫沒有人緣

「西方的觀察家們，特別是意大利共產主義者們，以為用陰謀的非民主的方法推倒赫魯曉夫，強烈的批判蘇聯的新領導人。你對這件事想法如何？」

毛氏答覆了左列的意見。

赫魯曉夫失勢以前，在中國也沒有多大名緣。

他的照片幾乎沒有被懸掛過。赫魯曉夫失勢以前，他的著作在書店裏擺列，現在仍然有的賣，在蘇聯則已經不賣了。赫魯曉夫曾是世界上重要的人物，他的陰魂還不易消散。竟有些人喜歡他，欲罷不能；中國替那些人們感到遺憾。

「對於某個人評價，如果他的行為百分之七十是正確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是錯誤的，對他也就無話可說了，這是你的七·三標準；如果依照你這個標準，你對現在蘇聯的領導者評價如何？距離合格標準要差多少呢？」

毛氏表示，對現在的蘇聯領導人不願發表此類的意見。今後中蘇關係也許會有若干改善，不會有多大的改善。赫魯曉夫之下台，大概只能使文字的論戰停止。

「蘇聯批評中共在促進個人崇拜，這種批評有沒有根據呢？」

毛氏答道：也許有一些。

史大林是搞個人崇拜的，赫魯曉夫則被論為完全沒有。批評的人們說，在中國人民中有若干個人崇拜（這種感情或習慣）的成分。這種見解也許有某些理由。說不定赫魯曉夫因為一點也沒有個人崇拜所以才失勢了……（譯者註：原文如此，不明白是誰說的）我在一九六〇年與毛氏會見時，也曾提出過這個問題。在當時曾約定不公開發表，中共有種見解，認為個人讚美在現時代有其必要的作用。我曾聽過很多詳細的解釋。在中共的這種現象，比外國人所想的要複雜得多，在這裏我並沒有提出上述的質問。

中美不會戰爭

「我個人對於中美兩國人民因歷史之演變，而分隔了十五年；任何的互相交流都不可能，而感到遺憾

。兩國間今天不該有這麼大的魔難。可是我相信這不會演成戰爭，在歷史上留下大悲劇。」

他表示：歷史的演變下去，不久兩國人民應該復合一起，那一天一定會到來的。

不會發生戰爭的看法大概是正確的。美軍不打到中國來，就不會發生戰爭。即使來進攻，對他們也沒有好處；那是絕對不被容許的。美國的領導人可能對這一點都了解，所以大概不想侵略中國。中共絕不會派遣軍隊攻擊美國，因此不會戰爭。

「越南局勢是否觸發戰爭呢？有關傳說美國正在考慮向北越擴大戰爭的新聞記載，你是否充分讀過呢？」

他不表示……他不想這樣想。美國務卿魯斯克，明確的說不那樣做。魯斯克似乎從前說過要擴大越戰，現在訂正前言，表示沒說過那樣的話。因此北越大概不會擴大戰爭。

「你是否以為美國執政者或美國政策，誤解你所說的話呢？」

他說：爲甚麼呢？中共的軍隊決不越出國境作戰。這說得很明確。只有在美國攻打中國的情況下，中共才起而作戰。還有比這說得更清楚的嗎？

中共在國內的事情特別的忙。越出國境作戰是犯罪的行爲。爲甚麼中共非得那麼幹不可呢？越南的局勢由越人自己來處理好了。

「可是美國當局在反覆的說明，美軍一旦自越南撤退，整個亞洲就要被侵略了。」

毛氏答道，問題是被誰侵略，被誰佔領。是被中共佔領呢，還是被當地的居民所佔領呢？要知道，中國也受過外國人的侵略和佔領。還有對中共軍隊的一些質問，毛氏斷然的說，無論是在北越或東南亞任何地方，都沒有中共軍隊，中共不在國境以外駐兵。

（他還在別的談話中表示，除非印度軍再侵犯國境，中印邊境再不會發生戰鬥。）

我問：「魯斯克國務卿說，如果中共停止侵略，美軍即從越南撤退。這個話是指甚麼說的呢？」

毛氏表示，因為中共沒有實行侵略政策，想要停止也沒有甚麼可停止的。

中共還不會有過侵略的行爲。中共雖然對革命運動加以支持，可是這不是用派遣軍隊來進行的。當然，無論何處開始了解放鬥爭，中共對之發表支援的聲明，發動示威響應。使帝國主義者煩惱的就是這些東西。

舉例來說，像金門馬祖的情況，中共不時的故意掀起風雲；在那裏也不過只打幾響炮，可是就驚動人們注目，一定是因為距離美國人的本土太遠了，所以才這般慌張。（譯者按：這是諷刺話。）在中國領空領海內只放兩三响空炮，會發生甚麼事呢？雖然用不着那麼驚慌，可是美國却考慮到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不足以對抗炮擊，因此把第六艦隊的一部分調來，又調來在舊金山的一部分海軍。可是到來看，發現他們無任何事可做。這樣一來，好像中共在命令美軍到這去，到那去。

他說，蔣介石的軍隊也有過同樣的事情。跑回這裏來，再急調別的方向等等，也做到能够命令的情況。肚子吃得飽飽的，自由自在的水兵（譯者按：指美國水兵），當然不能不給他們找點事做。對於實際以武力干涉，轟炸燒毀他國人民的傢伙不稱爲侵略者，而對於只在國內放幾响空炮就被稱做侵略者，這是怎麼回事呢？

毛氏說，某一美國人曾經談到中共的革命，指是俄國侵略者所領導的革命；其實是從美國人獲得武器的，接着這個他又說了一段話。

堅持美軍撤退

現在越南的革命和中共當時的情況相同，不單是中共從美國人獲得武器。越南「解放軍」在這數個月

內，美製武器的補給情況大有改善，對美國人訓練的傀儡將士的吸收也大為增強。中共的解放軍也是從美國人爲蔣介石訓練的軍隊中獲得補充，增強了兵力。他把這種現象會叫做：「換帽子」。當國府軍隊知道戴着不同的軍帽就會被農民所殺，就全部「換帽子」的時候，他們就臨近最後的命運了。越南傀儡軍之中，「換帽子」事件也正愈來愈多。

他說：中共革命得到勝利的條件：第一是當時的統治階級軟弱無能，其領導人盡是打敗仗的人物；第二，由於人民解放軍之堅強能幹，受到人民的信賴。如果在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美國人是可能插手的；如果具備這些條件的話，美國人或根本不插手，或者插手之後不久就撤退。

我問：「你不是說，在越南的『解放軍』，已具備了勝利的條件呢？」

毛氏表示：「美軍還不想撤退。大概戰鬥還要持續一兩年。等他們喪失了興趣，美軍就回國了。以後可能再轉到另一處去。」

我問：「對於舉行日內瓦會議來討論，統一越南及其國際地位這件事，你的政策是不是堅持美軍必須是撤退才參加呢？」他表示，可以考慮，有不少可能性。他說：第一、在會議一開美軍即撤退的情況下；第二、會議可以延長直至美軍撤完；第三、也考慮像在韓國的情況，開會的同時，美軍集中到西貢附近。還有一點，「解放軍」不靠會議或國際協定，也可以把美國人趕出去。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的會議，規定全部印支的法軍撤退，同時規定其他外國軍隊絕對不得介入。美軍不顧這些違反了協定，美國可能再次違反……

我問：「於現在這樣的情勢下，你想中美關係真有可改善的嗎？」

他答稱，仍抱有希望。

他說：但是這需要時間，恐怕在我這一代不能改善。我不久就要與鬼神相會了。依照辯証法的規律，

所謂矛盾也包含個人的生命，結果必須被解決。

我問：「回到你的健康問題上來，看你今晚的樣子，精神很不錯嘛！」毛氏露出苦笑，表示他對我所說的話，似大可懷疑。接着反覆的說，已準備與鬼神相會。我就反問他，是否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

我問：「你是不是想探求鬼神確否存在呢？你相信嗎？」他答道：「不相信。」

可是在智通萬物的人類當中，也有相信神是存在的人。神有很多，有時同樣的神被彼此爭引爲自己的神。在歐洲戰爭時，基督教的神跟隨了英、法、德等國。在這些國家相互戰爭時，也各以爲神跟隨自己。蘇彝士運河爆發危機的時候，神跟隨了英法兩國；可是對方却有阿拉（回教上帝）的神跟隨。

吃晚飯的時候，毛氏談到自己的兄弟們被殺的事情。他的第一個妻子在革命中途被處刑，兒子在韓戰中陣亡了。他則躲過了死，活到現在，慨然以爲奇跡。有好幾次，他雖然自覺到死亡，可是正因爲這樣沒有死。

毛氏說：該怎樣辦才好呢？好幾次想到了死。有一次就在身旁的衛兵眼看着被打死。那時候附近的士兵被炮彈所炸，全身染滿了血；在這種情況下，我却沒有負過傷，此外還有極度危險免於死亡的事情。

向美國人問候

毛氏沉默了一會兒，提起他作小學教員時代的事情，講了下面的話。

他說：那個時候對於打仗的事連想也沒想過。也沒想過要成爲共產主義者。從任何地方來說，都和你一樣只是民主的個人。是怎麼偶然碰上，有志參加創立中國共產黨，到現在我也還覺得奇怪，總而言之，一切事情單憑個人的意志是搞不起來的。重大的因素，只在當時中國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壓迫。那些都是事實……

我問：「是不是人雖然自己創造歷史，但由於不同歷史環境的影響而變成不同的東西呢？你把中國的環境改變了，許多人都在懷疑，在比以前幸福條件下生長的青年，將來會變成甚麼樣呢？」

毛氏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說：關於這個問題，恐怕誰也不能知道。但是有兩個結果是可以推想的。也許朝向共產主義的革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另一個推想，現在的青年們也許否定革命，採取使人憎惡的行動；這就是說，或許與帝國主義妥協，把蔣介石的殘餘份子帶回來，倒向國內僅有的反革命份子方面去。

毛氏說：當然，反革命是沒有希望的，可是將來的事情由未來一代的人依照當時的條件來決定；那時候出現甚麼條件，我們現在無法預料。有如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時代的人們，比封建時代的人們有廣闊，從長遠眼光來看，未來的一代人，應該比我們這一代頭腦還好。問題是他們怎樣下判斷，一定不會是我個的判斷。今天的青年們以及其未來的下一代，他們將根據自己判斷來評價中共革命的成果。

說到這裏，毛氏放低了聲音，眯着眼睛，繼續說下去。地球上人類的生存環境，正在前所未有的迅速變化。從現在起一千年後，無論是馬克斯、恩格斯、連列寧也是，一定被看成非常糊塗了罷。

當我表示要告別的時候，毛氏說，請代我向美國人民問候。

他說：大概不能祝禱美國人解放吧！他們不是已經獲得投票權了嗎？但是還沒有真正的解放，請為我所衷心希望解放的美國人祝福。

儘管我已經與他辭別了，毛氏仍送我到車旁；爲了做到北京傳統的餘情，依依揮手作別，他連大衣也沒穿，一個人站在零下的寒空下。大門附近看不見衛兵，在會見的過程中也沒有武裝護衛。我從開動的車裏揮手示意時，看見縮着肩膀的毛氏，有一個隨從人員過來扶住他，緩緩的走進人民大會堂裏去。（完）

毛澤東與我

蕭瑜

本文作者蕭瑜博士，曾在中國、歐洲及南美洲從事教育工作歷數十年之久。一九一九年蕭博士首次往法國，主持中國留法學生的「勤工儉學」計劃。一九二七年北伐勝利全國統一之後，他曾在南京、北平、長沙等地歷任教育界要職。一九三九年離華後，即未再返國門，大部份時間係在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及著作。本文為蕭博士年青時代與毛澤東同窗及共渡流浪生涯之記述，蕭博士原著共分四十二節，本文譯載其中十六節。為保持全文連貫性，未譯部份皆在括弧內簡述其內容。

——編者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毛澤東和蕭瑜一同挑着行李，從家鄉走到湘潭縣城，然後擠在湘江小火輪的統艙裏去長沙。這一年，毛澤東是十八歲，蕭瑜十七歲。他們在長沙一同考入「駐省湘鄉中學」，革命後改名為「長沙第一師範」。這學校內有一位老師名叫楊懷中，深受學生們敬愛，毛澤東曾自承其一生深受楊氏之影響。楊氏於一九一九年逝世時曾說：「我在長沙六年內，教過成千上萬學生，最得意的門

生有三人：第一、蕭瑜；第二、蔡和森；第三、毛澤東。三個最得意的女學生是：陶樂瑛、向警予及任培道。」

毛澤東的結髮妻子

楊先生有兩個孩子——兒子開志，女兒開慧。開慧居幼，她身材嬌小，有個圓圓的臉龐，她的容貌有點像她父親，有同樣的深陷而細小的眼睛，但她的皮膚非常白皙，不像她父親那樣黝黑。一九一二年，當我第一次看到她時，她是十七歲，正在長沙市立中學唸書。

從這一年起，我的兩位同班同學熊昆楚和陳昌，每逢星期天早晨都和我一起到楊先生的住宅拜訪，討論我們的功課，並且和他們共進午餐，然後再回校，開慧和她的母親也總是和我們同桌進餐。當她們進來時，我們總是恭敬地點頭致意，但從不交談。有整整兩年時間，我們每星期天都在一起吃午飯，我們吃得很好，而保持沉默，我們之中從沒有一人說過一句話。當然，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並不是對別人熟視無睹，但我們必須做得似乎在桌上沒有別人一樣，有時我們的視線相交，尤其是當其中兩人同時在一個菜碟中夾菜的時候。但我們只是互相看一眼而從不露笑容。

他的夫人總是非常疼愛，是位廚中高手，總是給我們吃得很豐富，我們都大快朵頤，因為學校裏的伙食實在太不餓話，我的兩位朋友和我，每星期天訪問楊先生時，總是吃得比平時多，有時候我們還必須自制，以免露出一副餓相。我們曾建議我們每次去吃飯應付錢，楊先生表示如果我們喜歡付錢也可以，因為許多外國大學有此作風，但他堅持只能付很少錢，作為一種象徵式的付款。

我們三人總是同進同出。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一九一二年，有一次午飯後，楊先生送我們到門口時，突然叫熊昆楚稍留片刻，熊昆楚就留下，我們兩人先走了。我以為楊先生一定有甚麼不想讓我們知道的

事要對熊昆楚說，因此事後我們也沒有提過這件事。

救不了楊開慧的命

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時，驚愕地接到開慧的一封信，報告她父親的噩耗。她知道我是如何地欽佩和尊敬楊先生，她也知道他的死訊對於我說來，正像我自己的生父逝世一樣難受。她的信中字句非常哀怨。我和她以前從未交談過，這也是我生平收到她的唯一的一封信。在信末她說她已回到長沙，但她並未寫地址，所以我也無法寫覆信。

毛澤東在一九二〇年返回長沙後，與開慧結婚。他們生了兩個孩子，其中之一就是後來被非共的中國人稱爲「毛王子」的（按：係指在韓戰中陣亡的毛岸英。楊開慧之次子毛岸青於一九四九年時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任翻譯，此後未見報導其行踪——譯者）。但開慧並非毛澤東的第一個愛人。毛澤東的初戀對象是我們的同學陶素瑛，就是被楊老師稱爲最得意門生之一的。陶小姐是個非常能幹的人。一九二〇年時她曾和毛澤東在長沙合辦了一家書店，但他們意見不合，終告友好地分手。陶女士後來在上海創辦了「立達書院」，她終老於上海。她較毛澤東的第二個愛人開慧年長得多。

一九二〇年我從巴黎經北京返長沙，曾打聽楊師母和開慧的住所，因爲我想拜訪他們。毛澤東對我說，她們住在距市區很遠的鄉下，且對我隻字不提他的戀愛經過。後來他終於把地址告訴我，我拜託楊夫人的一位朋友袁夫人代我帶一件小小的禮物給楊夫人。我對自己未能答覆開慧的來信深感歉意，我而且有一種內疚感，因爲我未能悉心整理楊老師的遺囑。

一九二七年時，我在南京獲悉湖南省政府正在通緝開慧，因爲這時毛澤東已是一個著名的共產黨頭子，而開慧是毛澤東的妻子。我會盡我之所能，包括寫了許多信及拍了許多電報給有力人士，企圖挽救她的

生命，但完全沒有用。

一九三六年，當我第三次旅居巴黎時，我的老朋友熊昆楚來看我。我們自然而然地以懷那的情緒談論着我們的母校，同為楊老師一家的遭遇深感惋惜，我們都認為開慧竟被槍斃，實在是太可怕了。熊昆楚長嘆了一聲說：「殺開慧者，潤之也。」（按：潤之為毛澤東之別號。）

是命中註定的悲劇

我終於向他提出一個纏繞我心頭已久的問題。我說：「大約在二十年前，我就想問你一件事，但我並沒有問。現在我希望你告訴我。你是否還記得有一天我們三人離開楊老師的住所時他把你叫回去嗎？楊老師對你說了什麼？到底是什麼秘密？」

他毫不猶豫地答覆道：「楊先生夫婦希望你和他們的女兒開慧結婚。他又說，開慧自己也有此意。」我對楊先生說你已結婚。這就是為什麼我當時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你的原因。」

原來如此。現在我說不出話了，我陷入了沉思。我悔恨自己以前竟不知此事。開慧曾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而我竟沒有作覆。當我返長沙時，我竟不去探望她，只送了一件小禮物給她的母親。她必定認為我是麻木不仁的，我竟對她毫無同情。我在深感內疚之餘，自付：「如果我當時沒有結婚，如果我接受了她的愛，她就不會因為是毛澤東的妻子而被逮捕和槍斃。」

提及中國共產黨的起源，必須談到我們的朋友蔡和森，他是一個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主義原則的中國人。他在使毛澤東投身共產主義的過程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因素。

蔡和森，我們都稱他和森，和我生在同一個村子裏。他的身材高而瘦，兩隻門牙向前突出，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意志堅強，人們雖然很少看到他面露笑容，但他對朋友非常好。

和森與我是湖南第一師範的同學，但他比我低兩級，後來他轉學到嶽魯山高等師範。他的母親是我們鄉裏的小學校長，我們都稱她「姑姑」，她還有一個女兒叫蔡暢，就是現在中共全國婦女聯合會的主席。當蔡暢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時，我們慣常叫她為「小妹」，她像她的哥哥一樣有非常堅強的意志，但是她的身材很矮小，而且在體格上完全比不上乃兄。我非常喜歡和森，並且尊重他一家人。

和森的缺點是缺乏主動性和衝勁，也從不願向人要求任何幫助，也從不討人歡喜，因此，他在高等師範畢業後始終找不到一份職業。他和母親及妹妹一同在嶽魯山下租了一間小屋居住。他們非常窮困，經常無米為炊。

我則有固定收入，因為我當時在「許益」及「楚怡」兩校任教，且在楚怡學校內面宿舍居住。毛澤東知道我與和森之交誼，有一天他匆匆忙忙地跑到學校來看我，一見我就說：「你有和森的消息嗎？」

孤獨地住在愛晚亭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我頗感驚奇，我回答說我已有很長一段時期沒有見他，並且在等他的消息。」

「噢，」毛澤東說，有人告訴我，他們家裏沒有米，和森在家不得安心，而且覺得自己加重了他母親的負擔，拿了滿滿一籃子書，到嶽魯山下的愛晚亭去了。」愛晚亭是一個用四根柱子撐着一個尖頂的小亭子，四壁露空。毛澤東又說：「他一無所有，餐風露宿。」

「你見到了他嗎？」我問。

「不，我沒有見他，老陳告訴我的。」

「你為什麼不去見見他？」我問。

「我去毫無用處，我沒有什麼可以幫他的。」毛澤東聳聳肩膀走了，把這責任推在我身上。

毛澤東走後，我向校方請了假，立即渡江前往姚魯山。當我走近亭子時，看到和森坐在石板下，背靠着
一根木柱，手中捧着書，看得非常出神，根本沒有聽到我走過來。他似乎把整個世界看成已死了的。當
我叫他的名字時，他抬起頭來，樣子顯得很驚奇，說道：「你那裏來的時間跑這麼多路渡了江來看我？」
「我請了一天假。」我答道。

「我想必是去姚魯學院？」他問。

「不，老兄，我不去這個學院，我是專程來看你的。我也要探望探望蔡姑姑。」我說。

「有什麼新聞嗎？我好久沒進城去了，這裏又沒有報紙。」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新聞，」我說，「你住在這亭子裏嗎？這想必非常舒服涼快，但如果下起雨來
可不是好玩的。」

「現在又不是雨季。」

「我來這裏邀你和我一起到楚怡學校去住，我在那裏感到非常孤獨。在我臥室外有個小廂房，放得一
張床，你可以在那裏唸你的書，下課後我們可以一起聊天。」

「這可不是你的家，」他說，「你是住在學校裏，我可不能給你麻煩。」

「這完全沒有什麼麻煩，我們的宿舍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樣，決不會有麻煩，你將有賓至如歸之感。來
吧，我一定要你現在就走。今天就去。」

四塊大洋送蔡姑姑

他答道：「我必須先回家安排我的東西，我明天跟你去。」

我終於同意，我們就一同去看蔡姑姑。和森小心翼翼地把書都收起來，一本本放進破籃子中。當我們

到他家裏時，蔡姑姑叫她的女兒到山上去採一些樹枝來。不久，「小妹」帶着愉快的笑容給我端來一杯滾水。他們買不起茶葉，而姑姑却帶着歉意說是因為「沒有時間進城買茶」，並且叫我喝了這杯熱水吧。我給了她一個小紙包，裏面有四塊大洋，並且說：「這是給姑姑的一點小意思。」

「噢，謝謝你」她說，「你不要這樣客氣啊！」她一面說，一面謹慎地把這包東西放進口袋裏。

毫無疑問，她知道這裏面是錢，但她却不知道這裏面是多少錢。在看時，四塊錢是一筆很大的禮，她們母女至少可以購買兩個月的糧食。接着她就走進房裏，過了一會走出來，在她經常鐵板的臉上堆滿了愉快的笑容。她沒有說甚麼，但我知道她已拆開了紙包。

「蔡姑姑，」我說：「我來是要帶和森去我的學校裏住，在這裏太孤零，而我在學校裏教完課後也很孤零，所以我要來拉他和我一起住。」

「好，這很好。」蔡姑姑說，「他在這裏真是太孤零，而且心緒不定。所以他要到愛晚亭去住！」翌日，和森帶着他所有的東西，挽着一個小包搬到學校，我把他安頓在我宿舍外的一間小房裏，有一張桌子和一個書架，光線充足。可以憑窗讀書。窗外有一棵盛開鮮花的大樹。

毛澤東在下午又來看我，但我還沒有下課，所以只能和他略談數語，直到下課及學生都離去，我們三人作了一次長時間的交談。毛澤東建議和森長期住下去，和森當然高興聽到這話，後來我們一起吃晚飯，飯後毛澤東同第一師範去，他當時還是學生。

他每天只吃一頓飯

因為我要和學生們一起吃飯，和森就只得獨個兒在我的房裏吃飯，我曾要求廚師爲他準備一日三餐，但我獲悉他每天只吃一頓，在中午的時候吃。每天下午他總是外出，直到晚飯時間過後才回來。當我問他

爲什麼不和我一起吃晚飯時，他說：「我喜歡在下午到圖書館去讀書，有時候到家裏去。我當然就在家裏吃了晚飯才回到校裏來。」

這似乎太奇怪了，因爲他的家很遠，而且要渡江，他怎麼會每天回家吃飯？我也想像不出他在城裏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吃飯。不，他一定每天只吃一頓飯。

不久後，廚子開玩笑地向我評論我的朋友的食量。他說：「你這位客人，胃口可真大！我以前只給他一小碗飯，可是現在他要吃三四個人的飯量。」

聽到這話後，我有點懷疑和森每天是否只吃一頓，他可能把飯藏到晚上吃。我再一次問他晚上在那裏吃飯，但我看到他不高興回答，所以我也就不再問了。他也許是不願我破費太多，想替我省一點額外的開支，但他不願向我說明。可是這是用不到說明的，他的用心使我深爲感動，我叫廚子給他每頓添一個菜，使他晚上也可以吃飽。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和森的自制力量，和不願牽累朋友的性情。

後來他和我一同組織了一個學生們的「半工半讀運動」，一九一九年，他和他的母親及妹妹一同在勤工儉學計劃下赴法國，他住在蒙太奇中學，苦讀法文。在這所中學裏，他和我們最優秀的女同學向醫子墜入了愛河。當時我也正在法國，和森把他的愛情生活都告訴了我。他們兩人合寫了一本描述自己戀愛的小冊子，題目是「向崇高目標前進的盟約」。當他們徵求我對這本書的意見時，我知道他們已像夫婦一樣住在一起，但仍反對結婚儀式。因此我說：「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要祝賀你們，並且向你們獻一句賀詞——向下面目標前進的盟約——只對你們的青名改兩個字。」

接受了共黨的一切

很早以前，和森已坦率地表示他對所謂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早在俄國革命之前，已有這種觀念，但

他當時還不知道怎樣來反對資本主義。當俄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後，他理所當然地全心全意及毫無保留的接受俄國共產黨的一切教義。我曾經企圖說服他們在接受共產主義的原則之前，應該先對它加以總研究及分析，但他堅稱無此必要，因為共產主義的真理已經非常明顯。法國的「人道報」充斥着共黨宣傳，雖然和森的法文程度還很差，但他每天拿着字典捧住這張報紙。由於他對報紙的內容不甚了解，在翻譯中有許多錯誤，可是也從不向人認錯，甚至對自己也不承認有錯。他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一經接受了一種觀念，就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動搖他的信念。但每當我們交談時，總是愉快而且無話不談的。雖然我們的意見大相逕庭，但我們都尊重對方的意見，直到和森逝世時，我們的友誼仍非常穩固。

當他和許多中國學生一同在法國時，他組織了一批傾向於共產主義的同志，一同宣傳他們的教義。在那些受他的影響最大的人之中，包括回響予、李維漢、蔡暢及李富春。毛澤東的思想，也深受和森寫給他的許多信的影響。

一九二一年，和森與他的家人一同回到上海，他出任了共產黨機關報的「响導」主編。

一九二五年我在北京輔仁大學執教時，我接到他的一封長信。他的情信向響予在漢口法租界被捕，他要求我救助她。雖然我已盡了我的力，但她終於被槍斃。我深感哀悼，因為雖然具有和我不同的政治觀點和哲學思想，但她無論如何是個好朋友。

數年後蔡和森也遇難。他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辦者之一，但他始終是我的親密和深受敬愛的朋友。

妙高峯上的一夕談

「長沙第一師範」學生的日常生活非常嚴格，他們的活動都受嚴厲管束，進課堂的時間、進圖書室的時間、進膳堂的時間、以至進宿舍的時間，都有規定，到時候吹起喇叭，就像軍隊中的軍號一樣。每當喇叭

叭聲一響，千餘名學生就集合在一起，像鴨子一樣，被十來名訓導員趕來趕去。毛澤東和我都激烈反對這種被我們認為是不必要的紀律，我們經常不理會這些喇叭聲。曾有一度時期，訓導員會和我們逼不去，但最後總是校長出來打圓場，因為我們都是好學生，而且我們的操行紀錄良好，我們之不服從軍號總是不受追究。

我們完全不理會這些喇叭聲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常在一起交談，而不願使這種交談中斷。我們認為這種談話是極重要而且極有意義的，必須繼續不斷地談下去。

我們兩人經常在晚膳後，沿着河岸一邊走一邊談。在炎熱的夏日，當其他同學在上大課或進圖書館後，我們倆總是溜出來，在妙高峯的草坪上席地而坐。妙高峯是一座小山，高約兩三百公尺，就在學校後面，從體育館走過去只消幾分鐘。在這座小山上，我們可以望城內的一切，也可望見桃魯山山峯。我們常在夜間來到妙高峯頂，遠眺長沙市內的萬家燈火，閃爍在明月之下，與遠處的星星遙相輝映。

我特別記得一次非常值得追憶的夜晚。我們像往常一樣在晚膳後漫步來到妙高峯頂，在草地上揀了一塊舒適的地方坐下。我們促膝而談，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聽到喇叭聲。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地說：「他們現在正在走進閱覽室。」過了一會，喇叭聲又響了，我們說：「現在他們正在排隊走進宿舍。」半小時後，最後一次喇叭聲響了，我們又不約而同地說：「現在他們熄燈了。」但我們仍坐在山頂上交談。整個學校沉在一片漆黑中，我們知道只有我們兩人沒有在床上。後來我們知道自己已被舍監記名，但在當時，我們深深地沉浸在我們的交談中，對於晚上不回校就寢的後果，根本想也不想。

必須要有嶄新力量

這段時期，正值袁世凱担任民國大總統，我們倆經常討論，是每天報紙上看到的一些事件，並且設法

揣測着中國的前途。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們那一夜所談的事。我說：「試想袁世凱對中國的前途有多大影響！他只是一個竊國大盜，而那些帶兵的人都只是他的傀儡。」

「除了袁世凱之外，似乎找不出第二人能執行中國所必需的改革。」毛澤東說：「康有為有一些崇高的理想，但已不合時宜了。至於孫中山，他是革命真正領袖，但他毫無軍事力量。」

「要使中國進行改革，必須有一種嶄新的力量！」我說。

「當然，需要新的力量。」毛澤東同意我的見解。

我指出：「要改革這國家，每一個公民必須先作改革，每個人必須先糾正他自己的品格。」

「集合一批人來為一個明確的理想努力」毛澤東說：「我們兩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不，只靠我們兩人是不夠的！」我說：「必須有許多，而他們必須與我們具有共同的理想。我們兩人可以把他們組織起來，他們將成為我們的同志。」

「讓我們先看看我們學校裏的同學。這裏有十把人，看看有多少能夠參加和我們一起。」

「我們必須揀最優秀和最學識的，」我指出：「並且必須是具有崇高理想的。」

「我們可以知道那些人是取有學識的，這個很容易，」毛澤東說：「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品德怎樣。可是要知道他們的理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我兩人可以去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然後從他們之中選出我們認為是最優秀的，我們再與他們每一個人個別深談。」我建議說：「譬如在高等師範中，蔡和森的為人是任我都深知的，他和我假有着共同的理想，又如熊昆楚，陳昌及陳紹禹，我確信也可作為我們的第一批同志。在較低班級中，你知道的情況比我多，你可以去選擇。」

毛澤東同意我的意見，並說：「是的，我們心目中已經有一兩個人，我可以去和他們談談。」

毛擬信稿我草會章

我們繼續談論着我們的計劃，我說：「在校內的成千學生中，我們只要在開始時選出十來個人。我們有充分的迴旋餘地，這種遴選工作必須非常慎重地進行。如果我們在千人中找不出十個人，那就不堪設想了。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協會，以這十人爲核心，當他們有了完善的組織時，我們可以開始徵求更多會員。」

毛澤東建議道：「這個學會必須有一個堂堂正正的名稱，也必須有會章！爲甚麼你不現在就開始寫下一些會章條文？」

「這個協會的目的是爲了學術研究，我認爲可以稱爲新民學會。」

夜更深了，我們的交談仍繼續着。我說：「我認爲新民學會應該有三個目標：第一、提高會員們的品德；第二、交流學識；第三、鞏固彼此間的友誼。」

「我想你最好還是把它寫成條文，然後我們可以再作更縝密的研究。」毛澤東說。

我們詳細地討論了應該怎樣徵募新會員，我們都認爲單在學校裏徵求會員是不夠的，應該還要到校外去徵募。這不是一件易事，我們對進行方式作了長時間討論。

最後，我們決定把我們的目标簡單扼要地寫下來，其中包括救國救民以及我們建立這學會的宗旨。我們決定把這些意見有條有碼地寫下來，送交其他各校的學生會供他們考慮，凡同意這些原則和目標的，可以寫信通知我們，我們就去拜訪他們並作交談，彼此志同道合，就可加入爲會員。

我們兩人之間作了一項分工，由毛澤東執筆寫一封信，用油印寄發長沙市內的每一所學校。這是一封非常簡短的信，大意爲：「吾國現正遭遇嚴重困難，中央政府內無一人值得置信。本會之基本目標爲自我

奮發及改革國家。凡對此項觀念有興趣者，請來函通知，吾等將當面討論以作進一步之計劃。」這不同於一般的公開信，我們担心人們會嗤笑我們的狂妄，因此在信末沒有署名，只用一個筆名「二十八筆」，毛澤東的姓名正是二十八劃，這也許是一種預兆，因為「二十八筆」後來成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代名詞，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黨綱也是二十八條。當毛澤東草擬此信時，我則埋首草擬新民學會的會章。我們各自完畢後，交換查閱，互相作了一些修改和建議，東方已露魚肚之色，突然我們聽到山脚下響起了喇叭聲。現在已是早晨，校裏已經吹起了起身號，我們就走出山來回到學校裏去。我們把一整夜的時間，用在我們改革中國的計劃之第一步上。

中國共產主義胚胎

毛澤東與我在一九一四年創立了「新民學會」。在開始時，這只是一個學生的組織，這些學生都是經過縝密遴選的，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共同的理想，目的只是提高每一個會員的道德與學問，同時希望對國家作必需的改革，但並沒有任何政治主張，也不爲任何政黨所影響。可是後來，毛澤東及其他一些會員產生了政治野心，並且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今天在北京的最高級統治者們，有許多都是以前新民學會的會員；但當年的新民學會中一些較有學識修養及具有更遠大理想的人，今天仍効忠於自由主義。因此，我們的學會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胚胎；當共產主義理論在中國大爲擴張之時，這一運動的核心已存在於我們的學會內。我把新民學會稱爲中國共產主義的胚胎，是因爲我認爲這是一個最適當的名詞，雖然在數年後有了其他的名稱出現（諸如中國共產黨等），但新民學會仍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核心。

我完全記得在這一年的春天，我擬就了新民學會的會章，全文共十一條，每條都很簡單。毛澤東讀了這份會章後，未提出任何修改意見。我們接着逐個審核我們心目中將加以吸收的會員名單。我們認爲他們

都合格。這張名單上一共有九人，換一句話說，我們的學會共有十一名正式會員。我們具有青年人的天真和狂妄，自認為是十一個「先知」，是我們這時代的先驅者。我們也把彼此視為兄弟，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抱負與理想，並且互相景仰及尊重。

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們十一人一同聚集在「第一師範」的一間課室中，氣氛非常嚴肅，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我分發了油印的新民學會會章，要求大家提供建議、問題及意見，但沒有人提出。每個人都繳納了小額會費，我被選為第一任書記。我們決定不需要選舉一名主席，會議至此結束。在會上，雖然沒有人發表演說，但我們之間已自然而然的產生了一種同志感，我們的抱負和理想都因為這次會議的召開獲得了新的刺激力。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從現在起，我們的肩上似乎已負起了更大的責任。

毛澤東在會上沒有發言，我們都已深切瞭解這組織之目的，也知道每個人應負的任務，我們的任務是多做事、少說話。我們學會內只有一個人是喜歡爲了說話而說話的，他就是以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而聞名的陳昌（譯者按：陳昌，字章甫，中共成立後之第一任宣傳部長）。他是我們的同學，是湖南瀏陽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即使像他這樣喜歡說話的人，在我們學會的成立會議中也未發言。他後來成爲中國共產黨的創辦者之一，於一九二八年初被國民政府槍斃了。

最早的三位女會員

學會成立後，我們大約每月集會一次。這些會議並非秘密的，但我們儘量做得不太招搖，因為我們的會員人數有嚴格限制，很難不引起其他同學因未被邀加入而發生妒忌或不快。我們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怎樣依照我們心目中的標準來徵募新會員。每當一位被認為可以引爲同道的人之姓名被提出時，我們即進行一次表決，只要有一人反對，此人就被拒入會。要獲得入會，必須獲得全體會員的通過。

我們的老師楊懷中知道有這麼一個組織，而且也知道我們遴選會員的嚴格標準，這是熊昆楚和陳昌告訴他的。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在長沙有三位女學生，似乎具備參加我們的學會之一切標準，這三人都是最好的學生：她們的名字是：陶素瑛、向警予及任培道。後來我把她們的名字在會議中提出，獲得一致通過加入為會員。

陶素瑛是湘潭縣人，是我生平所認識的最和藹可親的人之一，她在一九一四年加入新民主學會。六年後，她和毛澤東一起在長沙開了一家書店，名為「文化書局」，當時他倆正在熱戀中，但因為他倆的政治見解不同，她終於離開了他，到上海辦了一家立達書院，一九三零年時病逝上海。她是新民主學會最早的女會員之一，也是新民主會內第一批拒絕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會員之一。

向警予也是一個美麗動人而聰明伶俐的女子。她的文學修養和書法都出人頭地，並且有語言天才。她有大賦的詩人喜歡的性格，對朋友非常溫情，就像兄弟姊妹一樣。一九一九年，她在「勤工儉學」計劃下到法國留學，與蔡和森墮入了愛河。她是中國最早接受共產主義的女子之一。上文已經提到過，她後來在漢口被國民黨軍隊槍斃，我雖曾向法國公使館呼籲企圖挽救她的生命，但未成功。她之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並不減少我對她的景仰，我會爲她的悲劇收場而深感痛惜。

另一位女會員任培道，是湘陰人。她們三人像姊妹一樣親密。任培道與陶素瑛一樣，從一開始就拒絕接受共產主義。她在湖南高等師範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回國後，曾在許多學校中擔任教師及校長，今天她不僅是台灣立法院委員，而且有教授頭銜。

會內出現秘密集團

當這三位少女加入新民主會後，我建議也應該邀請蔡和森的妹妹蔡揚加入。但其他會員，包括她的哥

哥在內，認爲她太年幼，因爲她當時只有十五、六歲，而且剛進中學。數年後，她參加「勤工儉學」計劃赴法國，才正式加入新民學會。目前，她是中共婦女組織之一的領袖。我們都非常喜歡蔡暢的堅強而誠實的性情，由於我們都很尊重她的母親和哥哥，所以都稱她爲「小妹」，事實上我們也的確把她當作自己的妹妹看待。

當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時，新民學會已有會員一百多人。在一九一九及一九二零年，蔡和森與我在法國徵募了約三十名新會員，而毛澤東當時仍在長沙，也徵募了將近一百名新會員。毛澤東的主要興趣是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因此他愈來愈不注意我當初所堅持的會員品德及理想之標準。他公開而積極地招募新會員，只要與他自己有相同思想的人，都被接受加入。他急不及待地把我們的理論付諸行動，並用報紙的形式出版了一份新民學會的會刊。我給毛澤東的許多信件都被擅自登在這份會刊上，包括一封我談述自己的思想之信件，我在這封信中說我不相信俄國的共產主義可以充份地適用於中國的改革。到這時爲止，新民學會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每個會員都可以充份自由地表達他自己的政治思想。

到一九二零年，分裂開始呈現，以毛澤東爲首的一羣擁護共產主義的會員，在會內成立了一個獨樹一幟的秘密集團。我也許是所有非共會員中唯一知道這件事的人。因爲毛澤東會把這個集團的一切內情告訴我，希望我也加入這個集團。同時，他肯定地認爲我即使不同情他們，我也不會出賣他們。

這個新集團視我爲老大哥，因爲新民學會的所有會員一向都很尊重我而且聽我的話，因此毛澤東深恐我之不加入這集團，會使這集團內的某些人失去信心。但他不敢公開譴責我，因深恐會使這集團內的某些人同情我，所以他只能在背後對他們說我雖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而且是他的好朋友，但我具有資產階級思想，我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一份子，因爲我不願接受共產主義。

毛澤東開始攻擊我

終於有一天，發生了一件很可笑但也很有意義的事，足以說明我們之間的分歧。新民學會內最年長的會員何叔衡（編者按：中共創辦人之一，一九四〇年與毛澤東之弟毛澤民在新疆被殺），我們都叫他「何鬍子」，因為他滿臉于思，他長於毛澤東和我約十歲。雖然他和我兩人都是好朋友，但他和我的關係比較親密，因為我在楚怡學校執教時，曾與他有過兩年同事之誼。這天，他跑來對我說：「潤之（指毛澤東）在會員中秘密地攻擊你，說你是布爾喬亞，又說你不同意共產主義，他的真正用意是要使他們不信任你，而只跟着他一個人走。」

我把何鬍子對我說的話向毛澤東當面對質，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承認了。我問道：「你爲什麼說我是布爾喬亞？如果是因爲我會說過我反對共產主義，你應該知道我所反對的是俄國共產主義。你總知道我是非常贊成共產主義原則的，而且我認爲社會主義應該逐漸地過渡到共產主義。」

毛澤東當時默不作聲，但何鬍子大笑著說：「老蕭，當你不在時，潤之要我走一條路；當潤之不在時，你企圖說服我走另一條路；當你們兩人都不在時，我不知道究竟應該走那一條路！」這引得我們都哈哈大笑，但這却是事實。

何叔衡的這席話，雖然是當作笑話隨便說說的，但他已在不知不覺間說出了新民學會所有會員心中要說的話，因爲當時新民學會內部的確已出現了兩個相對的派別。但何鬍子並不是第一個坦白地指出這種分歧的人，事實上所有會員幾乎都已發覺了兩位領袖之間的意見分歧，並且認識到新民學會的分裂。

有趣的叫化子生涯

一九一六年六月，我開始在楚怡小學執教。第二年，當暑假將來臨時，我覺得在這三個月的假期內需要找一點新刺激。因此我決定在暑期內去行乞。

叫化子生涯之所以對我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可以使我躍出固有的生活圈子，去考驗我在肉體上和心理上克服困難的能力。在中國和許多東方國家，一向把行乞視為一種專門職業，而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只有一個人窮途落魄時才去行乞。試想，一個人可以身上不帶一文而到處去遊逛，這該是多麼有趣的事。

當時毛澤東仍在「第一師範」求學，但他常來找我聊天。

有一天他說：「暑假就要到了，你們的學校幾時放假？」

「我們現在正在大考，一星期內就開始放假。」我答。

「我們將在兩星期後開始放暑假。」毛澤東說。

「你是不是仍像去年一樣呆在校裏渡暑假？」我問他。

「我還沒有決定今年暑假做些什麼。」毛澤東說：「你打算怎樣？」

「我在今年暑假有個新計劃。」我對他說：「我已決定我要去嘗嘗（口旁）做叫化子的味道。」

「是啊，我決定去做叫化子。我對長途跋涉而不帶一文錢，沿途乞食乞宿，我相信這將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假期，我將遊覽許多有趣的地方！」我解釋給他聽。

「我仍不明白！」毛澤東說：「如果你找不到可以乞食的對象，或者人家不願向你施捨，到時你怎麼辦？你總不會喜歡挨餓吧！」

「啊，這就是最有趣的事！」我解釋道：「我要知道人們對我的反應怎樣。難道你認為做叫化子的人都會餓死嗎？」

「這話有理，的確沒有聽過有叫化子餓死的事。」

「這還不算什麼，」我說：「叫化子是最自由和最愉快的人，你記得『做慣叫化，皇帝也懶得做』這句話嗎？你想想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噢，這是因為做官的肩上有責任。」毛澤東答道。

「不僅如此，」我說：「做官受到許多繁文縟節的約束，而做叫化子則是完全自由自在的。我曾經歷過這種愉快而自在的討飯生活，你可知道是怎麼樣感覺的？」

「這可不知道，但我可以和你一樣想像得到。」

「可是我並不是想像，我的確曾經做過叫化子。」

「你說你真正討過飯？」毛澤東驚奇的問。

「是啊！你不知道這件事。我以前從沒有把我生平這段奇遇告訴過你。」

曾經做過兩次乞丐

毛澤東急不及待地問：「告訴我吧！這一定很有趣。」

「這是四五年前的事，我曾經做過兩次乞丐。第一次只做了一天，但第二次做了三天。我體會到乞丐生涯的優哉游哉！我決定要去深入地體會乞丐生活。第一次我在清晨離家，漫無目的地在鄉下亂走，當我感到饑腸轆轆時，我就開始去乞食。第一家人家給我吃的東西吃不飽，於是我再走第二家。這家人給我吃的東西很鮮，所以我就跑第三家，他們讓我飽吃一頓，吃完後我就走回家。天將黑時我又肚餓了，我就再討乞了一點白飯，終於我在月色朦朧下回到了家裏。」

「人家看到你時，是不是真把你當作叫化子？」毛澤東好奇的問。

「看他們的反應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些人是冷淡的，真是一毛不拔。也有些人問我是不是讀書人，

他們顯然懷疑我是一個鬍子乞食的落魄書生。但我只答覆說我身無分文，肚子餓了想要點吃的。有些人非常同情，拿出東西讓我吃，還和我談天。有一位老婆婆給我一滿碗白飯，幾碟菜還給我煎了一個雞蛋，她有兩個兒子在城裏唸書，她幾次三番地問我爲什麼城裏的讀書人會窮得要討飯。我和她作了非常有趣的談話，並且對社會心理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黑夜敲門茅舍求宿

「這是非常有趣！」毛澤東說：「可惜你只做了一天。」

「是啊，這就是爲什麼我第二次又去做乞丐，而且一做就做了三天。這次却遭遇了更多的難事，因爲我得找個地方住。」

「但有誰肯讓你住一夜？」毛澤東問。

「爲什麼不能？且聽我說。這也是在那暑假裏，夜裏不太涼，而且有明月當空。這是一次奇妙的經歷。我在四顧無人的鄉間漫步，似乎世上只有我一個人，沒有阻礙，沒有憂慮，完全自由自在。城裏日常的煩囂生活早已拋諸九霄雲外，只有明月和星星爲伴，我以前從未有過如此恬靜安適的感覺，我決定在月色下的田野閒蕩一夜。黎明時，我在一條小路旁睡下，鼾睡至中午。起身後就去乞食。第二夜却不同，沒有月光，四週一片漆黑。在天黑之前我已爬到一座高山頂上，當我爬下山時，夜幕已低垂，我看到一個巨大的山洞，比天空還黑。洞口吹來陣陣陰風，我開始害怕起來，這一夜不像前一夜那樣愉快。」

「你不怕山上的老虎和野獸嗎？」毛澤東問。

「老實說，我在這時開始想聽到一切我會聽到過的關於山大王的故事，我感到似乎老虎已經出洞來覓食。正值我呆立在那裏考慮是否趕緊回頭走時，忽然看到遠處有一線燈光，從一座小茅舍的窗戶中透出來

。這顯示附近有人居住，我就快步走過去。不久後，我已站在茅舍前拍門，從門縫中看到一個年約十七歲的小姑娘打着燈走來。她沒有開門，問我幹什麼。我說我是個叫化子，在山中迷了路，要找個地方過夜。她以驚訝的眼光看了我一會，就轉身走進去了。我知道她不敢給陌生人開門，一定是去叫父親了。不久，一位老人拿着燈走出來，問我是誰？從那裏來？有沒有伴？我的答覆似乎使他感到滿意，就開門讓我進去。他把燈掛好，對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我也仔細地看着他。他顯然是個農夫，五十上下的年紀。他對我看了一會後就露出笑容，我知道他對我已無懷疑。我轉身看那姑容桌旁的少女。她的頭髮梳成一條長辮子拖在後面，穿着一套藍布衫褲，從她晒得黝黑的臉上，可以看出她也在田里工作，但她有一對又大又亮的眼睛和潔白整齊的牙齒，她也正在看我。

希望和我一起討飯

「她轉身對父親說：『爸！你有沒有問他要吃一點東西？』我說我沒吃過東西，但並不太餓。這少女一聲不響走進廚房，她的爸爸仍和我交談。過一會，她含笑端給我一杯熱茶，並說：『飯就快好了。』那位老農探問我的家世並問我為什麼淪為叫化子，我把自己是個學生的真相告訴他。他說他的妻子在去年去世，只有一個女兒，父女倆相依為命。當那少女端着飯菜出來時，老農說：『我兒！這個年青人不是叫化子，他是個學生。』我們邊吃邊談，吃完後就上床。我已非常疲乏，而他們也習慣早睡。

「第二天破曉大家都已起身，我要向他們告別，但他們苦苦求我留下。終於我和他們一起吃了午飯才謝別，我們至今仍保持着友誼。」

「啊！」毛澤東嘻皮笑臉地說：「現在我知道你為什麼對乞丐生活感興趣！你仍要去看這老農和她的女兒。」

「去年冬天我回家時曾去看他們。」我解釋說：「我帶了一點禮物去。那女兒已結婚，有了一個兩歲的孩子，仍和老人住在一起。今次我要走一條新路，要看一點新事物。最有興趣的就是克服困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和一群同樣貧窮的人一起過活。我希望看看我怎樣才能克服這種困難。」

毛澤東興奮勃勃地說：「這真是非常有趣的事。讓我和你一起去好不好？」

「如果你有意見當然很好。乞丐生活總是獨個兒過的，從沒有兩個乞兒抬槓乞食。但我們可以試試兩個人一同去。」

「好！我希望和你在一起討飯。你幾時出發？」

「我在下週開始放暑假，但我將等你一星期，然後再決定日期及詳細計劃。」

兩個叫化子同出發

日期終於決定了，因為這是我發起的，所以一同從我所住的楚怡小學出發。這是一個晴朗的夏日，毛澤東一清早就到我這裏，他穿了一套破舊的校服，裏面是一件白底衫，外面是藍色短打。我身為教師，經常穿長衫，但這次必須改裝一下，也換了一套破舊的短打和破布鞋，毛澤東經常剃平裝頭，我也在前一天剃了和他一樣的頭髮。

毛澤東帶了一把舊雨傘和一隻包袱，裏面是一些替換衣服、一本筆記簿、毛筆和墨盒。我們帶的東西愈少，走起來就愈輕快。我也只帶一把傘，包袱內的東西也和毛澤東一樣，但我比他多了一些詩箋，因為我喜歡寫詩。

我的錢一向存在校內會計處，現在我把袋裏僅有的一些零錢也都放在抽屜裏，我們兩人除了雨傘和小布包之外，都不帶一文出發旅行。

當我們準備就緒後，我說：「請等一下，我要去向校長道別。」

校長的傭人來應門時，瞪大了眼睛望着我，對我的模樣不勝驚奇。他呆了一會，顯然不知說什麼好。

他終於說：「蕭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怎麼啦？你不是……：……：是不是和人打了架？」

他看到我這身破衣服，一定以為我被人打了，現在來報告校長。我對他說：「不，我只是來和校長說幾句話。」

校長嘆為兩個怪人

校長看到我時，也像他的傭人一樣大吃一驚。他脫口而出地說：「蕭先生！你好嗎？你怎麼啦？你爲甚麼穿成這個樣子？」

「我沒發生甚麼，」我安詳地說：「我只是準備出發旅行。」

「你穿着這樣的衣服是準備上那兒去？」他問。

「我要行遍湖南省，所以我決定步行，這套衣服是最適宜步行的。」我說。

「你一路上必須小心保重。」他對我的安全顯然很擔心。

「謝謝你，」我說：「我有一個同伴毛澤東和我一起。」

「噢！就是那個常常來這裏探望你的小伙子。我在第一師範任校長時，他也是我的學生。這是一個怪人，非常奇怪的人！你和他一起去嗎？真是兩個怪人！很好，但你必須更加小心！」

當我從校長室出來時，在大禮堂和我所教的一個成績最好的學生迎面相值。我們相距約十步，他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當我走近他時，我問他爲什麼放假已一星期而仍在校內。他突然低下頭，滿面通紅，一言不發，連望也不敢望我一眼。但我心中有數，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因爲對我的模樣看不順眼，我的模樣簡

直有失斯文，像是一個小工，但他不敢問我。當我準備再問他時，他已向我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快步走開了。

我回到房裏後，毛澤東和我商量出發路線，究竟應該向東走還是向西走。其實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行乞不論向東向西都是這麼一回事。但也有一些事須考慮，如果出校門後向右走，我們步行十分鐘後就走出城外來到一片原野上；如果向左走，步行十分鐘就來到遼闊的湘江之濱，阻住我們的去路。

毛澤東把不定主意說：「你先走，我總歸跟着你。」

「我要向左走，渡過湘江。」我說。

「很好！」他說，「就向左走吧，但你為什麼一定要渡江？」

「如果我們向右走，一片平坦，毫無障礙，這就沒有趣了。而向左走，我們就要想辦法渡江，這將是我們的第一道障礙。」

我在前走毛在後跟

毛澤東哈哈大笑地說：「對！我們必須避免就難。好，走吧，向左轉！」

我們把包袱掛在傘上，挑在右肩，以減輕負荷，這是我在以前的行乞中得來的經驗。我建議毛澤東決定路線，但他堅持要我走在前面，他跟我走。於是我們一前一後地出發了。此後一整個月內，我們這兩個叫化子就這麼一前一後地走着，只在極少地方有例外。

當我們走出校門到街上時，看門的驚奇地看着我，他的口慢慢地張開，但沒有說出話來。我對他說：「老盧，我去旅行，有我的信給我留起來，我在一個月回來。」

他依然張大口呆望着我，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因此我說：「老盧，我的話你懂不懂？」

他喃喃地說：「是，蕭先生，是，是……」門房裏的幾個校工也都驚奇地望着我們。我知道，他們奇怪爲什麼一向斯文而嚴肅的蕭先生穿得邋邋怪怪模樣出門！但是從這時起，我們不再受人們以驚詫的眼光張望，因爲在街上有許多人都穿着這種破舊的短打，我們已成爲他們中間的一分子。

克服我們行乞的障礙

從長沙小西門出來，步行僅幾分鐘，就來到了遼闊的湘江之畔。這裏的江面寬約五六百公尺，而且我們知道河水很深，因爲我們經常看到大汽船來往。我們無法再向前走，就坐在江邊的草地上動腦筋。

「我們怎樣渡過去？」我和毛澤東同時互相詢問。這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是泅泳過江，但是我們兩人都不會游泳，而且會把包袱弄濕，所以這念頭是不必再想了。第二、如果我們再向上游行走半哩路途，就可搭乘免費渡船，但我們兩人都不能這樣做，因爲這樣做是太輕易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逃避障礙，而是要去克服困難。第三、在我們面前有舢舨可以渡江，但每人要收兩個銅板。這價錢很便宜，許多人都在這裏渡江，但我們却一個銅板也沒有，我們是名符其實的叫化子。

我們呆坐在岸邊，望着這些小船載滿了搭客搖過去，又從對岸載滿搭客搖回來。大約每隔十分鐘有一班船。我們坐了許久，看着其中一艘舢舨已來回了三次，但這樣看下去並不能使我們渡過江，我們必須有所行動。毛澤東主張我們走下去和舟子商量，向他們說我們沒有錢，要求他附載我們到對岸。

我說：「我怕他不會同意。如果他拒絕，我們下一步怎麼辦？」

「哼，」毛澤東說：「我不怕，我去和他說。」他大搖大擺地走下去，來到一艘繫在岸邊木棹上的舢舨旁，很有禮貌地要求他免費載我們過去。

這年青的舟子大聲地答道：「你們既沒有錢，爲什麼不再走幾分鐘，到那邊去搭免費的渡船？」

毛澤東垂頭喪氣地走回來，問我應該怎麼辦？我說：「我早知道他不會載我們。我主張我們不必和舟子商量，走下去坐舢舨，就像一般的乘客一樣。當他來收錢時，船已到了中心，這時我們可以告訴他沒有錢。他決不會把我們送回頭，因為舢舨還有其他的乘客，大概也不會把我們推下江去，這樣我們就可以過江了。到了對岸，我想他大概也不會強迫我們再乘回來，因為他要留位給對岸過來的乘客。來吧，讓我們去試試看。」

硬着頭皮搭霸王船

我們跳上了一艘剛從對岸過來的擺槽船，船裏沒有座位，大家都站着，等船上站滿十四個搭客時，舟子就大叫一聲：「開啦！」用足全力把竹桿向岸上一撐，船就離了岸，不久我們就來到了江心。

一個大約五、六歲的小女孩，拿着碟子向每個搭客收錢，每個人投兩個銅板在碟裏，發出「叮、叮」的聲音。當她到我們面前時，「叮」聲突然停了。舟子望着我們說：「兩位大爺請給錢，每位兩個銅板，謝謝！」

「我們沒有錢，」毛澤東說：「請你把我們送回頭吧！」

「什麼？沒有錢？」舟子喝叫道：「那末你們上船來幹嗎？我不能載不付錢的客人。老鄉，快拿錢出來吧！」

「我們真是一個錢也沒有，」我插嘴說：「請你載我們過去，我們在一個月內回來，一定加倍還給你。」

「一個月後誰還認識你，」他說：「如果你們沒錢，就留下一把雨傘在這裏。」

「啊，這可不行，」毛澤東說：「我們一路上需要雨傘。再說，一把傘值十四個銅板，而我們兩人的

渡費可僅四個銅板！」

「你們不付錢，就不給你們過江！」舟子咆哮着。

「你說我們不能過江嗎？」我胸有成竹地說：「我們現在已經過了一半，你準備拿我們怎麼辦？」

「你們這兩個強盜！」舟子大叫道：「我現在就回頭，把你們送回去。」

這時，其他的搭客嘩然提出抗議，他們剛才還在看熱鬧，但現在都叫起來：「不行，不行，我們不能就誤，我們付了錢，快把我們送過江去！」

在搭客中有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走上一步對舟子說：「我捐兩個銅板作為他們的渡費，還缺兩個銅板，請船上的老鄉大家幫忙，我們大家都不願轉回頭。」

有好幾個搭客顯出一個銅板，但毛澤東與我叫道：「不，不，我們不要。你們千萬不要代我們付錢！」我接着說：「現在船已經到了江心，可以請舟子休息一下，讓我們來搖櫓，作為我們渡江的代價。」

自認晦氣後會有期

但舟子不同意，他說：「我不要休息，我仍收少了四個銅板。這幾位老爺要代你們付款，你們為什麼不讓付？你們是存心與我過不去，真是蠻不講理的強盜！」

但這時，搭客都不耐煩地叫起來：「不能停着呀，快搖櫓！」那位老人又向舟子保證，在到了對岸後，他將最後一個上岸，等我們離去之後，他再付錢給舟子。

但到了對岸，我們兩人不願這位老人付錢，我賴在船上不走，等其他乘客都上了岸後，舟子把船撐離岸邊約二十尺，深怕我們逃走。那位老先生仍在船上，懇切地要求我們讓他代為付錢，但毛澤東堅持等我們一個月後歸來時付錢給舟子。

我對老先生說：「大爺，如果你付這四個銅板，無異是擱我們一巴，我們決不願承受。」

舟子只聽到一半，他咆哮着說：「什麼擱一巴？如果你們不付錢，我要擱你們不止一巴！」

毛澤東跳起來說：「好吧！你要打架，我們不怕！」

這時已有不少人等在岸邊要渡江，而另一艘渡船已來到江心，舟子知道如果再不解決，他的生意要被另一艘船搶去了。他終於自認晦氣，把船搖到岸邊，但仍罵不絕口。

當船靠岸時，我們讓老人先上岸，我們也跟着跳上去，並微笑着向舟子說：「謝謝，後會有期！」我們踏上路，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到何處去，我們只知道這條路是從長沙通往寧鄉縣。

我在路上對毛澤東說：「這老人真是太好了。我們既是叫化子，本來是可以接受他的施捨的；但這樣就使事情變得太輕易了，我們必須從難處着手。」

「真可惜有這樣多人等乘船，」毛澤東憤憤地說：「如果沒有人搭船，我們可以和小子好好地打一架！」

有關留學運動的緣起

我在楚怡學校執教了兩年有餘，在這段時期中，毛澤東經常來看我，通常是每星期來幾次。我的所有學生都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因為我們對他都敬重，所以對他也事以師禮。

我無法在這裏記述我們當時所討論的一切問題，但值得一記的是有一天我們所作的一項重要商談。毛澤東再度對我的教師生涯提出疑問，他說：「你似乎對執教鞭生涯非常有熱誠，你是不是將在這裏長期耽下去？」

我對他說，我其實並不願長期執教。他對我的話似乎大感意外，並且問道：「你在楚怡的工作不是比

在許益學校執教時清閒得多嗎？」

「不是清閒不清閒的問題，」我說：「我在這裏也很忙，我在課後還有許多工作，我常常幫助學生自修至晚上十點鐘，而且在下課後還要批閱作文、書法和筆記本。我自己算過每天工作至少十二小時，但我對這樣的工作深感興趣，因此樂此不疲。可是我不準備再繼續做教師，因為我有另外的打算。」

「你有什麼計劃？」毛澤東問道：「我一直以為你會繼續教下去！」

「不，」我解釋道：「我在考慮出國深造。」

「噢？」毛澤東非常感興趣地問：「你準備到那一個國家去？」

「我現在還不知道，總不外是法國、美國、英國或日本。我不知道究竟去那裏最好。」

「你怎樣籌措到外國去讀書的費用？」毛澤東問。

「錢，這是不必太過費心的。這是新民學會的事。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出國去深造。」我說。

「是啊，這是很需要的，」毛澤東說：「但我們必須作出一些具體計劃，使這事能夠實現。」

「我們第一步應該做的是召集十來名會員，一同討論出國留學的方法與方式。」我說。

「很好，」毛澤東說：「你是新民學會秘書，由你發通知，讓我們一起開會來決定怎樣做法。」

國度與錢都是問題

毛澤東與我繼續討論怎樣使新民學會會員都能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首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最困難的問題，是我們怎樣籌集一筆必需的基金。

「如果我們呆等着，等到我們有足够的錢時才出國，」我說：「那麼我就永遠去不成。首先我們必須決定我們都要出國，然後我們再開始討論錢的問題。」

毛澤東堅持我們必須召集新民學會的全體會員一同討論此計劃。而我認為我們應該先與各會員個別商談，先激起他們對出國留學的熱誠，有意出國的人就邀集他參加此會議。毛澤東終於同意這個意見，於是我就首先找熊昆楚和陳昌商談。

這兩人都認為此計劃在原則上是很好的，但陳昌是獨生子，如果他遠離家園，就沒有人照顧一家老少。他很有意去留學，但他深以為憾的是無法遠離家鄉。熊昆楚和我勸他把田地賣掉，帶了妻兒一起走，但他說即使變賣祖產，也不够付一家老少出國的費用。他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出國的可能！

熊昆楚是我們學會中年齡最大的會員之一，但他好學不倦，渴望出國深造。他說可以把妻兒交給弟弟照料。

我接着與蔡和森作了一次長談，他對這計劃也非常感興趣。他說這是一個好主意，而且必須儘速付諸實現。他毫無保留地贊成此計劃，並且急不及待地問：「你主張我們到那一個國家去？」

我說：「我的第一目標是法國，其次是美國。如果這兩個地方都去不成，那麼到英國或日本也沒有什麼不好。」

他說他也希望最好能去法國，但他接着問：「我們到那裏去弄錢來？」

「我聽說過有一個組織，名稱叫法中教育協會，」我答道：「會長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我準備去和他談一次，對這協會的情況可以多一些瞭解。」

「好啊！」蔡和森說：「你我兩人可以協力推動這個計劃。法國現在正在戰時，有十多萬華工在那裏工作，他們大多把妻兒留在國內。我到那邊後，可以代他們寫信，或教在那邊的中國孩子讀書，我想這樣一定可以賺到我們的生活費。只要食與住的問題解決後，我們就有機會進修了。」

「除了教孩子讀書以外，」我說：「我們應該使華工團結起來，鼓勵他們學法文，并且研究法國的社

會及政治組織。當他們回到中國後，可以在下層社會中構成改革運動的核心。我們可以在這些工人中，找到許多同志，與我們新民學會共同進行改造中國。」

先提起張靜江先生

蔡和森完全同意我的見解，而且興緻極高，他認為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應該立即設法到法國去。我告訴他已向新民學會的許多會員發出通知，召集他們於星期日下午集會，詳細討論此事。我要求他一定要到會，並且在會上提出他的意見。

當此會議舉行時，我向出席的會員們說：「今天會議的目的，是討論使會員們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之方法與方式。我們希望本會的會員都能出國留學，我們希望知道的是：第一、各會員希望到那一個國家去留學；第二、我們需討論如何實現這計劃。從現在起，『留學運動』是我們的首要目標。我們必須使新民學會的每一個會員都能出國深造！」

我在這次會議上還說，我聽說過有一位張靜江先生，在巴黎有一家茶葉店，後來又經營一家大規模的古玩店。他在發了大財後，把全部財產捐助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我對大家說：「我非常欽佩這位先生，我將去看他，并要求他資助教育事業，使優秀而貧窮的學生獲得深造機會，以對中國進行更徹底的改革。」（蕭瑜註——張靜江先生，生於一八七七年，卒於一九五〇年，係中華民國的塑造者之一，對孫中山先生曾有重大貢獻，大陸易手前遷居紐約，并終老於易手紐約。我在新民學會的會議上說了這些話以後的十年，他成爲我最知己的朋友之一。我對他非常景仰。）

大家都贊成去法國

毛澤東接着說：「首先我們應該決定去那一個國家，然後決定怎樣去。我們進行的一切事，必須都有良好組織。我想最好是我們的會員能分散在幾個國家留學。留學的目的地主要是：美國、英國、法國及日本。」

蔡和森繼起發言說：「蕭先生和我已決定去法國。讓我們要求蕭先生向我們說明留法計劃之詳情。」關於這一點，熊昆楚也有同感，他說：「我認爲蕭先生的留法計劃很好。這計劃是非常實際的，有許多人去得成，我也決定要到法國去。」

「有許多會員還不清楚知道蕭先生的計劃。」毛澤東插嘴說：「我建議他加以說明。」我把「法中教育協會」之事告訴他們，又向他們敘述了戰時在法國工作的華工之情況。每一位會員都認爲這計劃是具體可行的，如果真的實現，他們也都喜歡去法國。只有一位叫周明帶的會員，主張去日本留學。而陳昌再度表示因無人照料妻兒，無法出國。但他說，他可以留在長沙，儘他之所能代我們這些出國的會員料理遺留下來的時事。

在進一步討論之後，我說：「楊懷中先生已到北京去，他已接受國立北京大學的聘請擔任教席。我準備寫信給他，把我們留學法國的願望告訴他，並要求他向蔡元培校長詢問法中教育協會的詳情。當我接到覆函後，我將立即再召集一次會議。」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新民學會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暑假前不久）召開這次會議，是後來影響遠大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之發軔。在這計劃實施後的第一年，有兩千多名學生在這計劃的資助下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其中約有二十人是今天北京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如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饒漱石、徐特立、蔡暢等。

在這次會議舉行後約一星期，我接到楊老師的覆函。這是一張逕寄給我的明信片，他一向喜歡用明信片寫信。這封信的內容簡短而扼要。信中僅這樣幾句話：「昨接來信，今日往見蔡校長。他說他係法中教育協會會長，此協會現正被請組織學生集體赴法勤工儉學。你們欲在勤工儉學之基礎上前往法國留學之計劃，係可以實現者。」

我接到此信當然萬分高興，立刻就去找毛澤東。他也非常高興，一再看這封信，笑了半天合不攏嘴。接着我渡江去看蔡和森。

我把這信給他看後，他說：「你看，你的計劃成功了！現在只要把勤工儉學組織建立起來。媽（他的母親和妹妹這時坐在我們旁邊），你和小妹也和我們一起去法國好嗎？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大困難了！這真是好消息！」

當我到他家時，他的情人向警予小姐也在，她聽了這消息後也滿面愉快的笑容，她俏皮地說：「蕭先生，我也決定要到法國去。」我告訴他們明天下午三時在第一師範召開新民學會全體會議，叫他們都不要遲到。

在這次會議中，每個人傳閱了楊老夫子的明信片，它就像是一張中了獎的彩票一樣，每個人接到後都愛不釋手。每個人這時所想到的都只有一件事，我們都在想：今天在座的這些人，不久後都將一起在巴黎會面。

我說：「當務之急是我們必須有幾個代表到北京去看楊老師，并與蔡元培先生面談。我下週必須返家一行，但當我回長沙後，我可以立即起程赴北京，誰願意和我一起去了？誰需要路費？」因為我知道我是所有會員中唯一有固定收入的人。同時我也知道蔡和森及毛澤東很想去，但是他們沒有錢購買赴北京的火車票。

毛澤東和我到北京

楊懷中先生去北京執教之前，曾在這多方面影響我們產生出國留學的雄心，他不僅會一再勸導我們將來應設法出國深造，而且他自己在留學後的成就深深地鼓舞了我們。他曾在長沙第一師範教了六年，留學歸來後立即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他把自己地位的提高歸功於留學的成就，這也是我們景仰他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如此，我們的計劃之得以實現，主要也是靠他的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對他衷心感激。

這年夏天，七月底或八月初我已記不清，新民學會派了十個代表去北京。毛澤東、熊昆楚、章梈弟及我四人第一批抵北京，楊先生款待我們住在他府上。不久後，我們四人在北大附近三眼井大街租了兩間房居住。

其中一間作書房，另一間四人合住。我們睡的是在下面可以生火的磚坑。在房裏有個小煤爐，每天自己燒飯。我們過着合羣生活。冬天，北京的氣候是非常冷的，這時我們已有七人住在一起，但只有一件大衣，所以在大冷天，我們只能輪流外出。到這一年年底，我們又合資買了兩件大衣，可以有三個人同時出去，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出錢買過東西。

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在前清末年獲得御賜「翰林」頭銜，并曾到德國研究哲學。後來他參加了締造民國的革命，並出任第一任教育總長，他第二次出國是去法國，進行教育研究，回國後出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他在當時被公認為教育界的領袖，他既有智慧又富學識。在我們拜訪他時，我們特別為他的謙和態度所感動。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偉大學者和教育家，他給我們的印象是永不泯滅的。

在我們拜訪他的翌日，我在午後二時帶了蔡校長的介紹信去看李燒瀛先生。李先生當時不在家，司閽的說他在五點鐘會回來，我在五點鐘再去見他時，他仍未回來，傭人請我稍坐等候，不久，李先生回來了

。他約四十來歲的年紀，留着小鬍子。我向他詢問了許多關於我們留學法國的計劃之問題。他告訴我：他們早已在鼓勵學生儲錢前往法國，因為去法國留學的費用當然要比日本大得多，所以在到法國後生活必須儘量簡樸。現在已有約一百人在「法中教育協會」的支持下去了法國，而且已有滿意的成績。

決組織法文補習班

他接着說：「最近，蔡校長、吳稚暉和我組織了一個勤工儉學團體赴法國留學。我們已有了組織勤工儉學團體的經驗，但到目前為止，參加這計劃的人數還不多，而且我們還必須把這計劃加以發展，以便大規模地實現此計劃。你們這些湖南學生的勇氣和決心非常可佩，我相信你們可以使這計劃獲得成功。我勸你們現在開始學法文，同時也學一點謀生的技能，譬如繪畫或洗刷都可以在法國謀取生活。戰爭大概就要結束，你們在停戰後立刻就可以去。你們必須先有良好的組織，我保證你們的計劃一定可以成功。」

我回到住所後，把李先生所說的話告訴同伴們，他們都爲他所表示的樂觀看法深感欣慰。他們問我對他的印象怎樣，我說他是個非常冷靜的人，他在說每一句之前，都經過慎重考慮。他和蔡元培有顯著的不同，蔡先生是個典型的中國紳士，而李先生給人的印象則是一個曾在外國長期逗留的中國人。蔡先生一眼就可看出是個書生，而李先生的樣子是個十足的革命家。他向我鼓吹自由思想和國際主義，我同意他的原則。

蔡和森、熊昆楚與我三人，決定組織法文補習班及手藝班，我們希望新民學會的全體會員都參加學習，以打好出國留學基礎。

有一天，我與蔡和森討論我們的計劃，我說：「世界大戰結束在即，法國將是一個戰勝國。在飽經戰火之後，百廢待舉，法國的重建工作將會需要許多工人。不僅我們學會的會員，其他的許多人都可以在

半工半讀的情況下到法國去。我們的運動可以大為擴展，我認爲可以鼓勵許許多多青年人到法國去留學。試想，有許多青年學子渴望出國留學，但他們沒有錢。現在用我們的方法，他們都可以去得成！我們要發動一千個，甚至一萬個人去。他們帶回來的知識，將使中國受到無比的好處！」

我應聘為協會秘書

我的熱誠打動了和森，他說：「是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從現在起，我們應儘一切力量推展我們的運動，使更多人能到法國去。」

但在我們開始這樣做之前，仍有兩個重要問題需待解決。第一是從中國乘船赴法國的費用必須大爲削減；第二是在我們抵達法國後，及找到工作之前的這一段短時期內的住食問題。我把這兩個問題與蔣校長及李先生數度長談，我們終於找到了滿意的結論。法國輪船公司同意給我們特價旅行，爲我們特闢四等艙，每人只需付國幣一百元，當時一般旅客所乘的最便宜的三等艙票價是三百元。在抵達法國後，法中教育協會將暫時供應我們的食宿，直到我們找到工作時止。這協會將幫助我們進入法國各省的預科學校補習法文。并幫我們每一個人找適宜的職業。第一期的學費由法中教育協會支付，以後由各人用自己賺得的工資支付。

我們一經獲得這項保證後，立即展開大規模的宣傳，以引起其他各省學生對這計劃的注意。但我們的大部份時間，仍用在加強我們的組織之工作上。開始時，只是四十名學生參加在北京開設的法文補習班，但不久後就因人數增加而開設了第二班及第三班，幾個月後就有了四百個學生。

這年十一月，世界大戰結束了，我們都認爲立即就可乘輪赴法國，我應聘爲法中教育協會秘書。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我和李先生一起取道上海赴巴黎，預爲安排。法中教育協會有兩位會長，一位法國人

，一位中國人，蔡元培先生是中國方面的會長，而李先生是秘書長。他們聘我為秘書，不僅要我協助安排勤工儉學工作，而且要推展戰時在法國做工的華工之教育工作，這些華工的人數不下十萬名。

這協會在中國的組織并不健全。留法學生都以各省為單位分批出發，因為每一批的人數多寡懸殊，有些只有五十人，有些多至一百二十人。這些學生大都未在中國受預科訓練，連法文字母也不認識，而且在抵達目的地後都是身上一文不名。因此，我們的工作是非常忙碌而且困難的，我們要照顧所有學生，許多事都做得不滿人意，但這是無可奈何的。

但一般說來，勤工儉學計劃是推行得很順利的，在第一年內，有二千多名學生到了法國。人數最多的是湖南省，有五百多人，其次是廣東及四川，各有約三百人，浙江及江蘇也各有二百多人。還有其他各省的學生，但人數較少。這些人都分散進入法國各地的學校，其中大多數人在工廠裏找到了工作。

這批青年學生中，有許多人在回到中國後擔任了要職，諸如部長、大使、省長、教授、廠長等等，也有許多人成為今天共產中國的政治領袖或軍事將領。在第一批到達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中，蔡和森、他的母親、他的妹妹蔡暢以及他的愛人向警予，都被分派到蒙太奇中學讀書，這所學校不久後發展為中國留法學生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心。

毛澤東寧願留北京

當我和蔡和森、熊耳楚及其他一些人組織勤工儉學計劃的補習班時，毛澤東也會協助我們，但他與和森及我作了幾次商談後，終於決定不去法國，他說他寧願留在北京。

毛澤東為自己的決定提出了四點理由：第一、是旅費問題，毛澤東身無分文，即使船票打了特別折扣，他也無法負擔，一百塊錢對他說來是一筆巨大無比的款項，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所認識的人中，沒有人能

借給他大約一筆錢。第二、他自知並沒有學習語言的天賦，在學校裏時，即使是最簡單的英文拼音他也無法讀得準。第三、他認為留在北京可繼續進修，而且可以為我們的新民學會招募新會員，同時我們這些到法國去的人，也需要在國內有個可靠的聯絡人。第四、毛澤東一直認為要成爲一個成功的政治人物，學術研究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主要是要有能力組織一個政黨，并集合許多忠實的追隨者。根本上，毛澤東是個崇尚實際行動的人，而不是一個學者型的人。一言以蔽之，他認為爲了讀書而出國是沒有意思的，在他看來，讀書只是一種結識朋友的手段，而他認為留在國內可以結識更多人。

蔡和森與我同意毛澤東可以留在北京，也像我們在法國一樣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充實自己。這就必須爲毛澤東找一份工作以支持他的生活。我們三人對這問題作了好幾次討論。當時我們都在國立北京大學內徵募新民學會的新會員，因此我們認為毛澤東最好就在這所大學內謀取一份職業。我們認為可以找一份清理課室的工作，因爲這可以使他附帶聽學。北大的制度中，每幾間課室僱有一人在課後抹黑板及掃地。這是輕便的工作，而且使他有機會結識經常出入這幾間課室的教授和學生們，我們都認為這是最適合他做的工作。

打掃館址整理圖書

緊接着的一個問題是：怎樣謀取這份工作？我們發覺負責僱用校役的是一位很高級的教授，他同時有許多多責任，我們不認識他，不知如何才能向他謀取這份微不足道的職位。我們終於想到了向我們的朋友蔡校長求助，他已經幫過我們許多忙，因此我們直接寫了一封信給他，要求他僱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爲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建議毛澤東不必做清潔工人，而可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

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爲他安排一職位……」李大釗給毛澤東安排了一個打掃圖書館及整理圖書館的工作。李大釗在北大是個很高級的教職員，他并未晤見毛澤東，只是寫了一張便條，叫手下的人給毛澤東安排了這份工作。

到一九二二年時，李大釗與陳獨秀成爲在北京的地下共黨組織領袖，而這時毛澤東亦已在湖南省擁有同樣地位，我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赴法國之前，曾與李大釗有過數度冗長的交談。當我再返中國後，我們在一九二四年間合作進行反對張作霖的革命。我們常在一起躲避張作霖軍隊的搜捕，而且常有秘密集會。我們常談起毛澤東，有一次他對我說：「當我叫毛澤東打掃圖書館時，只是執行校長的命令。當然我不知道你們是好朋友，我希望你能原諒我。」一九二六年時，李大釗在北京俄國公使館內被張大帥的軍隊逮捕，不久後被處決。

毛澤東一向很敬佩蔡校長，他給蔡先生的每一封信中都稱「夫子大人」。他自認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表示他對蔡先生的無限崇敬。

毛澤東在一九一九年返抵長沙，參加推翻當時統治湖南省的軍閥張敬堯之活動。張敬堯手握兵符，要推翻他唯有說服駐在湘粵交界地區之軍隊向長沙進軍，然後要求前任省長譚延闓復出當政。這場革命發源於教育界，而爲首的正是毛澤東在第一師範時的國文教師易培基。事實上各校教師皆參加此革命，張敬堯被稱爲「湖南之敵」，易培基在毛澤東等學生的簇擁下策劃起義，他們稱之爲「推翻惡勢力」。

要瞭解毛澤東離北京返長沙的背景，必須追述當時北大的兩位激進派領袖：一爲文學系主任陳獨秀；一爲圖書館長李大釗。這兩人都曾發表許多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論文，後來與俄國人秘密接上關係。俄國人建議他們在中國組織共產黨，并給他們一筆錢進行此項活動。他們因不能公開進行組織黨活動，因此在開始時是以「馬克思研究會」及「社會主義青年協會」的名義活動，設總部於北大。另一項重要活動是建立一

所「外國語研究院」，專讀俄文。這兩人皆未把毛澤東放在眼裏，因為當時毛澤東只是圖書館的校役，甚至在大職員名錄中也沒有他的份。正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把他當人，毛澤東認識到在北大就下去決不可能有出頭機會，而且他在北大的活動也毫無成績，因此他在北大工作了幾個月就決定返長沙，因為在長沙他至少仍是新民學會的領導人之一。他希望以新民學會為核心，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

以青年人領袖自居

在推翻張敬堯的革命中，毛澤東與大批滿頭腦理想的青年人建立了密切接觸，他輕易地取得了他們的同情。這些青年人大多是充滿理想、滿腔熱情及具有遠大抱負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推翻統治湖南省的暴虐軍閥及進行改革。他們既沒有遠大的政治目標，也沒有具體的組織和可信賴的領袖。毛澤東正盲目崇拜俄式共產主義，他視這些青年為一張白紙，他要在这張白紙上劃一條又深又粗的紅線。在毛澤東的眼裏，自己正是這些青年人的當然領袖，他們都是他手掌中棋子。

這就是一九一九年蔡和森與我剛抵法國時的湖南局勢。我們三人——毛、蔡及我——仍是新民學會的主要領導者，我與蔡和森在法國徵募了三、四十位新會員，而毛澤東則在長沙徵募了逾一百人。但他已放棄了我們當初所訂的遴選會員的原則，他只問思想不問其他。他出版了一本「新民學會通訊」，供會員們互相聯絡及發表政見，但一共只出版了三期。

在學會之外，他因參加推翻張敬堯的活動，出版一份「湘江評論」週刊。這刊物的言論非常激烈，但很迎合湖南青年的口味。許多青年甚至義務到街上去推銷此刊物。我從巴黎寫給毛澤東的信，常被登在這刊物上作為宣傳。就在這時，他在長沙開設了「文化書局」，推銷新思潮的刊物。這書店由他的第一個情人陶素瑛經營，關於陶素瑛的事，上文已提及過。

省內革命終告成功，張敬堯逃走後，譚延闓復任省長。易培基在新省政府內一身兼任五大要職：省府秘書長、軍軍秘書長、教育廳長、省立圖書館館長及第一師範校長。第一師範是長沙知識分子的中心地，易氏任命毛澤東爲「一師」附屬小學的校長。

這時，我們新民學會年齡最大的會員何叔衡，也就是被我們稱爲「何鬍子」的，出任了「平民教育日報」社長，通過這張報紙對下層社會可產生重大影响，因爲這是一張銷路廣大的報紙。何鬍子把這張報紙辦得很成功，他栽培了一些優秀的編輯人員，其中之一就是後來成爲中共政權內務部長及「最高人民法院長」的謝覺哉。後來老何把謝覺哉介紹入會，我們也成了好朋友。這兩人當時都已三十歲，是會內年齡最大的，其餘會員平均比他們小十歲。

到這時爲止，新民學會在長沙已有了兩大據點：一是「平民教育日報」；一是第一師範附小。我本人則在蔡和森、熊昆楚、向警予、李維漢等人的協助下，在法國建立了新民學會的據點。

毛澤東在譚延闓及易培基統治下的湖南，獲得大顯活躍的機會，這助長了他的政治野心。

此時中國尚未有共產黨的組織，我們的一切活動皆以新民學會爲中心，雖然我們的大部份會員都盲目崇拜俄式共產主義，視之爲可以在一夜之間改革中國的法寶。

但兩年後，即一九二二年，新民學會分裂爲二，其中之一在湖南成立爲共產黨，由毛澤東一手領導。

在法國的中共細胞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協定簽訂了（譯者註：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翌年一月初，凡爾賽和會召開之際，我隨李煜瀛先生赴巴黎，我們在巴黎定居下來，與「法中教育協會」工作，一面推展勤工儉學計劃，同時把戰時被招募到法國做工的華工組織起來。

首先，我們在巴黎近郊的卅倫布區購置了一幢房子，建立起一個「華人總會」，成爲在法國的中國學生及中國工人的聯絡及活動中心，我們兩人以及協助我們工作的許多同事，大部份時間是用在幫助剛自中國來到法國的許許多多勤工儉學的學生。我除了擔任這方面的工作之外，還擔任一本雜誌的總編輯，這本雜誌的對象是戰時來法做工的華人，雜誌的名字是「中國勞工月刊」。當蔡元培先生在法國時，曾爲這本刊物寫過許多專論，這是在法國的十多萬華僑所能看到的唯一的一本中文刊物。這本刊物在排印各方面都很合乎理想，因爲當時在法國杜爾地方有一家中文印刷所。

我抵達巴黎後數天，就把我們正在展開的活動寫信告訴毛澤東，使他能夠向國內的新民學會會員們報告。在我給毛澤東的第一封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勤工儉學組織及華工組織都很有效，我們可以至少再接納一千名學生來法國。在這一千人中，我們可以再爲新民學會徵募一兩百位新會員。至於戰地華工，現在已有十多萬人，我認爲在他們之中徵募一萬名的會員將不是一件難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能爲我們的學會建立一個真正具體的基礎，作爲對我們的國家進行改革之中流砥柱。到目前爲止，我集中全力在戰地工人中做我的工作，因爲我要等蔡和森來到後再在學生中徵募新會員，當他來到後，我們就可以更活潑地推展我們學會的工作。」

毛澤東給我的復信，顯出他的滿腔興奮之情，他寫道：「我們正在奠定改革中國的基石！我當然仍將繼續盡我之所能，在長沙發展我們的運動，但現在看來，你在法國可以有更大的作爲……」

到這時爲止，毛澤東與我都仍嚴格遵守着新民學會初創時訂立的原則，在徵募新會員時，都以他們的品德及學識是問，我們的主要目的，仍是使新民學會成爲一個文化活動的中心及知識份子的組織。

許多青年學子根據勤工儉學計劃，從中國來到法國半工半讀。但因為我們以前並不認識他們，無法貿然邀請他們加入新民學會。而且時常因為邀請某些人加入而得罪了另一些人，這種情形是勢所難免的。

另一項不可避免的困難，是因法中教育協會經費不足而造成的，使不斷增加的勤工儉學學生，在初到時無法獲得滿意的招待。有許多人對法文一字不識，要我們憑這點有限的人力物力來照顧他們，並且為他們找尋適當的職業，可真不是一件易事。他們受到許多不滿的批評，而我們還要東籌西措來幫助這些經濟困難的學生。

當時在法國的數萬華工及學生中，只有極少數人真正瞭解共產主義。但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這為共黨的宣傳活動，建立了有利的環境。

他們看到在俄國革命中，下層階級在表面上獲得的成就，他們之中也許有少許人有時間或能力去深入研究俄國革命的理論，但大多數人只知馬克思主義之名而不知馬克思主義之實。他們的學識不足以分析及批判新俄國的風貌，他們只知道馬克思主義給俄國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而這種改變究竟是好是壞，則無法作透澈的認識。他們視馬克思主義為一種新的救主教義，對馬克思及其行徑產生盲目的崇拜，一如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虔誠。

在這些中國學生中，已經有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這樣的信仰，但這完全是出於一種盲目的宗教或信仰，因為到這時為止，在他們中間還沒有組織共產主義的宣傳活動。

一九一九年春季，蔡和森來到了法國，情況就立即起了改變。這位熱誠的宣傳家，不遺餘力地向法華人闡揚共產主義是一件好事。他當時並沒有把他們組織起來，他自己也並沒有認真地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或任何其他革命理論，但是和森早已自動地提出一句口號：「打倒資本主義！」他有一天對我說：「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潤之（毛澤東），我指出俄國必須派一位秘密代表到中國來，協助中國組織共黨。我說我們

在革命工作上必須追隨俄國的道路，不容再作拖延，不必要先研究一切細節！」

不能做俄國的兒子

我還清楚記得我們當時爲這件事發生的爭論。我堅持說：「在我們採取任何決定之前，我們必須先對這件事作縝密的研究！我在原則上同意資本主義應該打倒，但是，我並不想盲目地追隨俄國共產主義的原則！」

「我們所追求的是共產主義，不論它是什麼國家的共產主義，遑與俄國沒有關係，」和森說：「我們研究的時間愈長，行動的時間就愈遲。俄國的計劃可以供我們借鏡，一切都是現存的，何必還要拖延？爲甚麼我們還要去找其他形式的共產主義？他們已有了整套的計劃，用白紙黑字印出來供我們閱讀，而且他們正在實踐這套計劃，我們何必再浪費時間去作進一步的研究？」

「但是爲甚麼要使中國成爲俄國的兒子？」我問。

他顯得不耐煩，而且顯得非常激動，他似乎對採取行動已有急不及待之感。他咆哮地答覆說：「因爲俄國是共產主義之父！我們必須追隨俄國的領導。第一是因爲這樣可以使我們省事得多；第二是因爲在中國革命來到時，我們可以或暗或明地依靠俄國的支持，不論是供應經費或武器，從地理上看，俄國與中國是唇齒相依的，兩國之間的聯繫非常容易。一言以蔽之，如果我們要使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獲得成功，我們必須無條件地追隨俄國。我對你所說的都是真確，這些都是我的由衷之言！」

「我瞭解你的想法，」我說：「可是老蔡，我們必須首先考慮自己國家民族的利益。這問題不像你所說的這樣的簡單，這不是你我之間的私事！我們怎能讓中國成爲別國的兒子？我們身爲中國公民，怎能採取這樣的計劃？」

並非說服只是討論

蔡和森堅持地說：「爲實現革命，我們必須選擇最可靠的捷徑。我已經把我的想法寫信告訴潤之，我確信他必定同意我的意見。你的頭腦裏，理想太多，感情作用太多，學究氣息也太多！」

「即便潤之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我也仍是不同意！」我解釋說：「我無法全心全意地協助推行我并不同意同意的計劃，而且我的良心也不容許我這麼做。我不願意做違背良心的事，我決不會參加一個要使中國成爲俄國走卒的政黨！」

「是的，我知道，」蔡和森突然冷靜地說：「我和潤之都深知你的人格，而且我們都非常敬重你，因此我要和你詳細研究這件事。」

「但是，」我指出：「你並不是在研究！你已經決定了行動的路線，現在只是在企圖使我跟着你走，你是在要求我無條件地接受你的原則。你完全像一個傳道士，企圖說服一個老朋友信仰你的宗教！」

「不，不，我決不致這樣做，」和森鄭重地說：「我一向非常尊重你的爲人和你的意見，這與我們之間的交誼無關，我們現在只是在做友好的討論。」

這次的交談，是在蔡和森抵達巴黎後兩天發生的。和他同船前來約五、六十名勤工儉學的學生，法中教育學會決定把他們全部送入「蒙太奇學院」，使他們一面學習法文，一面等待我們爲他們找尋適宜的工作。蒙太奇是一個距離巴黎四小時火車途程的小城市。和森去後，我們之間保持經常不斷的通信，有時候，他們一天之內寄來兩封信，但無論如何，我們各自的意見並不改變。

向警子與兩個和森

蔡和森不斷地向蒙太奇學院內的中國學生宣揚共產主義，同時還寫了許多具有說服性的信件，分寄給

在法國各地的中國學生。他具有演說的天才，但他在紙上能够充份地表達他的意見，甚至連毛澤東也瞠乎其後。

許多素昧平生的中國學生，爲他信中的誠摯措詞及有條有理的分析而打動。他的母親當時已將近五十歲，和他的妹妹蔡暢皆一同來到法國，他們倆也都接受了他的思想，並且對他產生無限崇拜。但是第一個成爲他的信徒的，則是他的情人向警予，她是我們新民學會最優秀會員之一。向女士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是一個傑出的演說家。她待人誠摯，容貌美麗，態度溫文。她成爲中國第一個女共產黨員，同時也成爲蔡和森最得力的宣傳助手。她影響了許多男女學生，使許多人走上了她的思想道路，特別是女學生，更易爲她的熱情及誠懇而打動。她會寫過許多長信給我，討論和森與我們的歧見。

另一個在這時來到法國的老朋友是李維漢。他的別號也叫和森，我們常叫他李和森，有時也叫他老李。他也是新民學會最早的會員之一，而且我們都有很好的私誼。我在長沙和他結識，我和他是第一師範的同班同學，我非常喜歡和他做朋友。他的父親年事已高而且非常貧困，他非常孝順，但是無法使父親獲得安適的生活，我們都爲他們父子深感哀傷。李維漢是個中庸、溫和而沉靜的人，說話總是非常緩慢，他在和人交談時，總是悉心傾聽別人的意見。他不識法文，所以在蒙太奇學院中把大部份時間用在與和森交談，這兩個和森經常能獲得一致意見。從他們兩人的性格來看，毫無疑問是李和森接受了蔡和森的意見與主張。

由三騎士到陳獨秀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派遣了李維漢與周恩來到重慶與政府談和，戰後也成爲軍調處的共黨主要代表之一。後來我在報紙上看到他担任北京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秘書長，現在諒已在中共政府內出任重要職位

。（譯者按：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政權成立前夕召開的「人民政協」中，李維漢爲秘書長。政權成立後，李維漢出任第一任國務院秘書長，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惟近傳李氏已遭整肅。）每當我看到或聽到有關他現在的地位和消息時，總免不了回溯在蒙太奇的交談，他當時的落魄相歷歷如在眼前。李維漢，蔡和森及向警予，是當時在法國傳播共產主義思想最熱中的「三騎士」。

但直到一九一九年爲止，在法國的十多萬中國工人及學生中，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他們的潛在力量顯然已受到法國共產黨的注意，但法共對他們所進行的宣傳活動是微不足道的。直到一九二〇年初，在法國的華人社會中才開始出現一個親共組織，并在一九二〇及二一兩年內吸收了許多人，這個組織直接受命於北京的地下黨組織，也間接受命於莫斯科。

先是俄國派了一個秘密代表到北京，與北大文學系主任陳獨秀及圖書館主任李大劍聯絡，說服這兩人在中國組織一個共產黨。中國政府是不容許有任何公開的共黨組織存在的，因此決定建立一個標榜「社會主義」的青年協會以資掩飾，這個青年協會的正式名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但對外只宣稱是叫「青年協會」。

爲了同樣的安全原因，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也不使用「共產黨」之名，只有在共青團內最可靠的人員才被邀參加這個極端秘密的黨組織。同時，在共青團之外，建立了許多「馬克思研究會」，并且正式開辦了一家「外國語學校」，其主要目的是教授俄文，而不引起當局的懷疑。有一度時期，在北京大學內甚至公開懸掛馬克思研究會招牌。

二 陳無能曹任繼起

陳獨秀的組織活動，不僅祭出自莫斯科的建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接受俄國的現款津貼，每月供

給他一批大洋，作爲建立這些研究會及組織共產黨核心的經費，有許多「馬克思研究會」是由陳獨秀直接控制的。

陳獨秀有兩個兒子，陳延寧及陳孝寧，他們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到一九二〇年底，這兩個孩子奉他們的父親陳獨秀及祖父莫斯科之命，來到法國，組織在法國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在巴黎的中國人，都稱他們爲「二陳」。事實證明他們的能力不足以負荷此項重大使命，因此被召回國，而另派了兩人負起此項使命。

這兩人是曹恩元（譯音）及任卓宣（譯者按：即葉青），他們都是來自四川的勤工儉學學生，當時已在法國。這兩人都非常能幹而且負責的青年，身爲在法國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書記及第二書記，對於促進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在他們的一份秘密名單中，有幾百個中國學生的名字，都是直接聽命於他們的指揮。

槍決之後又被救活

任卓宣後來回到了中國，出任長沙共青團的領袖，終於被政府逮捕并被槍決。他的「屍體」被遺留在刑場上，第二天早晨有人經過，聽到他尚有呼吸聲，就把他送進醫院，他竟被救活了。他從這場不尋常的經歷中完全康復後，他宣稱自己爲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已完成，但右再生後，不希望再做一個共產黨員！後來他被選爲國民黨中央委員，現在仍在台灣，並且成爲最傑出的三民主義理論家之一，我已約四十年沒有看到他。

在我當時所熟識的一些留法共產黨人中，蔡和森及向警予已死，徐特立已年逾八十，他會是我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後來也做過毛澤東的老師。他背着「老學生」的銜頭參加勤工儉學，與蔡和森一同來到法

國。當我還在第一師範讀書時，特立師就推薦我到許益中學任教，他雖不是一個樣樣好的理論家，但因會做過毛澤東的老師，今天的中共黨內領袖們都對他事以師禮。其他，我所熟悉的蔡暢、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李富春、陳毅、饒漱石等，今天也都成爲北京的權貴，他們都是最早列入任卓宜的祕密名單中的人。

這些人，就是在法國第一批繁殖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細胞。

在樹林中舉行會議

一九二〇年十月，法中教育協會的活動已大爲擴大，以致需要派一位代表回中國報告。協會當局決定由我回國一行，向蔡元培校長和李余英先生報告我們在法國的工作情況。當我知道會方的這項決定後，我就分別寫信通知在蒙太奇的蔡和森及在國內的毛澤東。蔡和森給我的覆信中說，在我啓程之前，我們應召集旅法新民學會會員舉行一次全體會議。他建議這次會議一方面是為了給我送行，以壯行色；一方面是為了大家集合在一起討論應採取何種方式來進行中國的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討論俄式共產主義究竟是否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由於當時受莫斯科控制佈CY（譯者按：「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初期使用的名稱）在旅法華僑中尙未有重大勢力，因此我們可以有充份的自由來討論俄式共產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的問題。

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大多住在蒙太奇市，因此我們決定這次會議應該在這小城市內舉行。會議舉行的前一天，我在下午四時乘火車離開巴黎。當火車剛駛進蒙太奇車站時，我就看到蔡和森、蔡姑娘、向警予以及許多許多新民學會的骨幹份子佇候在月台上迎接我，他們共有約二十個人。我與他們一一握手後，蔡和森與向警予把我帶到車站旁的一家咖啡館中。我建議先找一家旅館讓我安頓下來，然後可以較安靜

地談論。但向警予說：「和森與我已給你定了一間房，就在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家旅館中。」

且看上帝是否下雨

我們在赴旅館途中，我問：「我們學會明天的會議在那裏舉行？」

「我們還沒有決定，」和森說：「你知道，我們在法國的會員有三十多人，但其中有少數人住得太遠，不可能前來參加會議，可是在這裏也有二十來人。我們不能借用學校的課室開會，因為所有課室都是全日上課的，而且在我們學校中有五、六十個中國學生，他們並不都是我們的會員，我們的會議會引起他們的猜疑。」

向警予建議道：「我們是不是可以在蕭先生的旅館中開會？」

蔡和森立刻回答：「如果一大批黃臉孔的東方人突然在一家旅館裏集合了幾天，法國人一定會感到很奇怪。而且旅館的老闆可能也不會允許，如果他同意的話，他將會因為我們的逗留而開一張賬單來，你知道我們是沒有錢來付這種賬單的！」

「在市立公園裏開會怎樣？」我問。

但向警予指出：「這裏的市立公園不大，而且所有座位上都經常坐滿着人。而且有許多非會員的中國同學常在課餘到公園中去瀏覽。」

突然，蔡和森若有所悟地說：「你提起公園，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這城市的郊外有個大樹林。我們為什麼不到這樹林裏去坐在草地上開會？你們贊成嗎？」

「這真是一個好主意！」向警予說：「但是如果下雨，則新民學會在法國的盛大集會就舉行無期了！」

如果下雨，這就表示上帝不希望我們來改造中國！我確信明天一定是晴朗的好天氣！」我說。

向警予微笑着說：「很好，蕭先生，如果明天下雨，就意味上帝不同意我們的計劃。如果明天出太陽，就表示上帝的確要我們改造中國！」

蔡和森介紹新會員

第二天早晨，當我醒來時，陽光已直照在我的牀上，我匆匆起身趕緊穿好衣服。不久，蔡和森和他的情人向警予以及十來位會員就來到我的房中，向警予滿面春風地對我說：「來吧，蕭先生，讓我們立刻改造中國！我們這裏已經有幾天沒有出太陽，今天突然陽光普照，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我們一同離開旅館，十分鐘後，我們已身在樹林中。

現在每當我回想起這一天的景況，我還彷彿依稀嗅到樹木在晨光中發出的芬芳。我們在一條小溪旁揀了一塊平坦的草坪坐下，又柔軟又舒適，就好像是坐在沙發上。但剛照到陽光不久，夜裏的露水還未乾，所以我們決定在樹林中散步一會才開會。過了一會，所有的會員都到齊了，地也乾了，我們就團團地坐成一圈圈子，我宣佈會議開始。向警予站起來說：「首先，我們要向蕭先生道別，並祝他一路順風，然後我們要求他向我們致辭，我們對他這次返國之行，寄以莫大希望。」

接着蔡和森說：「我已經看到蕭先生所列的這次會議的議程。第一項是討論什麼是中國革命的最適當的計劃。第二是介紹新會員。第三是他報告他此次返國的任務及計劃。我現在要建議把第三項議程改為第一，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聽他向我們訓詞，並且要知道他的計劃。同時，原來的第一點議程，需要有一較長時間的縝密考慮，所以應該押在最後。」

因為每一個人都同意蔡和森的建議，因此我首先談述了此次回國準備進行的一些計劃。接着，蔡和森

起立介紹新會員。他首先介紹的兩人是李富春與李立三。

李富春身材矮小，非常年青。我們都早已認識他，而且都對他有不錯的印象。他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有清晰的聲調和豐富的辭彙。後來他成爲「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並在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內擔任副總理（譯者按：李富春現爲蔡和森之妹蔡暢的丈夫）。

李立三是個與李富春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他身材高大，聲如洪鐘。他有講笑話的習慣，但他所說的笑話常常是並不可笑的。在這次會議，他一度開玩笑似地提高聲門高喊：「立三路線！」表示他有滿腹經綸，我們都應該跟隨他的領導，我們都覺得這是非常幼稚而且低級趣味的。

此外，還介紹了另一些新會員，男的由蔡和森介紹，女的由向警予介紹。在新人會的會員中，有年甫及笄的蔡和森之妹蔡暢，她現在是共產中國全國婦女聯合會的主席。在這次會議中被介紹加入新民學會的還有劉寧一及周恩來，他們都是通過蔡和森的關係加入的。

制度問題各持己見

在午飯後，我們再度在這塊草坪上集合。現在，我們開始討論採取俄式共產主義作爲新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蔡和森警告我們必須毫無保留地接受俄式共產主義，我則宣稱我雖然充份同意共產主義的原則，但我並不贊成把俄國式的共產主義實施於中國。參加會議的人意見分爲兩派，有些同意蔡和森，有些同意我。我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大家始終保持冷靜與沉着。在下午五時三十分，我們決定休會，使那些住在學校裏的人可以趕得上晚膳時間。我們決定在翌晨八時半再繼續開會討論。

我在旅館房間裏吃晚飯時，他們一羣人又來和我聊天。他們大多在晚上十時前離去，但蔡和森、向警予及陳紹禹則留下來與我繼續討論俄式共產主義以及這種主義究竟是好是壞！我們一直討論至深夜兩點鐘

，仍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因為時間太夜，他們已無法回校，而我們又不想大打擾旅館老闆把他們起身另開房間，所以我們終於決定一同睡在我的大床上。我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向馨予是個女子，而且我確信她自己也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直到許多年後，我每想起這件事，就深深地感到我們當時一心爲了改革中國而不顧一切的純潔思想。這天所發生的事，足以表現這種純潔的理想。

第二天的全體會議，也完全是用在討論俄式共產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的問題上，但對這根本性的問題仍未能獲得一致意見。最後，我們決定把這問題交回中國去討論，在我返國後與國內的會員再作討論。同時決定由我整理這兩天會議的討論紀錄，寫信告訴毛澤東，讓他分發給國內的會員研究。後來我的這封信，被毛澤東載在「新民學會通訊」第三期上。

在長沙的一席長談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從巴黎回到了北京，毛澤東早已離開北京返長沙。我們雖然經常不斷地通信，但直到一九二一年二月，我才能騰出時間到長沙去看他。他這時擔任着長沙市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長，但他的大部份時間，用在指揮地下的CY組織。

從三月至七月，我們一有空就在一起，討論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但我們談得愈多，我們之間的距離似乎愈遠，但是我們仍用坦誠相見的精神，保持着無間的友誼，而且我們都真誠地希望瞭解彼此的觀點。

在這段時期中，我注意到毛澤東對新民學會的興趣已降低了。新民學會原本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大多數會員從未學過社會主義或其他任何政治理論，但是他們之中却有許多人在毛澤東的慫恿下參加了CY的秘密會議，並且盲目地信從了在會中聽到的一切。CY的誕生，無形中已使新民學會死亡。當我抵達長沙時，我就有一種感覺，似乎自己已是來參加新民學會的喪禮的。

但是會員們仍熱烈歡迎我的歸來，而且我很快地就發覺當我與會員們個別交談時，毛澤東似乎很不高興，他擔心他們之中有些人也許會受我的思想影響，因而失去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盲目信仰，而這種信仰正是CY灌輸給他們的。他發表他會在背後要求一些年齡較長的會員們勸我早日返巴黎工作，後來他甚至親自向我提出這樣的建議。他知道我必須再回巴黎，而他渴望我愈早離開愈好。但是他最大的希望，仍是要我接受對俄式共產主義的信仰，並且和他合作，在全中國傳播這種「教義」，再進一步付諸實現。

毛澤東只走一條路

在長沙有一座巨大的建築物「船山書院」，這是紀念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王船山的。在這研究院內的五十多名年事甚高的學者，竟都信奉了共產主義。由於毛澤東也是他們的會員，所以我被邀住在這座大屋子裏。這批老學者也許是認為萬一共產主義在中國得勢，憑着他們的年齡及經驗，可以出任領導人。

由於我返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籌商在法國里昂及比利時查萊萊建立法中學教育協會的分會，所以當我一到上海，當地一家著名報紙「時事新報」的記者就來訪問我，並把我的談話登在第一版上，這篇文章當然也被長沙的老朋友們看到，我一到長沙，他們就紛紛來和我討論這項計劃。而毛澤東立刻也利用這機會，爲他自己的目的，把他們集合起來，提出一項建議，要把「船山書院」改建爲一所「自修性質」的大學，所有的人都贊成，並且公推我爲主要組織者。

我一向就有創辦一所自修大學的理想，因爲這種大學可以強調自由研究，並且蓄集全園精英。這樣的大學，不需要固定的上課時間，也不需要教師，只需要豐富的藏書及一座完善的圖書館，另外需要幾名行政人員，安排學員的集合討論。我提出了自己的計劃，受到熱烈擁護。

我在北京和上海與一些知識界及教育界的人士談論過這項計劃，獲得很多好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及國學大師章太炎，皆用他們的生花妙筆寫了長篇大論的文章，表示對這計劃的贊同。我還接到革命元勳吳稚暉先生的一封信，分析自修制度之利弊。這些文章的原稿，我都貼在一本書中，但這本書留在中國，不知道現在落入誰人手中。可是不久後，我因公返巴黎，長沙自修大學的計劃，始終只是一場夢想。

當我在長沙與毛澤東進行初步討論後，我曾考慮使新民學會恢復活力，但毛澤東與我對此事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當我與何叔衡談到這問題時，他對我說：「老蕭，如果你不再回法國而長期留在長沙，新民學會的老會員們都會回到你週圍來，但如果你不留在這裏，他們將無可避免地必須追隨潤之，我本人就是這樣。」我的老朋友陳昌也說了幾乎相同的話：他說：「我們所有的老朋友，都已成爲CY的秘書人員，很難再把他們拉回來。你知道，新民學會改造中國的目標只是一種空想，沒有政治理論，也沒有行動計劃。他們現在認爲要收具體效果的唯一辦法，是追隨俄國人的領導，並全力推廣俄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現在已沒有人在尋求其他的改革方法。爲什麼？第一、因爲他們有俄國的前例可援。第二、因爲追隨俄國，他們希望可以獲得俄國的經濟援助或其他方式的援助。第三、每一個人對秘密活動都有無比熱忱。每一次舉行秘密會議時的那種神秘而熱烈的氣氛，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在這種氣氛下，向他們提出的任何意見，都是不會被頂回頭的。我知道你具有你自己的充滿「無政府主義」色彩的自由思想，我們當然不能使每一個人都同意共產主義。我早就認爲你和毛潤之終將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但你們兩人始終將是我最好的朋友。老實說，我認爲各走各路是再好不過的事，因爲真理不祇一個，而每一個真理都是寶貴的。」

當我把陳昌所說的話告訴毛澤東時，毛澤東說：「這非常有理！許多人都不滿現狀，如果我們要改革中國，必須進行一場革命！如果我們要使這場革命成功，最好就是向俄國學習！俄國共產主義是最適宜於我們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學習的。在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我真誠地希望你和我們攜手並進。」

一連串問題的爭論

毛澤東與我的確有許多問題可談。我在長沙的這段時期中，我們常常廢寢忘食地長談徹夜。有時候，我們的交談使彼此都很難過，甚至落下眼淚，因為我們這兩個最知己的朋友，竟無法尋求到一個互相合作的基礎。我無法接受毛澤東的理論，而我的意見也無法使他滿意。在這幾個月中，我們的時間都花在這些毫無結果的商談中，但我們不論意見如何相背，從未有過怒目相向或口出惡言，我們只是對無法找到共同的行動計劃而深感失望及哀傷，但我們仍非常珍惜彼此之間的友誼。可是我始終堅持認為毛澤東所期望的革命，將會給中國人民帶來非常的痛苦。

每一次抑鬱地分手後，我們都彼此鼓勵恢復商談，但結果只能帶來更大的抑鬱及失望，如此循環不息，由笑到哭，由哭到笑，成爲永無止境的循環。這種企圖說服對方的耐心與毅力，是由於我們之間有深切的友誼，並且使這種友誼愈來愈深。毛澤東清楚地認識我之據理力爭，毫無自私的動機，不論我的理由是對是錯，我的動機是出於中國人民的赤忱之愛，也是完全出於人道觀點。

我們之間的討論情況，可以扼要地舉一個例來加以說明。

有一次，我微笑着說：「這是兩個輪子抑或一個輪子的問題。革命的進行，可以與一輛黃包車相比，必須有兩個輪子並進。有兩隻良好的輪子，就可順利地前進。如果失落了一隻輪子，就會倒下並且寸步難移。這時，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人力抬着一邊，跟着黃包車跑，但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做法決跑不遠。在革命進行中的兩隻輪子就是自由與共產主義。」我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並且完全同意共產主義的原則。但如果人民要受俄式共產主義的統治，這輛黃包車就會失去自由之輪，這時就必須有超人的力量來保持黃包車的平衡。共產黨的領袖們也許有這種力量，但總有力盡的一天，一旦這種力量用完時，這場革命就會垮台。」

因此我認爲沒有自由的俄式共產主義，根本是錯的。

毛澤東當年的看法

毛澤東完全明瞭我的意思，但他毫不猶豫地答道，他完全不反對使用壓力。他說：「這種壓力——也就是你所謂的抬住一個輪子的人力——是政治鬥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你們成功地保持這種力量，這就意味你的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勢力根本就是不斷地保持這種力量。」

「如果你這說法是對的，」我說：「則我從此以後不願再談政治了。」

另一次，我建議我們把自由與共產主義當作兩條路。我說：「現在我們正處在這兩條路的岔路口。經過以往幾百年的鬥爭與流血，我國人民終於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如此辛勤得來的寶貴東西，必須加以悉心守衛。這兩條路雖然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樣，爲了使每一個人生活幸福。爲什麼我們要從已經走了一半的路途中回轉頭來走第二條路？人類有兩項基本的意願：生存與自由。而且只有自由能使文明伸展。」

這次，毛澤東又是簡單地答道：「實行共產主義，並不就是說人民不能有自由啊！」

我說：「自由有好多種。人類所嚮往的自由與豬母所享的自由迥然不同。豬母也有自由，但只限於豬欄之內，直到被宰割時止。共產主義國家的確也給人民自由，但只是豬母的自由。俄式共產主義正像一種狂熱的宗教，每一個人必須盲目地信奉教義，而且永遠不得談論是對是錯。在這種宗教狂熱下，人民即使有行動自由，也不會有思想自由。共產主義者說他們也尊重自由，但他們不允許人民自由地生活。他們沒有集會自由，沒有結社自由，沒有出版及演說自由。這難道是「人類的自由」嗎？」

毛澤東對這問題的看法是，羣衆必須受法律的控制，每一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在必要情況下，他必須自我犧牲以成全國家利益。

當我們談到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問題時，我說：「國家的權力太大了，國家成爲神的化身，而每一個人只是蒼蠅或螞蟻。如果國家命令某些人去殺死國內的另一些人，他們必須照辦。如果國家要人民吃少點，人民就必須吃得少一點。如果國家要人民死，就死。與國家相比，個人就根本不成爲東西。在民主國家中，國家的權力受到人爲的約束，而個人的重要性就相對地提高。但今天，俄式共產主義在社會主義幌子下，已把權力恢復集中在國家手中，對個人的日常生活作絕對的控制。」

一些人必須受犧牲

毛澤東在答覆這問題時說，共產主義的國家必須實行一種「新民主」。

我詢問到底新民主是否就是新極權？以俄國的共產主義來說，與其說是「新民主」，不如說是「新極權」更爲恰當。

我說：「在我國，自古以來歷代帝王都進行極權統治。但俄國共產黨現在正實行一種新的科學方式的極權主義。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許多帝王是良好的統治者，他們以「民如子」爲原則，他們把遺傳大的國家治理得有條不紊，遠較許多小國的皇帝高明。但是今天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較中國歷代最暴虐的皇帝還不如。」

毛澤東說：「如果領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就不可能推行他們的計劃，領袖的權力愈大，就愈容易使計劃實現。爲了改革國家，有一些人必須被犧牲。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問題，而是身爲領袖者是否有魄力的問題。」

接着我們討論第六個問題：是否應該爲了國家的利益而犧牲人民。我坦白地對毛澤東說，我不同意犧牲某一部份人以幫助另一部份人的原則，更不同意犧牲每一個人以使未來的世代獲得一種虛無飄渺的遠景

毛澤東却說，如果我們斤斤計較於這些「小事情」，則社會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會實現！於是我們討論到第七個問題：一千年是否太遲了？

我說：「如果我們能在一千年內進入理想的社會，就應該心滿意足了，甚至需要一萬年，也得該滿足。因為對於一個人來說，幾百年或一千年是太遙遠了；但是對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來說，一千年並不算太遠，若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看，一千年只是極短的時間。從理論上說，共產主義是個好主意，而且應該加以實現，但這必須用時間來培植條件。俄式共產主義的革命手段，是用人力來強迫條件成長，正如強迫巧婦做無米之炊！」

毛澤東說：「我佩服你有等待幾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但是我連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在明天就達到目標！」

我們一直在這些問題中打圈子，直到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止。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一夜，我們兩人睡在一張床上，一直談到天明。而毛澤東仍苦苦要求我參加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一九二二年春季，我在長沙逗留了三個月，因為我在返回北京之前，有許多公私事務需要處理。當我返回北京時，取道上海，沿途趁便拜訪我的兩位朋友，一位是湖北省的教育廳長，一位是江西省長。

我自長沙啓程前數天，毛澤東建議與我一路同去，他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是極端秘密的。在北京、廣東、上海等地，事實上在全中國各處，都已經建立了共產主義的團體，有十多名代表即將在上海舉行一次秘密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我是長沙方面的代表，我亦非常希望你館和

我一起去參加這個會議。」

我對他說：「我們可以同乘一船前往上海，但我不要參加你們的會議。」

他堅持說：「去吧！你可以去和這些人見見面，聽聽他們的意見，和他們談談。」

但我問：「這有什麼意思？你們的會議又不是討論會。你們對一切已有了決定，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現在已成為勢所必然的事，如果我也去參加這會議，我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設者之一。這樣，我將在中國同胞的心目中成爲一個應付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負責的人，並且在幾千年甚至幾萬年之後仍要對全人類這個責任。老實對你說，我不準備對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負任何責任。」

毛澤東說：「如果我們努力奮鬥，在三十年至五十年時期內，共產黨就可以統治全中國。」

「這完全要看你們是怎樣做法，」我說：「我也相信在經過長時間的鬥爭後，共產黨是有可能統治中國的。但是這對我們的同胞並沒有好處，而且這種統治也不會歷久不衰。」

「但是如果我們能成爲中國的統治者，難道你認爲這不是一件大成就麼？」毛澤東似乎對統治別人有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嗜好。

「不，我沒有這樣的想法，」我說：「我覺得要解答你這樣的問題，最好是引用老子的話：『治大國如烹小鮮』。」

毛澤東仰天大笑，他顯然認爲我是在開玩笑。他不知道——而且他永遠也不會明白——我說這話是非常認真的。事實上，我是衷心地欽佩老子的哲學，在我所引用的這句短短的話中，包含了無窮無盡的真諦。

在洞庭湖的甲板上

數天後的一個下午，我和毛澤東一同在長沙西門外登上小火輪。我們同乘在一張床位中，我在上鋪，他據下鋪。許多朋友到碼頭上來給我送行，因為他們知道我不久就要再到法國去。因此在開船前，我們是忙得不可開交，和每一位朋友話別，傍晚時分，小火輪開行之後，我們都呼呼入睡，當小火輪進入洞庭湖後，我們猶如置身在大海洋中，四週都是一望無際的浩瀚汪洋。毛澤東比我先醒，獨個兒走上甲板眺望。當我醒後，也到甲板上和他一起聊天，發覺他口袋裏插着一本小冊子。當我問他這是什麼書時，他拿出來給我，題目是「資本主義制度簡述」。我開玩笑似地對他說：「你是不是一定要學習了資本主義之後，才有能力建立共產黨？」毛澤東笑了一笑，沒有回答。爲了打破這僵局，我接着說：「我知道你一向早爲做一個共產黨，最重要的事是要有信心，不一定要鑽理論，所以你不讀這些書也無所謂。因此我認爲共產主義是一種狂熱的宗教。」毛澤東又笑了一笑，仍是沒有開腔。我終於再打破沉默，問他有沒有吃過午飯，他說：「沒有。我在等你，我們可以一起吃。」

不久後，船到了漢口，我們暫時分了手。我登岸，毛澤東則繼續乘船赴上海，我們約定再在上海見面。他給了我一個秘密的地址，當我在湖北及江西訪友結束到上海後，可以到這地方找到他。

女子中學秘密開會

當我到上海時，我直接到法租界華龍路，依照他給我的門牌號數，找到了這秘密所在。在他的房間裏有兩張床，其中一張床顯然是留給我的，但毛澤東外出未歸。傍晚時他從外面回來，一見面就說他們遭到麻煩，法捕房的「包打聽」（便衣密探）已經注意他們，並且已召見他們中間的數人作了長時間的盤訊。因爲這時正值學校暑期內，他們設法弄到了一所女子中學的課室作爲集會地點。雖然他們集會的地點嚴守秘密，但是包打聽們仍處處跟踪着他們，使他們不可能再在這種地方集會，這些法租界的包打聽神通廣大

，這些參加會議的代表不論到何處，都發覺有人跟踪，因此他們不敢再在一起集會。他們暫時停止集會，由一兩名代表担任交通傳達工作。使彼此間仍保持聯繫，但已無法集會商討。在這樣蟄伏了幾天之後，警方仍保持着對他們的監視（蕭瑜註：許多年後，參加此會議的代表之一，陳潭秋在俄文「共產國際」雜誌上撰文當時的情況稱：「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下半月，九名不速之客來到法租界柏蒲路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學。他們在樓上開會，而樓下是沒有人的，只有一個廚子，他兼負看門之職，因為這時教師和學生們正在放暑假。這位看門人給絡繹來到的代表準備膳食，同時看住門口不讓陌生人進入。……代表們來自中國各地，他們來到上海是為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會議歷時僅四天，討論了下列問題：（一）當前政治形勢；（二）黨的基本任務；（三）黨章及黨綱；（四）組織問題。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發生了嚴重的歧見，特別是對於黨的基本任務及組織原則問題。以李漢俊為首的一派提出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尚在襁褓時期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還普遍不夠，需要有一段時期的教育工作。因此李漢俊認為不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並且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李漢俊路線受到李達及陳公博的支持。另一條路線是極「左」的，以劉任濟為首，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當前鬥爭的迫切目標……鮑衛森（譯音）同意劉的觀點。但大會的大部份代表對這兩種不正確的觀點……。」）

同赴嘉興混出月台

有一天，毛澤東從外面回來時，樣子比平時愉快得多，他對我說：「我們有了新計劃，代表中有一人有一位嘉興籍的女朋友，她說從上海到杭州要經過嘉興，在嘉興城外有個風景區叫南湖。我們將以遊客的姿態到南湖去，在游艇上繼續開會。我們為了充份地避過警方耳目，都買了到杭州的火車票，火車到嘉興站時，我們裝作到月台上散步。我們分散地混雜在乘客中，直至火車開行，如果包打聽從上海跟踪我們出

發，他們料不到我們會有這一着。再說，這時租界黨探，對於在上海以外發生的事通常都不會管。我希望你和我一起赴嘉興，會後我們一同去杭州遊覽西子湖。我很小的時候就嚮往西湖風光。現在要謝謝這些包打聽，使我有機會到西湖一遊。」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毛澤東與我來到火車站，我們買了到杭州的三等車票。大約九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了嘉興。火車停後，我們紛紛下車，混在月台上的人羣中。過了一會，我們已來到嘉興公路上。我看到霧中的南湖，就在嘉興城旁，望着這一片恬靜的湖水，再想到它不久就要誕生出一個怪物——中國共產黨，不禁使我對這小湖產生了一種奇特的震愕。

其他的代表也都離開了火車，但當他們貼面而過時，都裝得像是不認識的陌路人。我和毛澤東一面走一面注意四週。發覺並沒有人跟踪。我們在一條小巷旁找到一家小客棧，合租了一間房。

南湖漫步小艇逐波

這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但床很大，佔了全房面積的三分之二，使留下的地方幾乎沒有轉身餘地。蚊帳很潔白，所以我決定住這間。在如此炎夏，選擇旅舍的最主要條件就是蚊帳。我們剛安頓下來，毛澤東就要出去開會了。他臨走拉着我的手臂說：「我真希望你和我一起到南湖去！」

「不，我在這裏等你回來，我們還是一起到西湖去吧！」我說：「你大概要多少時間可以回來？」

「你不肯和我一起到南湖去，真是太可惜了。」毛澤東說：「我大概要到天黑後才能回來，我們在船上吃飯，你不必等我。」

說罷，他對我注視了幾分鐘，搔搔頭，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了。我獨自在客棧裏寫了幾封信後，就出去散步，沿着南湖漫無目的地走去，看着一艘艘小艇盪漾在湖面上。這真是舉行秘密會議的好地方，但是我

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將在那一艘小艇上分娩，現在即將產生足以泛濫全中國的大災禍。

我吃了晚飯後，仍不見毛澤東的踪影。我洗了澡，呆立在小窗戶前，只見點點燈火，夜幕漸漸深降。我熄了燈上床。兩三個鐘頭後，毛澤東撩開蚊帳說：「老蕭，你經睡了嗎？」

「是啊，」我說：「你不要老是拉開着蚊帳不放，這裏蚊子多得可怕，你這樣拉着它們都要飛進來了！你對今天的事滿意嗎？」

「非常滿意，」毛澤東說：「我們可以在艇上自由在地無所不談。總之，你不去真是太可惜了！」我立即說：「看，你也懂得自由的可貴！你在上海無法與我們自由地交談，你們沒有集會的自由，包打聽到處跟踪着你們。這種情況雖然只有幾天，你們也受不了。而在俄國，每天每夜不論你到何處，都像你們在上海時一樣。在俄國沒有人能找到「南湖」。你爲什麼如此熱愛自由，而仍立志要摧毀你的同胞們所享有的自由？爲什麼要把中國弄成第二個俄國？你們在會議中作了些什麼決定？你們計劃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又要爭辯一千年了

毛澤東說：「我們決定必須使中國成爲第二個俄國！我們必須把自己組織起來，爲這個目標奮鬥到底！」

「你們怎樣組織起來？」我問。

「這些代表都是了不起的人，毛澤東向我解釋道：「其中有些人受過高深教育，而且精通日文和英文。我們決定必須先建立一個核心，這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然後再詳細計劃宣傳方針及擬定行動計劃。首要的事是先使勞動大眾與青年學生投向共產主義。同時，我們的黨必須有個穩定的經濟基礎，這就是爲什

須麼我們必加入第三國際的原因！」

「但是，」我提出異議說：「第三國際是俄國的，你們爲什麼不組織第四國際？」

「什麼叫第四國際？」毛澤東反問。

我解釋道：「第四國際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這是馬克思與克魯泡特金（譯者註：無政府主義的先驅者）的思想之結合物，這是自由的共產主義。你還記時我會說過關於黃包車的兩個輪子的故事嗎？只有自由共產主義是兩輪並進的，不需要用強制的力量來支持它。如果你同意組織你們的運動沿着第四國際的路線發展，我將把我的一生貢獻給你們的運動。」

「看來我們又要爭辯一千年了。」毛澤東一面說着，一面掀起蚊帳也鑽進床來。

我醒時，已經日上三竿，毛澤東乃在打鼾，所以我們病着不動。過了許久，他睜開眼，我說：「潤之，現在已近晌午了，我們起身吧！」

「現在幾點啦？」他說：「我們不能再睡一會嗎？」

我同意他再睡，我悄悄地先起了床。過了大約半個鐘頭，他跳起來說：「現在什麼時候？我們是不是錯過了火車？」

「不必擔心，」我說：「現在還早，每天有好幾班火車去杭州。」

這天的天氣非常好，陣陣微風把南岸湖邊的花香飄進房來。我站立着眺望南湖，立了許久，因爲時間還早，沒有一艘遊艇，湖面上如平水鏡，但是當我想到昨天在這片水面上發生的事，我黯然地轉過身來。

火車上，乘客不多，因此我們又有幾小時可以無所不談。但我們談的復凌亂，沒有對任何問題作深入的討論。我們大部份時間是在批評陳獨秀，這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過於學究式，而且充滿資產階級氣質。在我們看來，這角色應該由博大劍來担任的。但是，俄國人喜歡陳獨秀，這對甚麼辦法！因此陳

獨秀成爲南湖會議的召集者，並在會後成爲中國共產黨的書記。

我們在午後到杭州。西湖四週的房屋、馬路與樹木，構成了一片美麗無比的景色，使我相信「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真是名不虛傳。

毛澤東和我踏遍了西湖十景，我們雖然置身在這人間天堂，但內心並不感到愉快。我們各懷心事，我會一度打破沉默說：「看這如畫的風光，真是巧奪天工，可是窮人就無法到這裏來享受。」

毛澤東說：「這是罪惡的產物，有錢的人用他們的作孽錢來建造這個大花園，再用他們的孽錢來享受。」我笑着說：「看來，我們兩人今天也要暫時做下小罪人。」

「我們明天就離開這裏。」毛澤東說：

第二天我們乘火車回上海，毛澤東翌日返長沙。我在上海逗留了一星期，把事務處理完畢之後就到北京。

直到這時爲止，毛澤東從未把有關他的共產主義活動的事向我隱瞞過，事實上，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訴我，因爲他相信我決不會向任何人透露。自從我們在上海分手後，我們仍經常不斷地通信，有時候使用只有我們兩人才懂的暗語。數月後我再抵法國後，我們的信就需要十至十二個星期才能到達，因爲當時還沒有空郵。但也幸虧沒有空郵，否則毛澤東將會破產，因爲他所寫的每一封信都是長篇累牘，洋洋數千言。

當我在一九二四年再返國時，我住在北京。因爲我無法抽暇赴長沙一行，因此與毛澤東及其他新民學會的會員們只能互通魚雁。這時，正值孫中山先生倡導國共合作，因此使所有共產黨員也同時成爲國民黨員。但在事實上，共產黨只是借國民黨作掩護，繼續爲他們本黨的目標而努力。

在這段時期內，國民黨（我已加入此政黨）與共產黨具有共同的目標——摧毀軍閥統治。我積極地參加了這項革命運動。毛澤東以及新民學會的其他朋友，也都在爲這個目標而努力。

我雖然與共產黨領袖之一的李大釗有密切交往，而且和在北京的其他一些共產黨員也時相過從，但我已經完全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內部正在秘密討論或策劃的事。毛澤東仍寫給我一封封長信，但他也不再談論黨內的事，而只是作純粹理論性的討論。

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黨員合作得很好。例如我出任「民報」——這是當時華北地區唯一的大報——總編輯後，每天午後都舉行一次編輯會議。我們圍坐在一隻長桌旁，坐在我對面的是我的秘書。坐在我左邊的是三個國民黨員，坐在我右邊的三個共產黨員。這三名共產黨員之一是樊宏志（譯音），他後來與李大釗一同被絞決，這很像是聯合政府的內閣會議，我們通常總能達到一致的意見。

在一九二五年整年內，我一直受警察的密切監視，完全失去了自由。我經常躲藏在北京或天津的外國租界內，以逃避緝捕。當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士在一九二六年被北洋軍閥絞決後，我們這些革命黨人雖然危險更大，但活動則更爲積極了。我們的住宅經常被軍警抄查。有一次我躲在租界裏，我的家人把我的一隻皮箱焚燬，這隻箱子裏塞滿了毛澤東及其他朋友們給我的信。這時我與毛澤東的通信被迫停止，只偶然由一些來往於長沙及北京之間的朋友帶來一點口信，但後來連這種口信也沒有了。

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寫給毛澤東的最後一封信。我在這封信中指出：我們現在正面臨着一項重大的抉擇：自由或極權、國家至上或個人至上……沒有一種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任何政治制度都有缺點，但比較起來，民主政制較任何其他政治好得多。……一個國家不是可以由幾個人管理的機器，企圖控制整個民族的思想與意志，是既不合理也不睿智的。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曾經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在信末表示：希望在世界末日來到之前，對我們的爭論能獲得一個明確的結論。

（完）